

1989 10

中國之春

卷下 7期



論中國之春恐懼症

下一輪內鬥：

江太子能出什麼牌？

重建共和國的綱領

張綱

(討論稿)

北京六月的慘案宣告：共和國已經在中國大陸死亡，推翻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帝制，重建共和國的歷史已經開始。

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不僅恢復了中國歷史上的高度中央集權的皇權制度，還一步一步地把這種制度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強化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歷史上的皇權至上已演變為今日中國的某些領袖的權力至上，領袖凌駕於政黨之上，政黨凌駕於政府之上，政府凌駕於人民之上。這種新的皇權繁衍出了在黨、政、軍中普遍的人身依附關係，是今天中國大陸一切宮庭政治黑幕和社會動亂的根源。

爲了鏟除這些弊端，中國人民，包括中國共產黨內的優秀份子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以鄧小平、楊尚昆、李鵬爲代表的一小撮反動統治者以血腥的鎮壓來回答了人民的要求。他們剝奪了人民最基本的權利，終於使人民的政府迅速淪爲當今世界最腐敗的政府，淪爲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上最殘暴的政府。

北京六月慘案的最大教訓是人民不能對任何領袖寄於過高的希望。人民的權利只能依靠建立新的制度來保障。乞求救世主的人民最終會被救世主所葬送。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曾因受到人民擁護而獲得政權。但是由於人民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制度來監督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在近三十年的統治中幾乎每天都在欺騙人民。鄧小平上台僅十年就墮落爲屠殺人民的劊子手。慘痛的教訓告訴了整整一代中國人：必須丟掉幻想，爲建立共和國的制度而戰鬥。

爲了推翻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帝制，承認和維護人民的基本權利，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起新的制度，我們特提出如下重建共和國的二十一條綱領。

一、政治制度

第一條：廢除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建立聯邦制的共和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均實行自治。

第二條：成立全國國民議會，作爲全國最高立法機構，以取代目前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全國國民議會分下院（衆議院）和上院（參議院）。上院議員按人口比例選舉產生，下院議員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選舉產生。

第三條：實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原則。

第四條：實行多黨政治。各政黨的經費一律自籌。絕不允許再有像今天的共產黨這樣隨意濫用政府財政資金作爲黨的活動經費的貪污行爲存在。

第五條：地方政府首腦由地方選舉產生。中央政府無權任免地方官員，以此結束自秦王朝統一中國以來由中央政府任命各級地方官員的政治傳統。

二、財產制度

第六條：確立以個人財產爲基礎的產權制度，宣布個人財產制度不可侵犯。

第七條：承認企業經營所得的利潤是企業的財產，完全歸企業所有。企業應依法向政府納稅。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截取企業利潤。結束政府和企業間財產關係混亂的現狀。

第八條：實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稅種劃分收入來源的制度。中央向地方借債必須有借有還。結束目前中央與地方財產關係混亂的現狀。

第九條：承認一切經營者都有平等的投資權和從事對內對外貿易的權利，徹底廢除政府對投資和貿易的壟斷權。

第十條：確定破產制度。企業、社會團體和政府一旦資不抵債，即宣告破產。

三、軍事制度

第十一條：軍隊國家化。軍隊不可以任何理由成爲政治鬥爭的工具。廢除「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軍費由中央財政支出，並由全國國民議會監督、審查、批准。

第十二條：「實行僱傭兵役制」廢除義務兵役制。裁減軍隊，提高軍人待遇。

第十三條：警察部隊地方化。取消全國統一指揮的警察組織。警察部隊的經費由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並由地方國民議會監督、審查、批准。

第十四條：實行全民皆兵。在一切有條件的地方開展各種形式的全民定期軍事訓練，建立各種形式的民兵組織。

四、人民的其他權利

第十五條：人民有新聞、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取消反革命罪，取消一切政治犯。取消一切思想罪、言論罪。

第十六條：人民有遷居的自由。廢除戶口制度。

第十七條：廢除政府對個人的秘密檔案制度。

第十八條：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實行政治與宗教信仰分離。共產主義的信仰，一切有神論和無神論的信仰都不應成爲實行宗教和政治迫害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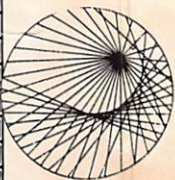
五、大陸、台灣、香港、澳門的關係

第十九條：拋棄一切在大陸、台灣、香港、澳門關係中以武力相威脅的言論和行動。

六、對外關係

第二十條：堅持和平外交，反對一切戰爭。

第二十一條：開放中國大陸一切沿海口岸，爲各種形式的中外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提供方便。



自四月份民運高潮以來，中國之春常常受到朋友們的譴責。一些人在電話裡痛心疾首，為中國之春在運動中無聲無息而遺憾，為民聯在大潮中無所作爲而焦慮。也有人眼看著形形色色的組織如雨後春筍，爲他們搶盡民聯的風頭而忿忿不平。一位朋友在電話裡大聲疾呼：中國民聯若再不幹出一點驚天動地的事情，恐怕就要亡盟了。

我理解這些好心的朋友們，他們是真正關心民聯命運的人。他們恨鐵不成鋼。我感謝這些善意的朋友，可是民聯有它的苦衷，也有它的信念。



成功不必在我 功成我在其中

路邊

到了一兩年前，儘管示威者仍大多數爲盟員，但人數大大增加。去年「楊魏月」國會門前示威已有二百人，今年魏京生被捕十周年在紐約中共總領館的示威也有百餘人，而且無人戴頭套。可是今年「六四」前後，遊行示威的數量急劇上升，動輒數千，甚者上萬，有幾次各院校留學生傾巢出動。在這些照片中，你已很難看到民聯成員，他們被淹沒了。

在五月二十二日華盛頓那次最大的留學生示威遊行中，胡平、黃奔等十餘人舉着「中國民聯」的牌子默默地走在四五千人的隊伍中。那情景令人感到有點淒涼，又頗爲悲壯。我肅然起敬。中國民聯有一百多人參加了這次遊行

後默默地做的事情，至今仍鮮爲人知。一九八七年一月，第一封留學生千人簽名的公開信的初稿就是在民聯總部起草的，可是它在定稿時却加了六點聲明，其中一條是強調此信與中國之春無關。

去年留學生第二次千人簽名運動，聯絡人名單大部份是中國之春提供的。去年的大陸留學生第一次訪台也是民聯推動的，給李登輝總統的公開信就是民聯總部起草的。在紐約、舊金山、洛杉磯、芝加哥、休斯頓、華盛頓歷次示威遊行中，民聯成員總是冲在第一線，製標語、喊口號、遞抗議信，哪一次也少不了他們。

當民運低潮時，民聯是唯一一個反對派組織力量，每當留學生們遇到困難時，就會想起民聯，向它求助。不過每一次都是要求民聯悄悄提供幫助，不要聲張。可是當高潮到來時，留學生中一下湧出數百個團體，民聯很自然會被遺忘了。

民運大潮極其壯觀，還有什麼事情比它本身更驚天動地？民運組織大量湧現是大好事，他們爲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能夠想到的事情都有人去做了，遊行示威、遊說國會、信息聯絡、籌款救人、宣傳展覽、聲明表態……總之，各項活動早就聚集了過剩的精力和財力。如果別人幹得好的話，民聯何必要去湊這個熱鬧？何況，據說民聯的參預還會使某些心有餘悸的大陸人感到不方便。

中國之夏來了，中國之春將會隱去

翻開中國民聯歷年活動的照片冊，深有感概。四、五年前，每次在使領館門前示威的都是清一色的民聯盟員，少則四五人，多則也就十幾人，其中還有一半是戴着紙袋的秘密成員

，他們都分散在各自學校的隊伍中，或者當糾察，或喊口號，或攝影，後勤，他們溶化在群眾中了，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統帥衛隊。

參加那次遊行的一位盟員告訴我，前一晚他們寫標語牌、頭帶忙了通宵。第二天他把標語牌帶到現場，學生們把牌子拿走了，但把上面「中國民聯」的字撕掉使用。他見了開始很難過，但很快就釋然了，那些同學儘管不認同中國民聯，但他們認同他在牌子上寫的口號。過去他們不敢舉這些牌子，現在敢舉了，這就是進步。

也許共產黨加在民聯頭上的 CREDIT 要遠遠大於它應得的，可是在海外，民聯得到的 CREDIT 却遠遠小於它應得的。它過去在幕

也許，像民聯這樣的組織，天生就是要爲民運低潮準備的。這裡聚集了一批這樣的人：他們願意幹別人不願幹或不敢幹的事情。只有當他們是少數的時候，才能顯示出他們存在的價值。而一旦高潮來臨，大多數人蜂湧而至，他們的存在就無足輕重了，他們將溶化在人群中，被淹沒在衆多團體中。也許民聯中不少人爲此遺憾，但更多人樂得其所。他們的信念是：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

在文學作品中，人們總是在滿懷激情地迎接高潮，可是民聯寧願去迎接低潮的挑戰，只有在低潮的肅殺和冷漠中，才能識別出真正的金子。中國人，必須學會長期而韌性的鬭爭。「六四」之後，大潮漸落了。但是我相信：水落石出！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的第一份中國海外民運刊物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1982年11月17日創刊

1989年10月號77期
9月15日出版

P.O.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Tel: (718) 429-6777 (718) 507-4739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Copyright ©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民主牆

參考消息

紫禁城

專題

3 成功不必在我 功成我在其中

路邊

6 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前景分析

胡平

14 新一輪內鬥：江澤民 VS 李鵬

丁民安

15 民主運動三難題

范璞

16 離大革命只差一步

徐邦泰

20 鄧李江：各出意外牌

李遠

22 解嚴之前的北京

古雪姣

26 官園深處——中南海秘聞之二

未名

28 中國之春現象討論 (錄音整理)

本刊記者

35 談不願被人利用的心理

徐大忠

36 廣泛而有限的參予

陸丙甫

39 我對中國民聯的看法

李少民

41 中國之春恐懼症剖析

楊遠

44 民聯的自恐症和他恐症

河鳴

45 我加入了中國民聯

石劍鵬

47 中國民聯總章程

——第四屆民聯世界代表大會修改



楊尚昆：該輪到我了把？！

鄧小平：今天天氣……哈哈

大陸沉浮

它山之石

人物

六四日記

特別報導

封面：
封二：
封三：

48 面對子孫的審判

55 半邊天仍然黯淡

58 被遺忘的軍功

59 副司令和百萬英鎊

61 南韓民主運動的經驗和教訓

66 東歐第一任非共產黨總理

70 我在西郊民巷目睹「六四」慘案

73 一個醫生眼裡的悲慘之夜

75 中國：大逮捕報告

80 海內外民主運動大事記

江澤民、李鵬、楊尚昆

重建共和國的綱領（討論稿）

「六四」鐵十字紀念碑設計（草稿）

楊天樹

莫利人

顧曉林

劉子如

越人 譚夏

楊漫克

魏安娜

一個醫生

亞洲觀察

薛偉整理

蘇洋設計

張綱

王克平

主編：丁楚
主筆：胡平
編採主任：楊漫克
責任編輯：劉義
執行編輯：李遠
美術編輯：蘇洋
發行：薛偉
攝影記者：鄧躍飛

中共高層權力鬭爭前景分析

胡平

八九民運觸發了中共黨內自「四人幫」打倒以來最嚴重的一場權力鬭爭。總書記趙紫陽被扣上「支持動亂」、「分裂中央」的罪名趕下了台，「黑馬」江澤民取而代之。新的黨中央領導班子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加強團結，並決心認真爲人民辦成幾件好事，報紙電台竭力粉飾太平，試圖讓人們相信在中國大陸，一切都已經恢復了正常。但是，任何一個對中國政局略有瞭解的人都知道，中共高層的深刻危機遠遠沒有結束，未來走向如何仍在未定之天。

一、中共黨內鬭爭的三個特點

分析和推測中共黨內高層的變化，歷來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這是因爲中共內部的權力鬭爭具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不公開性、非程序性和底線的任意性。

(一)、不公開

所謂不公開性，不僅是說，中共高層的内部矛盾，一般黨員、一般民衆難以知曉，更重要的是，即使這些「大人物」們自己，彼此也太不知道別人在想些什麼、幹些什麼。毫無疑問，在中共高層內部，由於政治觀點的不同，經歷淵源的不同，私人恩怨和親疏關係的不同，存在着若干大大小小的派別。但是，由於中共一向限制黨內各種觀點的自由交流並嚴格禁止公開的派別活動，因此黨內高層人物之間的

的相互關係歷來是極其錯綜複雜、曖昧多變和不確定的。這就使得黨內權力鬭爭的前景撲朔迷離、難以預測。

(二)、非程序

非程序性，或曰非制度性，這還不只是民主的問題，因爲有些不民主的東西也可以是制度化或程序化的。例如世襲制，前些年搞政治改革，中共當局接受了（起碼是在理論上）廢除終身制的建議，但事實證明那並沒有帶來任何有實質意義的後果。何以致此呢？道理很簡單：第一、嚴格意義上的終身制，中共從來就沒有實行過。我們知道，美國的大法官是終身制的，因而他們可以不受制於總統的權力和選民的選票。中國古代有些朝代，有的開國元勳被封予終身（兼世襲）的王公貴族頭銜，因而在有些古代的某些傳統和戲劇中，常常會有一些這種享有終身制特權的王公們起來抗拒皇帝。中共治下何曾有過這類事？如果總書記能是終身制的，胡耀邦、趙紫陽就不會垮台了。盡管一般而言，終身制並不是什麼好東西，但如果它真的是一種硬性的制度規定，那麼有一弊者總還有一利。中共的大問題是它根本沒有任何硬性的制度。中共的統治是最純粹的人治，其結果往往是更壞。

第二、中共所搞的廢除終身制，其實是限制任期。這看來是不錯的，實際上却是無用的。因爲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下，「職位」和「權

力」並不必然相稱。在其位者未必有其相應的權力，不在其位者未必沒有其相應的權力。在中共那裡權力不是來自職位，而是來自一個人在統治集團內部的人事關係。慈禧太后就是在歸政於光緒後依然大權在握，因爲她在宮廷內外的關係依舊存在。鄧小平之所以成爲太上皇，那也和他是否擔任政治局常委、中顧委主任，乃至於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沒有大直接的聯系。

中共政治的非程序性和非制度性，不僅表現在權力與職位不對稱上，還表現在升遷降免的無規則上，胡、趙兩位總書記的垮台都是垮在一批既非政治局常委，又非書記處書記的元老們召集的無以名之的會議上。可見其無規則到了什麼地步。

在關於最高權力交接更替的問題上，中共政治的非程序性或非制度性表現得尤其突出。中國古代搞王位世襲制，那好歹總還是一種制度。在遠古，堯傳位給舜、舜傳位給禹，禹却傳位給了自己的兒子，這種「傳子不傳賢」的變化，從單純的制度化角度而論，恐怕是一種進步。一般來說，皇帝應該把帝位傳給長子，但這一點常常缺乏硬性的規定，因此在中國古代，圍繞着帝位繼承問題，經常爆發內部危機。有句話，叫「皇儲難當」。爲什麼呢？因爲一個人一旦被確定爲帝位繼承人，他至少就和兩方面發生了矛盾。首先，在皇帝和皇儲之間

有矛盾，皇帝怕皇儲「搶班奪權」，皇儲怕皇帝「夜長夢多」。忠於皇帝者不一定都忠於皇儲，忠於皇儲者不一定都忠於皇帝，因此就造成了「父黨」與「子黨」之間的衝突。皇儲缺乏實力，皇帝不放心，怕日後鎮不住；皇儲很



林彪曾一度為毛澤東選定的皇儲，但終逃不脫身處異首的命運。

有實力，皇帝更不放心，怕現在就被取而代。其次，在選定為皇儲的人和有同等資案而落選的人之間會發生矛盾，因為他們彼此之間最有可能相互爭奪。此外，皇帝應在什麼時候確立皇儲，那也是一個大傷腦筋的問題。確立得

太早，則皇帝與皇儲之間的矛盾越容易積累激化；確立得太晚，則皇儲與其他落選者之間的矛盾越難以避免和爆發。怪不得同是至親骨肉，皇帝家族內部的爭鬪常常搞得那麼殘酷，那麼頻繁。

相比之下，中共高層為權力交替而進行的鬪爭，還要多一層困難。因為，第一，中共不便實行世襲制。獨裁者和他選定的接班人之間，接班人和其他覬覦此位的實力人物之間既然沒有血緣關係，彼此之間更會相互猜忌，一旦鬪起來更加兇狠。第二，獨裁者說的話，在其生前或許沒有多少人公開反對，死後就很難說了。因此，被獨裁者指定的接班人，是不是能夠在日後順利地掌握大權，是不是僅僅憑一紙「你辦事，我放心」的遺旨便平服群眾，那真是大成問題的。

中共這四十年的歷史恰好證明了上述論斷。毛澤東先生選定了劉少奇和林彪接班，鄧小平先是選定了胡耀邦和趙紫陽接班，但都同為他們和自己發生了矛盾而被廢掉。有人說，胡垮台的因素之一是他讓所謂「團派」即胡派的勢力膨脹得太快，然而，趙該是個不拉幫結派的人了吧？趙的垮台的因素之一，難道不正好是他的派別勢力太弱嗎？江澤民和華國鋒類似，都是在太晚的時候，也就是老皇帝快死的時候才指定的，因而他們與老皇帝之間的矛盾也許還來不及發生，但是他們有力量控制住老皇帝駕崩後的亂局嗎？

（三）、無底線

底線的任意性更是中共權力鬪爭的一個致命弱點。民主政治的好處不僅在於，它使爭奪權力的各方具有平等的公開爭奪的機會，更在於它保證了失敗的一方能夠享有安全，並保留了捲土重來的可能性。也就有效地防止了在權

力鬪爭中走極端乃至造成流血衝突的巨大危險。中共黨內鬪爭從來就沒有明確的底線。彭德懷廬山會議丟了官，沒想到還會在「文化革命」中喪了命。同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鄧小平能東山再起，劉少奇却死無葬身之地。在中共黨內的權力鬪爭中，失敗者的命運沒有



庸才的華國鋒稀裡糊塗當上皇儲，又稀裡糊塗下台。

保障，差不多完全取決於勝利者的心血來潮。本來，在「四人幫」垮台後這十年來年中，中共黨內鬪爭雖然依舊沒有規則可言，但結局大抵是比較溫和的。「凡是派」或胡耀邦等人在被逐出權力中心後，都並未失去人身安全，甚至還多少保住了一些職位。換句話，在這十年來的黨內鬪爭中，一條未曾明言的底線正在無形

中漸漸形成。可是最近這場惡鬪無疑使得原來正在形成的底線化為烏有。首先是鄧李楊等人喪心病狂地大屠殺、大追捕、大監禁，使得多年以來朝野雙方互動所模模糊糊形成的底線完全被突破，民運人士和一小撮屠夫之間已經勢同水火，這就同時使得黨內的極端強硬派和溫開明派頭面人物之間的關係也變得相當緊張。如果趙紫陽重新上台，李鵬一伙只怕要送進監獄；而如果李鵬一伙在台上，誰又能擔保趙紫陽的人身無恙？根據犯罪心理學，李鵬一伙的所作所為，既然已經超越了良心束縛的最邊緣，從此之後，他要幹什麼壞事都不會在乎外在的輿論和內在的良心了。對李鵬等人而言，他們只有幹不成的事，沒有不敢幹的事。黨內的矛盾既然已經尖銳化到了這般地步，那麼未來的形勢演變，就會是「EVERYTHING IS POSSIBLE」(「凡事皆有可能」)。

二、中共上層鬪爭的幾種可能性分析

考慮到中共黨內鬪爭不公開、非程序、無底線這三個特點，再考慮到目前中共高層內部的矛盾衝突局面，在最近的將來，其上層權力鬪爭可能出現哪幾種情況？我們不妨略作分析。

(一)、趙紫陽東山再起

鄧死後，趙可能復出。其方式多半只能採用政變一類非常手段。

趙復出，將繼續堅持其反對鎮壓民運的立場，這意味着否定六四屠殺，並由此導致對八九民運平反。結果是，北高聯、北知聯等組織復活。此後，將迅速導致各民間團體的出現以及言論、出版、新聞等自由的大幅度開放。遂形成「共產黨統治而不專制」的局面，中國

可能走上現今波蘭、匈牙利式的道路。

促成此種可能性實現的正面依據：

六四之後，黨內溫和派一方面遭到強硬派的嚴厲清洗和排斥，另一方面又強烈地感受到民衆對整個共產黨政權的不滿乃至敵視。他們發現，無論是強硬派繼續用刺刀維持其統治，還是出現大規模動亂以搞垮共產黨政權本身，都將使他們在政治上失去立足之地。因此，對他們而言，最好的前景便是盡快打倒強硬派，同時對民主力量作出某些讓步。溫和派無疑認識到，如果他們想重掌大權，非與民主力量聯盟不可，這意味着他們須準備逐步放棄共產黨的絕對權力。故而，匈、波模式雖然未必是他們最樂見，但却是最可能的最佳選擇。

對民主力量而言，他們目前亟欲推翻強硬派的恐怖統治。為此，他們將同意與黨內溫和派合作。盡管民主派對黨內溫和派亦多有不滿，不過他們相信，支持溫和派上台是最便利的。他們並相信，通過雙方合作打垮強硬派的鬪爭，溫和派本身將得到某些改造，而民主派也將不失時機地為自己贏得一些雖然簡單但却基本的自由權利。

可以想像，趙氏復出，勢必在政治改革方面邁出遠較從前巨大的步子。這種局面不僅最少流血震蕩，而且也為日後的民主的和平演進開闢了道路。從國際方面看，趙的復出，可望立即獲得蘇聯、東歐及西方國家的共同支持，這對於中國的穩定與發展也是有利的。

妨礙此種可能性實現的反面依據：

首先，黨內溫和派實力有限，六四之後更見削弱。這和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後的形勢略有不同：當時，「文革派」人數少、根基淺，大部份幹部，包括多數元老級人物和軍方實力人物皆不滿意他們。現

在的情況則可能是溫和派人數不多、根基不廣，大部份元老和軍方實力人物都偏向於強硬派(我說「可能性」，因為不好認定)。

其次，民間力量今非昔比，其獨立意識空前增高。當年的民衆尚滿足於以一個好皇帝取代一個壞皇帝，如今的人們要反對的却是帝制本身。這就迫使黨內高層人物(包括溫和派)深感猶豫，他們擔心，如果再來一次「十月政變」，再來一次「三起三落」，從而引發更大的民主運動，整個共產黨的統治是不是保得住。這裡，尤其是要考慮到六四屠殺所遺留下後果。如果說在六四之前，有較多的人希望和平漸進地推動民主並對共產黨抱有一些信任的話，六四之後，人們的敵對情緒上升，這種情緒在高壓下表現為冷漠，一但閘門開放，則很可能演變為一股暴烈難馴的洪流，有鑒於此，原屬溫和派的一些中共領導人也許會認為，事已至此，只好繼續維持(起碼是在一段時期之內)強硬路線，在大體維持強硬路線的同時，略作部份溫和的修整。倘如此，讓趙紫陽重登權力高位的可能性就較小了。

當然，妨礙趙氏復出的最直接因素是來自黨內強硬派，如果說趙紫陽願意做第二個鄧小平，那鄧小平却未必肯做第二個毛澤東，江澤民也不打算做第二個華國鋒，李鵬、楊尚昆則絕對不願意做第二個四人幫。強硬派會意識到，趙紫陽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他們的嚴重威脅，尤其是在政局混亂或曖昧的情況下。有跡象表明，強硬派試圖置趙紫陽於死地。考慮到中共上層鬪爭一貫的非程序性和殘酷性，特別是在鄧死前後，李鵬等很可能本著「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的邏輯，徹底消除趙紫陽等人。戊戌變法失敗後，光緒被軟禁，但許多改良派仍對之寄予厚望，殊不料光緒却死在慈禧之前

。可為股鑿。

如果李鵬一派有自信控制大局，他們或許會像捷克當局對待杜布切克那樣，滿足於將趙麗官去職為止。但很難相信李鵬等人會具有此等自信。

另一方面，如果趙派（或反李鵬派）勢力足夠強，可能保住趙紫陽安然度險。然而，要是趙能保住自身而若干溫和派領袖又仍能在台上的話，李鵬一伙的垮台就將是遲早之事。畢竟，趙派與李派勢難兩立，這一點大概是很確定的。

(二)、在排除趙紫陽復出的前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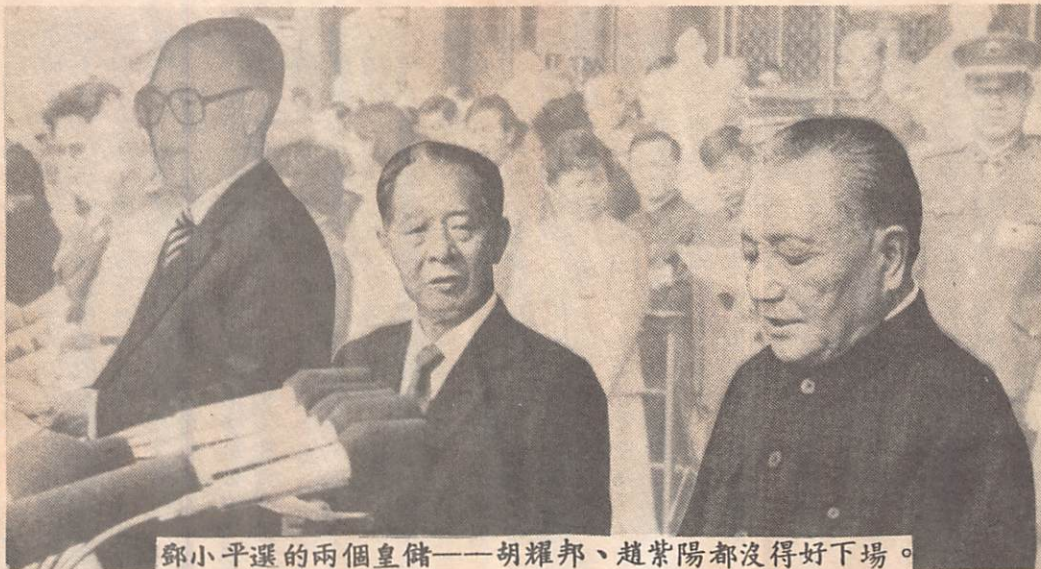
中共也可能走波、匈道路

這可以有兩種實現方式。

第一種方式，如趙在事變前去世（正常死亡或非正常死亡），黨內另一些身居高位的溫和派發動政變搞掉李鵬。如果趙死於李之手，那不僅陷李於更加被動的地位，而且也會驅使溫和派下決心背水一戰，倘得手，仍可造成與前一種可能性類似的局面。

第二種方式，由江澤民一類人之手而實現此種可能性。目前江澤民的角色與當年華國鋒有幾分類似：他既屬於強硬派，故當上了總書記；但同時未直接參與六四屠殺，因而與李鵬等人又有潛在的衝突。鄧死後，江完全可利用其總書記的名位，順理成章地打倒李。如果江要避免重蹈華的覆轍亦非難事。其實，當初華國鋒打倒四人幫後，倘能立即大刀濶斧推行改革，把鄧小平後來所做的事自己提前做了，鄧的復出也就不會對他構成什麼威脅了。自己利用在位之便，率先實行其潛在競爭者的政治主張，是一種削弱對方政治資本、鞏固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歷史曾經給予華國鋒這個庸人一個千載難逢的成為偉人的機會。只是，善於利

用機會的庸人也不再是純粹的庸人了，即使他還算不上真正的偉人，而華國鋒却恰恰是一個純粹的庸人。



鄧小平選的兩個皇儲——胡耀邦、趙紫陽都沒得好下場。

如果江澤民重演打倒四人幫的故伎而打倒李鵬，然後又不像華那樣拖延、阻撓為第二次

天安門事件平反，則趙紫陽的存在與否將不構成對江的嚴重挑戰（更何況，今天一般人對趙的期望恐尚不及當年對鄧的期望）。這種情況並非絕無可能。因為，作為強硬派人物的江澤民並非沒有機會或條件回過頭來扮演溫和派的角色。戈爾巴喬夫在成為戈爾巴喬夫之前，誰又知道他會是戈爾巴喬夫？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只有在真正掌握大權後才能施展其本來抱負，所以某種出人意外的角色變換就常常是可能的。從另一個方面看，不少共產黨領導人，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的領導人，大都是些機會主義者，而一個高明的機會主義者是不會放過歷史送給他的大好機會的。古人說，識時務者為俊傑，也正是這層意思。

在這一點上，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算是一個活例。作為當年緊急狀態的頒佈者，雅魯澤爾斯基能為時不太晚地扮演了「解鈴還須繫鈴人」，結果是保證了自己在波蘭政局的重要地位。其實，不僅是江澤民，現在看來屬於強硬派陣營中的其他頭面人物，都有可能翻雲復雨，反過來成為溫和派領袖（有人甚至舉出袁世凱的例子）。李鵬當然是例外，他是「作了過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

不論江澤民是否有意搞掉李鵬，但李鵬却不能不感到江澤民對他的威脅。賈誼說，「最強者最先反」。李鵬應該知道，最有能力把他趕下台的人，首先還不是被迫捕監禁的民運人士，也不是被免職軟禁的趙紫陽，而是位在自己之上的江澤民。再者，我們知道，鄧小平一向對李鵬殊少好感（這還不同於毛澤東之對四人幫），同時鄧顯然又不願他提拔的第三個接班人也在他有生之年給搞掉。有兩個前車之鑒的江澤民也自然會在鄧在世時小心從事以保住權位。因此，在客觀態勢上，江澤民就成了李

鵬的頭一號潛在政敵。

以往的經驗一再證明，中共高層之間相互矛盾的尖銳性、相互激化的迅速性，以及解決矛盾的對抗性和殘酷性，常常比外人估計的要更甚。這點教訓也是不可不提醒的。

(三)、捷克式道路

前述(一)種可能性均屬於波、匈模式，其間的區別僅在於具體人事上。中國近期政局演變的第三種可能性是所謂捷克模式。

迄今為止，社會主義陣營中發生過全國規模的自由化運動而又遭到暴力鎮壓的國家共有四個：匈牙利（一九五六年）、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六八年）、波蘭（一九八〇年）和中國（一九八九年）。

過去不少人認為，在政治文化上屬於西方傳統的一些東歐國家（如波、匈、捷、東德等），其社會主義制度純粹是靠蘇聯的坦克從外部強加的，也純粹是靠蘇聯的坦克得以維持的。一旦克里姆林宮對它的衛星國的政治變化採取了一種更容忍的態度，或者是莫斯科自身興起了自由化之風，這些國家便會立刻向民主制度轉化。波蘭、匈牙利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的變化似乎印證了這一點（今年波蘭團結工會再度興起，官方不得不承認其合法性，瓦里薩講過一句話。他說，八年前團結工會遭到壓制，「僅僅是因為克里姆林宮裡一個叫做勃列日涅夫的人多活了十八個月」）。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布拉格之春二十一年之後的今天，捷克斯洛伐克並沒有出現任何顯著的民主化浪潮。戈爾巴喬夫刮起的改革之風，在布拉格並沒有產生相應的反響。不錯，戈氏訪捷，受到了捷克人民自發的熱烈歡迎，人們稱戈氏為「東歐的解放者」。但捷克當局却抵制了這股改革風

。這一點是很有趣的，當克里姆林宮吹來冷風時，東歐各國，主要是華沙條約各國，通常無力阻擋住襲來的寒意；而當克里姆林宮刮起暖風時，這些國家却未必沒有力量防止住那股春潮。來自蘇聯的這兩種影響的不對稱性，似乎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特點，證明了在這種制度下執政集團本身的重大作用。

中國有可能步捷克後塵。中共當局或許認為，適度的改革是必要的，但過多的改革却必定是危險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當今世界上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危機最浮重，至少是危機最表面化的，並不是那些改革，或改革少的國家，而是那些改革多、改革大的國家。八九民運對整個專制制度的嚴峻挑戰，六四屠殺埋下的深仇大恨，都迫使當政者感到一種勒緊繩索、同舟共濟的需要。他們發現，如果他們彼此之間不建立起最起碼的相互信任而明爭暗鬥並導致公開分裂，勢必會使整個共產黨統治陷入極大的危機。最近，鄧小平、陳雲等一再呼籲黨內高層要團結，不要彼此不服氣，不要吵架，正表明了這種擔憂。假如當政者共同具有上述認識，捷克道路便是其唯一的選擇。

然而，中國要走上捷克道路，談何容易。首先，黨內裂痕太深，各派力量之間，關係壞的，已是你死我活，勢同水火；關係好的，也是同床異夢，各懷鬼胎，必須看到，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一向比東歐黨內的鬥爭要來得更頻繁、更殘酷。其結局常常是：勝者通吃，敗者輸完。因而，誰要是對別人存一點信任，往往到頭來輸了還不知怎麼輸的。前段時間不少人以為，胡啓立、閻明復等人在略作檢討後，還有希望保住原有的地位（有人甚至說閻可望升遷），但後來却是全數出局（雖然眼下還沒有一輪到底）。據悉，李鵬一派的咄咄攻勢，

業已逼到了萬里等人身上。在元老級人物即將撒手西去而國內危機又頭緒萬端的情況下，高層權力鬥爭顯然處於一觸即發的危險邊緣。要保持團結無疑是相當困難的。再加上在這次鬥爭中，武裝力量已公然上場，那意味着鬥爭必然是更沒有規則、更沒有底線，因而也更難以調和。

其次，在中國，「上面」與「下面」的矛盾極其尖銳。試比較「布拉格之春」與八九民運，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有顯著的不同：

A、在一定程度上，「布拉格之春」是由捷共上層帶頭發動的，而八九民運完全是一場民間的獨立的運動。

B、「布拉格之春」是讓外國的軍隊鎮壓下去的，八九民運是讓本國的軍隊鎮壓下去的。

C、中共鎮壓八九民運，遇到了更英勇的抵抗，付出了更沉重的代價，埋下了更深的仇恨。

我們知道，匈牙利革命（一五五七年）和布拉格之春（一九六八年），都是被蘇聯軍隊鎮壓下去的，但匈牙利人民的反抗更強烈，犧牲更慘重。也許，正是因為匈牙利人民的拼死反抗到頭來仍不免於失敗的這一先例，使得捷克人民在強大的入侵者面前沒有進行多大的抵抗。這一方面固然是減少了流血，但另一方面却會增強民衆的無力和宿命觀念。無論如何，拼死而戰要勝過不戰而屈從。一場英勇壯烈的失敗能夠更好地保存人民的反抗意志，同時，它也構成了對僥倖得勝的統治者巨大的壓力感。迫於這種緊張的對峙形勢，統治者常常不得不作出若干讓步。一九五七年匈牙利流血事件後，匈牙利的改革，一直走在東歐各國前列，其間雖然更多的是表現為「上面」的主動

而較少看到「下面」的大規模民主運動的發生，但是當年那場血與火的洗禮災難是起到了相當的作用。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民主改革的復蘇，很可能會比六八年後的捷克來得快一些。

當然，倘按照美國前國務卿布烈津斯基的觀點，捷克遲早也將走上現在的波、匈道路。因而，所謂「捷克式道路」無非是一種過渡狀態。事實上，波蘭、匈牙利的民主化進程能夠在遭到嚴酷壓制後演進到今天這個地步，其間也經歷過一個不知的時間。考慮到當今整個國際大氣候和八九民運的偉大聲勢，我們可以相信，六四之後的中共當局若要搞什麼「恢復正常秩序」或曰「正常化」，肯定是相當困難的。

(四)、非共產主義政變，內戰或地方割據

上述三種可能性，都是指中共最高層能夠持續地控制全局，或者是在經歷了一場速戰速決



林彪和他的「艦隊」——黃永勝（右二）、吳法憲（左二）、李作鵬（左一）、邱會作（右一）。

決的宮廷政變後迅速地控制全局。與此相反的情況，即中共最高當局失去控制全局的能力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這種可能性又有三種不同的形式。

A、第一種形式是非共產主義政變。一般來說，在中共高層，發生政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政變的性質，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發動政變一方的原有地位。以林彪的情況為



躊躇滿志的楊尚昆，六十年代曾任中央辦公廳秘書長。

例。林彪的奪權計劃看來是包含着兩套不同的方案。其一，假若林彪能在外表上和順利地接過最高權力（毛澤東自然死亡或是被林在外界不知曉的情況下秘密殺死），林彪一定會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當然，在實際事務中，林彪將會對毛的路線作右的修正）。其二，假若林彪面臨着不得不與毛或毛派公開對抗的局面，林彪便可能乾脆扔掉毛的旗幟（因為這面旗幟明顯地屬於對方），而打出「真

走麥城的楊尚昆被紅衛兵揪鬚。



正的社會主義」的旗號（見「五七一工程紀要」）。

基於類似的道理，今天，試圖發動政變者如果由於地位的限制，不能方便地接過共產黨的「正統」，他們就只能公開打出非共產主義的旗幟，畢竟，今天的中國人，即便不是對共產黨那一套十分反對，至少也是不感興趣。拋棄那套僵硬的教條，正大光明地提出自由民主的綱領，無疑能在民衆中獲得最廣泛的擁護。不少朋友把這一次六四屠殺類譬喻當年的戊戌喋血，它意味着共產黨已然失去了最後一次挽救自身的機會，非共力量的興起與獲勝將是不可避免的。倘僅就人心向背而言，這種估計肯定是正確的。

當然，在現時條件下，要發生非共政變也非易事。早在六四屠殺之前，許多人就期盼着統治集團內部會出現公開的分裂和對抗，但這種分裂和對抗到頭來並未發生。那倒不一定是因為統治集團內部沒有離心份子，主要的恐怕還在於這些分散的離心份子未能聯絡成一股有組織的離心集團。群眾運動可以在事先未經籌劃的情況下轟而起，應運而生，但要發動一場政變却非要經過預先的周密策劃佈署不可。

然而，這種事先的聯絡和策劃本身又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古往今來流產失敗的政變，百分之五十是輸在預先聯絡策劃不周上，另外百分之五十則相反，正好是輸在過份追求預先的周密聯絡策劃，反而走漏風聲，延誤時機，致使大計胎死腹中。照說，林彪應該有許多機會搞掉毛澤東的，但由於林彪總是擔心他是否能夠控制住毛死後的政局，因而總是希望把政變搞得盡可能的不留痕跡。也許我們應該說，正是這種面對不可確定的後果的猶豫不決，導致了林彪政變計劃的全盤失敗。

留心觀察共產黨內權力鬭爭的人也許都注意到這樣一個費解的事實。那就是，在歷次鬭爭中失敗的一方，常常表現出驚人的逆來順受。即便對方明顯有意置自己於死地，他們也更多的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斃，而很少起而抗爭。胡耀邦被稀裡胡塗地丟掉了總書記的職位，他甚至於連蘇聯的葉爾欽科那點勇氣都沒有，不敢公開地繼續為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呼籲奮鬥。有人稱這種逆來順受是忍辱負重，是顧全大局、是黨性堅強。實際上那只是對濫用強權的怯懦屈從和對自身權利的自我放棄，它們正好是奴性的表現。至於說什麼顧全大局，那只是顧全了一小批共產黨最高統治者的大局，却完全是破壞了整個共產黨的大局，更嚴重的，是破壞了中華民族的大局。

如果發生非共產主義政變，鑒於共產黨自六四後人心盡失，全國思變的背景，很難設想有多少人會派兵勤王。因而，重演當年武昌城內幾聲槍響，半月之內全國十五個省宣佈獨立的故事就未必沒有可能。只是由於我們對中共內部之事畢竟瞭解得十分有限，所以我們尚難對發生此種政變的可能性大小作出預測。

B、關於內戰

人們是否希望打內戰是一回事，內戰是否會發生是另一回事。我們要記住，在政治中，常常不是人支配事變，而是事變支配人。八九民運的結局肯定不是參與事件的各個方面所預先期望的（李鵬等人也不期望八九民運以六四大屠殺為結局，因為他們希望最好是制止事變於萌芽狀態之中），但它終究還是發生了。

據說，在一九七五年，毛澤東曾經詢問王洪文和鄧小平：二十年後中國將會是什麼局面？王回答說：二十年後的中國將是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鄧小平則回答說軍閥混戰。毛對王的答覆不以為然，但對鄧的回答却深表同感。一九八五年春天，著名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曾經表示，他擔心中國還會出現一場大的災難。

在中國，爆發內戰，出現大災難的危險絕對是存在的。正是出於對這種前景的深刻憂慮，才使得中國的民運人士一直追求一條溫和理性的漸進路線，使得中共當局能在八九民運的巨大挑戰面前較為一致地採取壓制方針，並使得其它某些有實力有野心的人物不敢輕舉妄動。但是，由於各個方面的最終目的是如此互相衝突，更由於六四之後各方面調和妥協的機會大大縮小，因而爆發內戰的可怕前景尤其不可低估。再考慮到目前中國社會各個領域日益深化的嚴重危機，我們的確可能又一次遭遇到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過的所謂天下大亂。至於說這場大動亂最終是否會引出較好的結果，那是另一個問題。

C、地方割據

假如中共上層在最近的將來沒有發生重大的衝突變動，地方割據的趨勢必然會迅速加強。這就和鐵托之後的南斯拉夫的政局較為類似。現在南斯拉夫流傳着這樣一則幽默，這則幽



李鵬可謂春風得意，一帆風順

默斷言，到了公元二〇〇〇年，整個歐洲將存在十個國家：一個是西歐聯邦，一個是東歐聯邦，另外八個叫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有八個共和國）。

近些年來，由於中央權威的式微，由於經濟改革的混亂無章，地方割據的情況已經有了相當的苗頭。今後，隨着鄧小平等強人的去世，以及中共當局在政治經濟等各個問題上的政策矛盾，進退失據，再加上人民大眾普遍的不滿與反對，各地方的實力人物一定會在對中央陽奉陰違的前提下，拼命地擴張自己的勢力。在政治上不民主而又缺乏強有力的權威、經濟

們要看到此一事件對中共專制的雙重效應，一方面，六四屠殺使中共當局背上了沉重的巨大包袱。不否定六四屠殺，則中共當局無法改變它與中國人民、至少是在政治上活躍的那部份中國人的對抗關係，從而無法改變它坐在火山口上的緊張局面。另一方面，六四屠殺又是中共當局的一筆資本，它給予業已朽壞鬆弛的中共專制機器再一次注入了新的（儘管很可能是飲鳩止渴式的）動力。憑藉着對中國人民的恐怖與威懾，中共得以繼續維持自己的統治。中共當局目前的困難是：它既不能做到在繼續保持其控制力量的同時又做到減低人民的反感上不自自由而又有許多可鑽營的漏洞的情況下，形多人將會用一切手段追逐眼前利益而罔顧其



江澤民新官上任。他能善終嗎？

它。這種「好又不好不起來，爛又爛不透」的狀況所造成的一個最明顯可見的結果便是偌大的中國陷入事實上的分裂與割據。這種割據一般來說是弊大於利，而且，它和內戰僅有一步之遙。

三、影響中共 上層變化的三層因素

影響中共上層變化的因素可分為三層：

第一層因素是中國社會的嚴重而深刻的全面危機。它們包括政治危機、意識形態危機、文化危機、道德危機、經濟危機、人口危機、生態危機，等等。此外，還有民族矛盾、內地與沿海、中央與地方、窮省與富省之間的矛盾，以及香港問題、台灣問題、海外留學生及海外民主力量的問題，再加上世界範圍內的民主化趨勢，尤其是蘇聯及東歐國家自由化運動。這些都屬於影響中共上層變化的基本因素。

八九民運與六四屠殺構成了影響下一階段中共上層變化的直接因素。談到六四屠殺，我與敵意，它也不能做到在削弱人民的敵意的同時而又不削弱其控制能力。簡言之，中共若想減輕包袱，它勢必就削弱了控制；它若要保持控制，就不能不繼續背着那個巨大的包袱。因此，對中共當局而言，不否定六四屠殺，很危險；否定六四屠殺，也很危險。解決它，無兩全之策；繞開它又不可能。單單是圍繞着這個問題本身，中共就使自己陷入了難以克服的矛盾並必然會引發非同小可的鬭爭。

作為中共上層變化的誘發因素則是其最高權力的交接轉移問題。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第一代元老，在三五年內免不了會先後死掉。鄧小平是今年死還是明年死，鄧小平和其他元老誰先死誰後死，都會對上層的權力鬭爭造成

不可忽視的影響。一九七六年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在相當程度上是和周、朱、毛（尤其是周、毛）幾人死亡的時序有關係的。在談到鄧小平之後中共上層可能的變化時，我們似不應忽略同樣的問題。盡管說在鄧死之前，中共內部的權力鬭爭也很有可能再度爆發，但假若鄧和其他強硬派元老死得早一些，則中共現正權還來不及充分鞏固，因而爆發鬭爭的可能性就會更大些。最近我們注意到中共強硬派的清洗浪潮有增無已，並且在短短的時間內非同尋常地頻繁地舉行會議，都反映了他們急於在鄧死之前鞏固核心權力的迫切願望，那反過來也證明了他們對自己目前的權力地位還十分缺乏自信的緊張心態。

鑒於中共上層鬭爭的撲朔迷離的局面（簡單歸類：無非是在近期內發生戲劇性變化和在一段時間內相對穩定這兩大種可能性），中國的民主力量應該迅速地制定出緊急應變的方針，並同時規劃好長期抗爭的戰略構想。

環球汽車修理行

地址：112-21 Roosevelt Ave
Corona NY 11368

電話：(718)429-1400
(718)429-1442

華人經營

精修各種引擎、線路、
板金、噴漆、換油、保
養、舊車買賣、歡迎比
價。

小閻主持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

新一輪內鬪：

江澤民VVS李鵬

丁民安

黨內鬪爭是中共的不治之症，縱觀中共統治大陸四十年來，不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中共黨內的「內鬪」，從來沒有停止過。

自江澤民被捧上了中共總書記的座位，中共又啓動新的一輪內鬪。

可以講，江澤民一當上總書記，李鵬與江澤民的鬪爭就開始了。這非但是他們繼承了「黨的光榮傳統」，同時也是由中共的專制架構決定的。

在趙紫陽未撤職前，李鵬想盡辦法整趙，除了「保守」與「革新」的不同外，李鵬想當上總書記是一個重要原因。姚依林也想當總理，所以與李鵬一起攻趙。如果李鵬奪取總書記職位，姚依林的總理夢就垂手可得。在這一次學生與市民的民主運動中，李鵬伙同姚依林，竭力巴結鄧小平，攻擊趙紫陽，甚至充當鄧小平屠殺學生與市民的急先鋒，妄想用和平示威學生的鮮血染紅他夢寐以求的總書記桂冠。但是萬萬沒有想到老鄧指定了江澤民當總書記，吃驚之餘，李鵬就像當年張春橋獲悉華國鋒當總理一樣的惱恨與光火。毛澤東、鄧小平雖然都是暴君，但他們均有打仗奪權及統治與鎮壓人民的「經驗」與「才幹」，而在毛、鄧卵翼下的李鵬，具備極權專制制度下造就的接班人的那些普遍特徵：媚上欺下，見風轉舵，唯權是命，養尊處優，政治野心與智能才幹不匹。

李鵬在鎮壓人民以後，沒有升就意味着降。對李鵬來說，好像吃了一帖悶藥，其中之苦味心知肚明。

鄧小平不讓李鵬當總書記，不乏以下幾種原因：李鵬是陳雲、彭真的傀儡，而陳雲、彭真與鄧小平既有聯合（鎮壓人民）又有鬪爭（爭權奪利），讓李鵬當總書記，不利於鄧小平的幕後指揮；另外，鄧小平在中共黨內一向高喊「改革開放」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如鄧小平讓對經濟改革偏向保守的李鵬當總書記，勢必難能按鄧小平的想法去行事。同時，鄧小平也知道李鵬是非常無能的人，他當了幾個月總理差一點「亡黨亡國」，如他當了總書記，國內外的矛盾將進一步加劇。因此，從鄧小平個人的利益出發不讓李鵬當總書記，是一着幾經考慮的棋。

可想而知李鵬的不服氣，李鵬、姚依林小圈子的不服氣，立即被鄧小平覺察，這才有如下鄧小平的「最新最高指行」：「不要不服氣。中央領導班子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不要搞小圈子。在我黨的歷史上搞小圈子是沒有好結果的」。

李鵬、姚依林在鄧小平講話後，反而加快了小圈子活動。他們在竭力拉攏楊尚昆與喬石。而江澤民當然心中有數，他要坐穩總書記的位子，確是一件難事，李、姚不會真心實意支

持他。當全國許多省市祝賀江澤民當總書記時，唯獨李鵬的親信李錫銘控制的北京市委遲不表態。在這種形勢下，江澤民除了緊緊依靠鄧小平外，他必然會與李鵬、姚依林小圈子外的人進行溝通，主要是萬里與秦基偉。六月初萬里在上海「養病」及在中共四中全會期間與王震拍桌對罵。在倒趙初期，李鵬非常想剪除秦基偉，後來是鄧小平保了秦基偉。因為他是鄧小平二野時的老部下，但是鄧小平用秦基偉也是一着棋中棋。鄧小平慣於搞平衡，在軍內也是如此。鄧用楊，但不希望楊的軍權太膨脹，那麼，老部下秦基偉可起平衡作用，另外，如鄧決心讓出頭銜，那麼楊也得讓出頭銜，在這時，秦基偉護江澤民總書記的駕是十分重要的。秦基偉當然心領神會，他在今年的中共「八一」招待會上特別強調「要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而一天，報上登的人民日報社論却只提「在黨中央領導下」，另外請注意七月三十一日海外版人民日報上秦基偉連着萬里與江澤民坐在一起看節目的照片。李鵬、姚依林沒出席。

現在，李鵬多少有一點像七六年的江青，在鄧小平死後，他要麼發動武裝暴亂，要麼被秦基偉等擒拿。李鵬要發動武裝暴亂是困難的，但是秦基偉若不果斷堅決迅速地行動，也很危險。

民主運動三難題

范璞

中國的民主運動，在可見的將來，會長期地面對幾個難題。即使在專制的現政權被取代之後，這些問題還是存在的。爲了便於討論，且歸納成三個題目。

(一) 中共遺風的取捨

今年的學潮，波瀾壯闊，終於鼓動了民衆，拋開面具，向獨裁政權提抗議和要求，這是歷史性的成就。可是成就的後面也包藏了隱憂，因爲學運的形式和作風，和以前中共的運動方式，很多地方是一脈相承的：以有效的組織，造成一種萬衆一心的氣氛，使本來持異議的人和猶豫的人，受到心理壓力。一下子運動滾雪球似地膨脹起來，熱情洋溢，高喊誇張的，後來自己不能兌現的口號。戲劇性濃，而理性的控制難。

這種做法，在當時這個關頭是必要的；不然哪裡能形成一股力量，和強權分庭抗禮呢？而且這幾次參加遊行的人，顯然是自動自發的成份遠高於被動的成份。做以上的批評，並非對已經過去的還吹毛求疵，而是對未來有點擔心。一次成功過的方式，往往後來被當作法寶。中共早年以遊行示威對付國民黨，後來仍常常用這手法來推動他自己的政策。正像可以在馬上可以得天下而不宜馬上治天下一樣的道理；這種激動的，多少使人感到些心理壓力而情不由己的參與方式，可以應急，但不是最適宜

於左右中國前途的工具。民運的中堅人士，不少經這次的學潮而露頭角；望能避免中共的覆轍，別以這種方式爲政治活動的康莊大道。

還有其他中共模式的遺迹，值得注意。一位同情學運的美國留學生（SARAH TUB—MAN），在學運期間暫作採訪記者。後來失望地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說，學生們學民主之幟而不行民主之實。記者們想進入學生大本營去採訪，總要靠關係、講人情，和跟中共打交道差不多。至於造謠說李鵬被刺的學生，自辯說是學中共的伎倆而還治其身，就更不可取了。

在今年五、六月間那種緊急場合的失着，固亦難怪。但有些開明人士平時的談吐，也流露中共的口音。高明如劉賓雁，在「時代的召喚」裡說：「當然，多年來階級鬭爭的對象搞錯了。真正的敵人，我們打了幾個呢？林彪，「四人幫」打了嗎？他們的徒弟徒孫不是如今還健在嗎？」這犀利的口氣所談的對象雖然不同，但對斬盡殺絕的手法的肯定，却和中共整人時的音調何其相似。該文還有以下的抱怨：「但「左」的東西仍不很臭，甚至搞這一套的人還可以大搖大擺招搖過市，不擔什麼風險。」即使是政敵，難道我們要他們過馬路就擔風險嗎？

當然筆者並不是說，凡是中共的東西都是不好的。在意識方面，早期中共那種扶弱鋤強的正義感，那種對勞動的尊重，還是當前中國



民衆在民主牆前抄錄大字報

社會所需要的。即使在中共的工具方面，早期推廣大字報的應用，也有其正面價值，後面再談。不過，在這裡主要強調的是，中共一開始就認爲，只要目的好就可以不擇手段，這是它的致命傷。經驗告訴我們，過程是重要的，手段光明是重要的，而且不同的工作習慣是重要的。只受過中共教育的民運人士，看慣了中共的虛誇作風，無形之中習以爲常，實無可厚非。但假以時日，希望中共的壞習氣，在民運之中是在減少，而不是根深蒂固，積重難返。

(二) 西方模式的取捨

北京一位計程車司機說，他曾多次免費載學生去天安門；但看了這民主女神，總覺不像是個中國人的東西，心裡很不舒服。馬利蘭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和學人，辦了個中國問題的座談會。却不叫「座談會」，偏要叫「沙龍」。國內崇尚民主的藝術家，似乎很喜歡以裸女爲題材。裸女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似乎不配當作爭藝術自由的一個焦點。這些都是小事，但

也可以看到，從厭惡中國的現政權出發，很容易流入過份洋化的毛病，和中國文化和一般民衆脫節了。把民族意識這利器，雙手交給中共去繼續利用。

遠比這些小事嚴重的，是把學西方的法制，當作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捷徑。很多人已經把希望放在這上面了。西式的法制，當然有很多優點。但並不真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以前美國的最高法院，曾肯定種族分隔有理，肯定黑人不是公民。今天美國的稅法，改革了又改革，仍改不了富人可以找漏洞的傳統。基本的事實，是遍天下強欺弱的自然趨勢，永遠不能消滅掉。不同的階級或膚色，固然會強欺弱；同一個階級和種族的圈子裡，一樣會強欺弱。西式法制，條文繁，官司耗時久。複雜難明的條文，是弱者比較能利用呢？還是有錢僱律師團的強者比較能利用呢？明乎此，那麼何以美國的富人能合法地逃稅，何以幫窮人的法令結果反而幫了富人，都不足怪了。

至於政治上，照西方的法制，以選舉爲民主的保障，也有不少流弊。像在美國競選需要大量經費，於是捐款集團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於是國會改選時，在位而想做下去的議員，絕大多數能連任；於是大量的選民，沒有興趣去投票。

筆者絕不是說不要法制，只是說法制本身的力量是有限的。西方法制有效的地方，往往還要靠新聞界的監視，兩黨勢均力敵的互相抵制，和社會風氣的變遷。（法官總也受風氣的影響，美國最高法院後來認爲種族分隔是違法的了，便是一例）說穿了，問題的關鍵是要牽制有權的人，不讓他們濫權。西方上軌道的國家裡，有多種牽制的因素在，政治、經濟、輿論、法律，每一種圈子內有對手在角力，而不

同圈子的力量又互相制衡。我們與其把重點完全放在「法制」兩字上面，不如肯定「多方牽制」的必要，培養適合中國國情的各種牽制力量。法制也是其中之一，但不宜把西式法制的執行方式也搬來用。因爲西式的執行法是死板的，長處和短處都在那「照字眼去做」的傳統。這種死板作風，連已經習慣了的美國人民有時也不心服，如果在中國照抄，更不能使廣大的民衆覺得公平合理。碰到一些不合常識的法庭判決，一定謠言四起，說是有政治因素或其他的背景，於是大家對法制失去信心。緩急之擇，輿論開放才是當務之急。法制首須保障言論自由，然而這自由也會幫助法制在中國生根。只有在光天白日之下，逐漸建立合情合理的法制，和兼顧條例的精神和字眼的執行方式；相當久以後，民衆才會心悅誠服地照法制辦事。到那時候，如果西方要改革其法制的流弊，可能還會以中國的經驗作參考呢。

（三）中國傳統的取捨

多年以來，國民政府在台灣一直以中華文化的維護者自居。但司馬昭之心，途人皆知。總使人覺得，還是歷代帝王的故技，利用傳統文化中安分守己和尊卑有序的觀念，穩固自己的統治。難怪有李敖和柏楊那樣的勇士，以生花之筆，嘻笑怒罵，非但把傳統文化說得一錢不值，而且認定這幾千年的文化是中國一切毛病的來源。大陸上的民運人士，也有對傳統文化持這種看法。

中國的傳統之中，的確有多年累積下來的病毒，但不少已經在五四前後給批判過。從積極的態度出發，更重要的，是分析這套文化中該保留的，好的是什麼。認明了什麼是我們作

爲中國人可以自傲的，什麼是我們可以貢獻給一個多元的世界的，那麼傳統中的垃圾，自然就容易丟棄些；而致力於改革的人士，也不至於像邯鄲人那樣，失其故步，匍匐而返。

如果把中國的歷史，和其他世界大國的史蹟比較，第一我們可以引以自傲的，是我們的祖先，不會因爲執着於宗教教條，而打來打去，殺人盈野。當然中國人會爲別種原因而自相殘殺；中國沒有大規模的宗教戰爭的意義，並不是說中國人愛好和平，而是說，中國人是平實的，不愛鑽牛角尖。中國人對宗教的態度是兼容的，不是獨尊的。

即使在今日的美國，同是基督徒，爲了該在星期六休息還是星期日休息，這點小區別，還可以搞得水火不相容。相比之下，中國才是「大熔爐」，把佛、道、祖宗、都拜在一起了。宗教對百姓的影響，不算輕微。中國民衆對宗教的態度既很寬厚，當然也推及其他。所以像中共黨爭時甲是左傾激進偏差，乙是右傾機會主義偏差，那種猶似基督教徒派系之爭一絲分千條的做法，是和中國文化格格不入的。百姓肚子裡明白：煙幕後面說的是，甲和乙都錯，只有抓權的沒錯，如此而已。

中國的傳統裡的確有封建的尊卑觀念。但一般人對權威的客氣是有限度的。是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心底却相信。其實人都是差不多的。中國歷史上那種非常肉麻，作踐自己的話，多出自無行的文人人口。就像近代郭沫若拍主子的馬屁，和臧克家「毛主席來到十三陵」：「山洪聽了縮脖子」那種妙語，異曲同工。但老百姓並不把自己看得那麼低賤。抗戰以前，浙東鄉下人看到宋美齡的飛機飛過，抱怨說：「女人的屁股在祖宗頭上飛來飛去，這天下要大亂了。」短短的一句話裡，暴露出迷信，

重男輕女。但也透露出一種平等觀念：早在六十年前，在鄉下人眼裡，第一夫人已經並不比常人的祖宗更尊。民運人士，與其抱怨中國農民的思想落後，何不發掘這種鄉下人平實的平等觀念。

這次天安門附近殺人之後，有替屠手開解的說：「在美國白宮前露營八週，也是不准的呀！」這一類的話，出自現實政客基辛格之口，還可理解；但也出自某些華人高等知識份子之口，實在是咄咄怪事。天下抗議的形式因地而異，難道只有照美國的規矩做事才算對的嗎？總也要看，在當時那種特殊情形，學生佔領廣場八週，在中國人眼裡是不是合情理，何必硬拖進美國平常情形之下的規矩來作準則呢？不錯，在民主政制方面，中國遠比美國落後，有很多地方可以向美國學習，像前面已經提過的「多方牽制」是一例。但中國習俗中比美國進步的東西，也不是沒有；只待我們去辨認。在這裡且舉兩個例子，都是看起來很輕微的，但却有幫助中國式的民主成長潛能。

第一個例子，是文學家被民衆認同的程度。美國有位精通中文的漢學家，去台灣住了一陣。回來說，他非常羨慕中國的報紙，有副刊專載散文和小說的；美國的作家是沒有這樣廣大的園地的。他是站在作家的那邊，看得眼紅。但我們從社會影響着眼，也可以肯定這是好事。以前大陸的報紙和今天港、台的報紙，多有文藝氣息比較濃厚的副刊。其中的小品文，有講理的、有談社會問題的，但更多的是像和讀者在交換做人的心得，時或透露一些哲理和詩意。難怪美國的名人是新聞報告人，中國的名人却包括像冰心那樣，並沒有什麼鉅著的作家。雖然一般人和名人之間的認同，無論如何都是膚淺的，但讀了某人的散文之後的認同，

總比聽了某人報新聞之後的認同，要深一層吧。大致上說，中國的作家在社會上的影響，比美國作家大。五月間人民日報曇花一現地實報新聞的關節，在第一版引用了榮毅仁和冰心的話，就是想借用經濟和文學的一點影響，來阻止武力鎮壓。結果雖然是徒勞，但展望將來，中國社會所需要的是多方面的牽制力量，那麼文學是已經有根基的力量之一。一位波蘭朋友和筆者說：「波蘭一直有天主教代表道義的力量，隱約可和共產黨的力量抗衡，這是我們的有利條件。」中國沒有入世的宗教傳統，但有些作家名字為民衆熟知，而文人多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只要丟掉文人參政習俗中的一些垃圾，文學家可以成為中國社會裡的道義力量的代言人。

應該丟掉的垃圾，不僅是郭沫若類的阿諛，那是很明顯的。不這麼明顯的病毒，是「忠諫」的傳統。古文觀止、資治通鑑那種文章讀多了，中國文人認為「忠諫」是很崇高的參政方式。可是總要被當權的傳見才有機會面諫，至少也要給當權的看中了，才有機會上萬言書呀。於是不少愛國的文人，包括一些國外的華裔學者，多年來在公衆前喋若寒蟬，不敢批評當權者一句，怕喪失了必要時上諫的機會。用心良苦，但一方面徒增統治者的淫威，另一方面自己却失掉了文人的力量的唯一泉源——真誠和正義感。現代化的中國，向領袖忠諫是官員的事。即使當權的是好人，文人也應站在和權力對立的地位講話，才能盡制衡之責。

第二個例子，藉見中國有比西方好的東西，只是講一個小小的工具。美國的新聞界雖比中國的敢言，但一位普通美國人民想發表自己的意見給大衆聽，却不是那麼容易。讀者投書給報紙雜誌的，登用率很低。如果是長篇大論

，更不用想被採用。相比之下，中國用大字報發表意見的辦法，很平民化。雖然大字報的讀者沒有報紙的讀者多，這些當地的讀者却往往是寫報者心中的對象。而且沒有什麼意義的大字報自然給淘汰，言中人心的大字報，會給抄傳出去，無遠弗屆。當然，寫報的人要署名，說謊要負非謗責，這些規律，要等言論開放之後，才會被大衆採納。到時大字報成爲一種優秀的、中國式的大衆通氣方式，却是可以預見的。

這兩個例子之外，還有一事順便一提。因爲近年來東亞四小龍經濟起飛，有的西方學者就說，四小龍和日本的共同背景，是儒家的傳統，所以這傳統是利於現代化的。這種以短期的成敗而論文化優劣的話，不是妥貼的。但中國人自己把傳統文化全盤否定的，不亦太自棄了嗎？

本文主要是提三個問題：(一)中共遺風的取捨；(二)西方模式的取捨；(三)中國傳統的取捨。在討論的過程中，爲了講得具體一點，也穿插了一些「該取」和「該捨」的例子。不過例子多是局部性的，不能算是對整個問題的解答。而且即使在局部的範圍之內，這些選擇也只是筆者的看法，當然包含了個人的偏見，不見得是對的。前行文時爲了避免拖泥帶水，不一一聲明，只在此作一個總的交待。這三個問題是複雜的，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方程式，可應用到所有的具體實例上，所以說是一「難題」。只有在實際工作的過程中，經過爭辯，經過試驗，才能恰當地擇長去短。亞歷山大時代的希臘詩人卡瓦非，在送征人上路時說：「希望您的行程，耗時而多難，這樣半途之中有足夠的學習機會。」謹借此言，贈民運的健士們。

離大革命只差一步

徐邦泰

「八九年中國民運」歷經「四月學潮」、「五月風暴」和「六月屠殺」，給中華民族留下了一個金色的日子——「四·二七」和一個黑色的日子——「六·四」。北京的民主精英在亡命巴黎驚魂不定之際，仍然沒有忘記確認「四·二七」——「中國的自由民主節」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日子」，並將「六·四」定為「中國國殤日」。中國大學生和北京市民以無以倫比的和平犧牲精神和非暴力道義力量，劃出了一個新時代。但是，值此全球人類追憶和紀念二百年前法國人民的歷史創舉時，我們當發現「八九年中國民運」離大革命仍差一步。

「我一直沒想到，軍隊會開槍」

吾爾開希和嚴家其等人在逃出虎口後，重申將仍然一如既往地堅持「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針，在任何情況下，都反對採取恐怖主義的手段。其實，這些學運的領袖們「六·四」根本沒估計到學生會有「頭顱擲處血斑斑」的厄運。當西德（明鐘）週刊記者問「什麼時候方料到，抗爭運動會被用軍隊鎮壓」？吾爾開希回答，「我壓根兒也沒料到這一點……我一直沒想到，軍隊會開始。」一旦屠殺開始柴玲等則相信「和平的最高原則就是犧牲」。據說，「這一驚天地，泣鬼神的口號，正集中表現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哲學信念；和平一

定戰勝暴力……」嚴家其先生還十分明確地表示：「一個主張民主的運動，是無法接納暴力的。」

顯而易見，這些民主精英，即使在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大搜捕、大處決的血雨腥風中，也壓根兒不會設想過「攻佔巴士底獄」。他們公開宣稱「要以進化的方式，而非以革命來使中國的社會向民主制度的方向推進」。這令人感動，多少也有點令人沮喪，就像「金兵有狼牙棒，宋人有天靈蓋」一樣，似乎只能是「你有坦克一輛，我有肉餅一張」。如果我們繼續稱贊這次民運為「革命」，那實在是有些過譽了。

吾爾開希一直沒想到「軍隊會開槍」，是情有可原的，在他才八歲時發生的「四五」慘案中，不過是用棍棒打人而已。而他們成長的時期正好趕上「十年改革開放」，加上共產黨的總書記趙紫陽信誓旦旦保證過「決不秋後算帳」，連海外那些深知「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吃素的反共人士都難以想像會發生坦克壓人成餅的慘況，連天安門廣場上堅守到最後的學生們仍然在想像，頂多讓軍人架走罷了。

問題是，當經歷過一場空前殘酷的血腥鎮壓後，「一個主張民主的運動」，仍然是「無法接納暴力的」嗎？筆者的一些朋友在「六四」時非常急切希望另一支「解放軍」能以「以暴制暴」一下，盡管這類「兵變」並未發生，但人們的這種希望是合情合理的。方勵之躲進美

國使館，其他鬥士逃亡巴黎，這在實際上不是在求助另一種暴力的保護嗎？看來，中國的民主精英可以反對「恐怖主義和政治謀殺」一類的暴力，但決做不到也沒有必要，拒絕任何一種暴力的「合作」，否則，恐怕是除了犧牲之外，也只有是犧牲了。

「專政可以少講，或只做不講」

從報載鄧小平五月卅一日、六月九日和六月十六日的三次內部講話看，鄧氏一點不糊塗，據傳，他曾說過，「如果我們殺二十萬人，我們就能平靜二十年。」「六四」後，鄧又明確指示，「對於專政可以少講，或只做不講」，這一招是非常厲害的。

如果說「六四」慘案中死者有三千的話，香港（明報）七月十三日引述在北京已拘捕了三萬多人，這種「只做不講」的鎮壓殘酷程度和威懾作用絕不會輸於「六四」的坦克和機槍。筆者在上海生活時，曾親眼目睹八三年「打擊刑事犯罪」時上海當局奉鄧氏命令，如何一網一網「打魚」一般地拘捕了六萬人，然後把他們押送青海勞改。不要以為只是在八九年「六四」後鄧小平才這麼幹的。

當然，即使殺了二十萬人，中國亦未必能平靜二十年。平衡大師鄧小平的第三任接班人「黑馬」江澤民，就算李姚不搞小圈子，擁戴江澤民，在鄧氏在世時亦頂多「平靜」三五年。事實上，李姚在其後台的支持下，在路線政策上毫不示弱，他們正以驚人的速度倒退，新班子依然是「治國無方，整人有術」。鄧氏交代的三項任務，除「平息暴亂要抓到底」尚能貫徹外，「改革開放，懲治腐敗」和「經濟

不能滑坡」都只能是紙上談兵。

鄧氏表示：「等新的班子一經建立了威信，我堅決退出，不干擾你們的事。」趙氏慘淡經營十多年，最後以下台告終，江氏就是天才，至少亦要五年，如此下來，鄧公只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鄧公犧牲了胡趙，繼續維持一個「軍政黨」的統治架構（毛的時代是「黨政軍」）。鄧來日不多，一旦江有幸成爲華國鋒第二，又少不了同楊李姚的一場惡鬥，誰勝誰負，將取決於軍力（即暴力）較量（未必是戰爭）的結果，屆時亦有可能會出現「八王之亂」。

未來中國的民運領袖們如果不充分估計到這種「暴力」因素對民主運動的影響，恐怕在若干年後，人們一定會痛心疾首地在「四五」、「六四」之後宣佈第三個更爲慘烈的「中國國殤日」，你可以堅持非暴力主義，這樣，才可能成爲成熟的負責任的民運領袖。

「碑血碧燕，千秋祭」

筆者高興地看到，（國殤日週月宣言）中寫道，古老的中華民族只有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旗幟下，才能煥發出它全部的生命活力。

這表明，海內外一切中國人的民主力量已經認同，並開始走到一面旗幟下，人們正熱烈地期望中國本土民主力量同海外民主力量的聯合。雖然，種種原因會使這一聯合過程伸長，但全世界畢竟看到了中國獨立於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種力量。

六月中旬，在柏克萊加大召開的中國旅美政治學會第四屆年會上，不少會員在冷靜探討

八九年中國民運之後，都指出成立政治組織的必要性，並達成協議，分頭默默地去進行聯絡。我們將看到，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政治團體、中國民聯、學術團體政治學會、經濟學會、歷史學會等等，必將出現獨立的學生會和政治組織，一時間可能山頭林立，群雄並起，但最後一定會匯合成民主的聯合陣綫。

八九年中國民運，爲中國大陸的反對派、反對黨提供了成千上萬的精英力量，同時也空前緊迫地把民運理論建設的許多課題擺在民運人士的面前，暴力，就是非暴力主義者迴避不了的課題之一。此外，八九年中國民運起於方勵之先生呼籲釋放政治犯的人權要求，終以當局以大屠殺大搜捕大處決的踐踏人權的暴行結束。我覺得，中國民運旗幟上的八個字的順序應當是：人權、自由、民主、法治，我們必須從最基本的開始。

十三年前，當「四人幫」被華國鋒、葉劍英等以「政變」的方式粉碎後，筆者重讀民運先行者「李一哲」的大字報，填了一首滿江紅：

羊府街頭，檄文佈驚天動地，抨政事數宮中弊，滿腔豪氣，八億神州非阿斗，十年風雨焉兒戲，怎容它封建兩千年，重相續。

奸佞徒，權勢欲，居高顯，營私利，愚炎黃百姓，手無真理，法制摧殘皆有恃，民主踏踐全無忌，最堪憶，碑血碧燕都，千秋祭。

十三年後，又一次「碑血碧燕都」，其慘烈的程度是筆者亦始所未料的，筆者大體上仍然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只是相信，非暴力運動應當是有條件的。在中國現代史上，政治運動一定得有軍事力量相佐才能成功。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五日

於柏克萊

718-539-0700
539-0448

135-23 40RD • FLUSHING • NY 11354

名人旅遊

台北 · 香港 · 北京 · 上海



鄧 季 江 季 各出意外牌

李 遠

內容無從詳知，但中心都是一個：你們要什麼？

顯然，在這場重大事變中，各地諸侯的表現是十分關鍵的，中央哪一派可以贏得更多的地方官表態，就說明哪一派更有實力。地方各諸侯也明白這個道理，他們也明知，除非他們能夠聯合到相當的程度，否則他們並無法左右中央的大局。顯然，要想串聯十五個省反對中央是風險極大的，而且也不現實，所以最聰明的辦法莫過於趁着中央未穩，要看地方臉色的大好時機，和中央政府談判，伸手多要點實惠的利益。李鵬正是看透了這些地方官的心理，所以在四天之內，分別接見二十五個省市首腦。而且所有的談判都是開門見山，赤裸裸的政治交易。李鵬要的條件只有一個，表態支持中央政府，而各地地方官的條件則因地制宜。

在專制社會，統治者上層的變局常常是由於某個重要的位置出現空缺而引起的。這種情況恰恰好像一盤全部格都被佔滿的僵局的棋局，現在忽然少了一個大棋子，於是全盤皆活，所有的棋子都有了挪動的機會。大家都在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移動，同時也在防止出現不利的局面，以致被擠出棋盤。

在趙紫陽失勢後的中國政局，就是這樣一盤出現鬆動的棋局。

李鵬籠絡地方諸侯

李鵬並非像人們想像得那麼弱智。趙紫陽一倒，趁着「四中全會」，他和楊尚昆就分別接見各省市的地方官，輪流密談。談話的具體

有的省要的是更多的自主權，有的省市要的是錢，有的要的是能源，還有要項目，還有的野心比較大的地方官伸手要官。例如，已經超過六十歲年齡的廣東省省長葉選平就抓住了這個機會，要了個副總理的位置。（省部級的官以六十歲為界，副總理以上的不受此線的約束）

李鵬為了維持其統治，所有下面的條件，基本上上一口答應，空頭支票也不得不開。這一手果然高明，四中全會開成勝利的大會，一邊倒譴責趙紫陽分裂黨中央。

據說鄧小平和楊尚昆也是通過談判條件贏得各大軍區的支持的，有其師必有其徒。

江澤民收編趙氏舊部

四中全會之後，原上海市市長朱鎔基又回到上海，升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這個任命着實大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朱鎔基是個眾所周知的趙紫陽愛將。他在走馬上任上海市長時信誓旦旦地說：絕不辜負紫陽同志的信任。同時，朱鎔基在上海市長的任期內又與上海第一書記江澤民不合，這已是上海公開的秘密。戒嚴令頒佈後，江澤民代表上海黨委立即表態支持，而上海市政府却遲遲不表態，以致「人民日報」公佈的名單中其他省市基本上是黨委和政府蟬聯併署，只有上海黨委是孤家寡人。「六四」之後，朱鎔基的表態也很曖昧，他在電視講話中說：「六四」背後的情況很複雜，終有一天會真相大白。這句話當然可以從兩面去理解，可是在「六四」之後，中央要求地方是明確地表態。而這時講一語雙關的隱語顯然是不對中央的胃口。

從各種跡象看，人們都擔心朱鎔基會遭到清洗。可是沒想到他會升遷。這說明江澤民有可能收編趙紫陽的殘部。

這盤棋在江澤民眼裡是很明顯的：趙紫陽已倒，江澤民的主要政敵已不是趙而是李。能

夠對他構成威脅並有力量置其於死地的也是後者而不是前者。江澤民在黨內毫無根基，所以他唯一聰明的辦法便是利用趙紫陽的殘部來制衡李鵬。這一點又剛好和鄧小平的立場不謀而合。

朱鎔基只是個明顯的例子。其他省市的趙派幹部也基本未動。江澤民現正在各省巡視，分別找他們談話，穩定人心。而朱鎔基的榜樣是一劑最好的定心丸。因為與江總書記長期不合的朱市長都沒事，當然不會動到他們頭上。這叫燕昭王千金買死馬，死馬尚值千金，況活馬乎？

鄧小平設防楊家將

不久前，海外曾傳爆炸新聞，說楊尚昆在北戴河軍委會會議上為和國防部長秦基偉爭奪趙紫陽留下的軍委第一副主席空缺，與秦派將領發生火併，後派兵逮捕秦基偉和北京軍區，南京軍區及廣州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向守志及張萬年。這個消息後來被證實是不確實的。

實際情況是軍委會上確實發生爭執，但爭執的焦點並非像人們傳言的是軍委第一副主席的人選，而是「六四」屠殺的手段是否必要。對楊家將「六四」鎮壓不滿的軍人的後台是徐向前元帥，而秦基偉是徐向前的舊部，和徐有很深的淵源。此外，葉飛、楊得志、張愛萍等老將也頗有微詞。會上秦基偉和楊尚昆發生爭執，一怒之下，拂袖而去，退出會議，回北京去了。

此事傳到鄧小平處，鄧說會還要繼續開下去，問題要解決。於是請軍委秘書長洪學智，和總參謀長遲浩田去請秦基偉，恰遇北京軍區和南京軍區司令員周、向兩人在秦處發牢騷，

便一同請去。為了平息秦的怒氣，會議移到北京繼續，顯然，楊尚昆是讓了一步。

在這次「六四」大屠殺中，主謀顯然是鄧小平，楊尚昆的作用實際上被誇大了。楊自史以來就沒有獨當過一面，一直是個宦官式的人物。故他絕無此魄力和膽量下這麼大的決心。楊鄧兩人私交不錯，故鄧在下令鎮壓時請楊指揮，為保險起見，楊將他的親信部隊調來放在了鎮壓一線。造成了楊家將聲威大振的虛假現象。

「六四」之後，楊尚昆的所有行為均是自保，而絕非野心，若他有此野心，早在「六四」之前就可以支持趙紫陽取鄧小平位置代之。「六四」之後，楊雙手沾滿鮮血，民憤極大，和李鵬一樣，都是極有可能被拋出去的替罪羊。所以楊反而要拼命保住手中的實力，清除異己份子，以免自己被出賣。楊和李鵬一樣，他們反攻倒算實際上是因獸猶鬪的自衛。

「六四」之後，楊曾向鄧小平建言，調各大軍區主要首腦進京辦學習班，趁機調換其中一批人，包括上面提到的秦、周、向、張等。老謀深算的鄧小平心裡明白，這批諸侯要造反的話也絕不會是預謀的，預謀造反必事先串聯其他軍區，這在當時不太可能，而單獨軍區舉事風險太大，一般情況下不會發生。兵變只有在一種情況下爆發，就是下面的軍事首腦感覺到來自中央清洗的威脅，挺而走險。因此，鄧小平未取楊的建議，而是對軍事將領安撫懷柔，職位基本不動。

此舉另可一箭雙鵰，用秦基偉等人去制衡楊家將不斷擴張的勢力。在這種情況下，老鄧顯然不願讓楊、秦之中心任何一人當軍委第一副主席，所以他提名的第一人選是江澤民，第二人選也是王震，還輪不到楊尚昆。

中國民聯擴大招收盟員

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上幾千名死難者的鮮血，決定了全世界每一個炎黃子孫的政治立場。我們的人民在流血，我們的國家在受難，中國人民已經別無選擇，正如中國人民的公敵——鄧、楊、李政權也已經到了別無選擇的地步一樣。

中國民聯成立五年來，一直致力於推動中國大陸民主運動不遺餘力。鄧、楊、李政權對我們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二年前，他們借楊巍事件把我們打成「反動」組織，今年年初，又一次借三十三人的簽名運動由國務院宣佈我們為「反革命組織」。目前天安門前這個運動，中共中央宣傳部文件再次宣佈中國民聯為「反動」組織，學生運動後面的「黑手」。

為了中國的民主而受到這種政治對待，我們，作為一個中國民聯成員，感到無上驕傲、無上榮光！

從今日起，我們準備公開在海內外招收盟員，敢於和我們站在一起的中國人，請加入中國民聯！

電話：(718)507-4739

解嚴之前的北京

古雪姣

舊曲新辭，革命歌曲大家編

針對新青年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中共老人黨沒有什麼招數可以用來洗腦，於是由「老八路」王震想出了一個傳統辦法，讓娃娃們大唱革命歌曲。

據國內消息來源稱，王震在六四後的一次校長工作會議上曾經發表過這麼一通講話：政治課程要恢復，但不一定有用，我年輕時就不喜歡讀馬克思的書。但年輕人喜歡唱歌。你們看，他們在天安門廣場嚷民主，懂個屁！還不是唱了兩首歌：一個叫「國歌」；另一個叫「國際歌」。

王震還對各大學校長說，你們沒帶過兵，不懂青年心理，所以把娃娃們教壞了。我們的戰士也是青年，為什麼政治立場堅定？因為他們天天唱革命歌曲。你們回去後，要學習解放軍的方法治校，譬如，吃飯前要唱「社會主義好」，就這麼辦！

現在，北京各大學校已經開始大唱革命歌曲的活動。像解放軍軍營一樣，每日食堂開飯時，學生會要組織學生唱歌，然後才能吃飯。革命歌曲的曲目有：「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等等。

北京的學生都是文革後長大的，唱起革命歌曲覺得十分滑稽。但他們亦發現，革命歌曲

顯然比流行歌曲好唱一些，不必用「輕聲」一氣聲」等歌唱技巧。於是，他們便在舊歌曲中添上新詞。這些新歌詞便一下子流行起來，其中有兩首是這樣的：

原詞：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新詞：東方紅，太陽升，中國死了個毛澤東。如今又來個鄧小平，帶着坦克進北京。

原詞：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覺悟高。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挾着尾巴逃跑了。全國人民大團結，掀起那建設社會主義新高潮。

新詞：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官倒不得了。幹部子弟私囊飽，日本鬼子挾着皮包回來了。全國人民站起來，掀起那民主改造中國的新高潮。

北京學生學會了這些革命歌曲後，把這些歌曲作為特殊武器靈活運用。例如新近北京大學臨屆畢業生，為抗議校方的強行分配的政策，六月二十三日數百名學生聚集三角地，鼓盆而歌。為防止中共軍隊藉故佔居校園，同學們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校領導向中央匯報時說，大學生雖然在學校聚眾，但沒有鬧事，「因為他們唱的是革命歌曲」。

學生削髮，大兵圍剿五台山

五台山，中國四大佛山之一，座落在北京城西南五百華里，冀、晉兩省交界處，巍峨峻偉，神閣聳立山間，著名的旅遊勝地。自四九年以來，這裡的佛家弟子從五百多人減至十餘人，並由當地縣政府直接管理。

然而，今年六、七兩月，不知是佛祖顯靈，還是風順水轉，突然從北京來了一批批學生，上山削髮為僧，一時間香火旺盛。不想，這却為五台山佛門引來了一次「大兵劫」。

某一日，北京某部一個團的兵力，帶着高級通訊設備和輕自動武器，突然將五台山包圍起來，展開了一場大搜捕。

原來，近月裡到五台山削髮為僧的學生，都是北京學潮中的積極份子。他們在六·四屠殺後，已無法安居學府，只好長途跋涉，來到五台山「政治避難」，以期靠佛祖的神靈保佑自身的安全。

這些學生真是太天真了。他們居然忘記，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佛門豈能避政治之難。中共在全世界的攝影機前都敢大開殺戒，五台山這種幽靜的佛門去處，自然防不住他們。

大兵們將五台山各條通路封住，通訊兵直接從北京獲得命令後，開始搜山。只見大廟裡一片喊叫聲，凡是戴眼鏡的，講北京話的和尙，一律被大兵們帶下山去，押上兵車，載回北京城。

當地的五台人稱，「五台佛門靜，未免亂世劫」歷史上，五台山百年內必有一次劫數，但不想現在却成了十年一劫。一九六六年，五台山便遭受過一次「紅衛兵劫」，那畢竟是年輕孩子們上山「破四舊」，砸了幾尊佛像而已。此次的「大兵劫」却是真刀實槍真抓人。

之後不久，北京中國佛教愛國協會曾經為此事，向有關部門抗議。但是在中國，從來沒有過神權可抗拒王權的事情。「佛愛協會」亦

只好不了了之了。

旅遊淡季，賓館淪為看守所

進入八十年代後，許多外國遊客到中國一遊後都會承認，盡管中國什麼都落後，唯有一樣東西不落後，那就是高檔賓館。一位在「北京飯店」住過的美籍華裔女作家，因飯店的服務高級而相信，北京已經消滅了蒼蠅。因為她在飯店裡住了多日，沒有見過一隻蒼蠅。

中國大陸的旅館的確不錯，是中國大陸開放後，第一個達到國際水準的第三產業。然而，外界有所不知的是，中國的賓館之所以迅速趕超了世界先進水平，絕竅在於：它沒有旅遊淡季的煩惱。因為，中共正在把北京的賓館變成公堂，關押和審訊大批學運份子。

六月盛夏，正是世界旅遊業的黃金旺季，一兩個月間，一般的旅遊公司都可賺到一年利潤的一半以上。可是今年的六月四日，北京城發生了一場大屠殺。殺紅了眼的士兵們，坐着軍車，在北京長安街經過時，胡亂地向建築物開槍。有一次，大兵包圍了使館區，闖入「外交飛地」要捉拿「狙擊槍手」。

於是，世界各國政府紛紛發出緊急呼籲，要他們的國民，不要到中國去旅遊。使大陸旅遊業面臨崩潰局面。據希爾頓旅業集團在中國大陸的總經理夏墨龍稱：希爾頓飯店在大陸北京、上海、桂林、天津、西安等地的所有賓館，已從往年同期百分之七十五的使用率，降至百分之三十以下。

據一位剛從北京回來的美資公司人員稱，他所任的北京前門飯店，是一個中檔飯店，目前一百多套房間，僅有幾個長期客戶和一兩個外國遊客。而其中的一層樓，不知被什麼黨政

據瞭解，六·四之後北京城被正式、非正式逮捕、拘留者達萬人之眾，其中有很多是外單位佔居了，二十四小時有警察守衛，不斷有警車將人帶進帶出。

北京的大飯店裡空蕩蕩。



地學生。北京市內現有的監獄、看守所皆已人滿為患。若大北京城，還真找不到關押犯人的合適去處。因為，北京人平均住房面積是每人四平方米。

到那裡去找地方關押這些政治犯呢？北京市長李錫銘終於想出了一個絕妙的法子來：把北京城內空出來的高級賓館，臨時改成看守所和法庭，緊急處理學潮後逮捕的這一萬多嫌犯。

於是，北京城內的許多高級賓館，都有一至數層樓，整個地被公安局所徵用。白天嫌犯在裡面提堂，晚上在裡面睡覺。

當然，即使是一流的賓館，改成看守所後也有所不同。原來一個雙人套房，現在要塞八個犯人在裡面，冷氣空調也不再供應。據稱，之所以使用賓館作為臨時看守所，這是因為北京市內的賓館都有一套公安人員建制（保衛部），而且賓館的建築結構易於看守。

上山下鄉，學生帶上禁箍咒

如今的學生為什麼會嫌共產黨不好？這是鄧小平一般老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思想問題。中國不是已經開放了嗎？不是已經可以穿西裝了嗎？不是已經可以放洋了嗎？你們為什麼還要上街遊行，分明是想叫我共產黨下台不可。

是的，老人黨不理解青年人，他們為什麼還不知足？那一定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毒化的。怎麼去清除毒化呢？老人黨根據自己的理解，當然是「艱苦奮鬥」、「不忘本」這一類的教育。

於是，中共新近作出有關對大學生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決定，規定大學生要接觸社會的實際，瞭解民衆的生活方式。其具體的規定是：所有高中生在考上大學之後，要先到軍營受訓一年；所有研究生在入校之前，先到工廠和農村去接受兩年社會教育。

問題在於，目前這項規定只適用於北京大

學，而其他省市的大學，可能不願接受這樣的規定。北京市高校招生委員會發出的「北京招生通訊」中透露，北京大學今年秋季入學新生，將先前往軍事院校進行軍事訓練，並由軍校發給結業證書，一年時間可以併入工齡計算。

此外，其他大學尚未知是否要推廣這樣的做法。研究生入校前的兩年體力勞動，已經被確定為全國的政策。據估計，北京市對北大新生軍訓的決定，雖然有懲罰北大學生的意味，但很可能推廣為一項全國性的基本政策。如果那樣的話，每個中國培養前途最好的青年，在入學前後就要浪費三年的時間。青春時期最寶貴的三年。另有畢業生疑心，強行將他們下放到農村兩年，是當局為了迫害參加學運的高年級學生的一種手段。一到了農村，主動權就在當局的手裡了。那些學運的積極份子很可能被用這種方式排除掉，永遠回不了城。

中共作孽，大兵池魚皆殃及

六四後的中國大陸，一片肅殺之氣，民憤由公開的、積極的發洩，轉為暗中的、消極的發洩。

北京的西瓜小販見當兵的來買西瓜，不是吹鬍子、瞪眼睛，就是亂提價錢。賣北京人六角人民幣一斤，賣當兵的則要一塊一二。北京的一位個體鞋販，拒絕向解放軍出售鞋子，被大兵報告公安局，被以「反軍」罪判刑，另據三〇一解放軍總醫院一位醫生透露，今年北京部隊的流行病發病率奇高，京畿部隊從地方強徵的蔬菜、水果，大部份都是受到病菌污染的，如果按正常情況下的部隊供給營養標準，這類食品將會被退回。但由於京城平添了二十萬大軍，新鮮蔬菜短缺，不要就沒有，部隊只有

乾受着。

在木樨地的一個北京部隊機關大院裡，曾經發生過一次水源下毒的事件，還上了內參。這次事件的時間正好是「七一」黨的生日那天。因為該部隊大院駐了一個團的野戰軍部隊，結果有人便在水塔裡面下了毒。造成一百多人中毒的嚴重事件，雖然下毒者至今沒有查到，但一般分析，是大院裡的部隊家屬幹的。

除此之外，當兵的夜間外出被襲擊事件，更是層出不窮。當兵的外出，輕則被人把軍帽搶走，重則在公園裡被小青年毆打。如果碰上「北京六四死難家屬敢死隊」則十分危險，輕則一頓悶棍打得暈頭漲腦，重則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因此，人們很難看到當兵的單身在街上走。

北京市還流傳着一個故事。據說二十八軍的一名連長，四川人。有一次在南池子嫖上一個妓女，上床之後，被該妓女用剪刀在下體動了「手術」。這位連長吃了虧之後，又不敢告訴別人，因為嫖妓行為違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後因流血過多，只好去解放軍總醫院再動一次手術。事情被上級知道後，派了一個班義士去抓妓女，早已無影無踪。結果這位連長被開除軍籍，送回了農村老家。

除了直接向劍子手部隊洩憤外，北京市民組織了各種各樣的地下團體，如「工自聯地下委員會」、「民主正義聯盟」、「市民懲兇游擊隊」等，還有專門向日本手下手的「血光敢死隊」等。目前，各種消極破壞活動遍佈全國範圍，從軍車、火車，到電影院的椅子、公園的金魚，全都成了民衆發洩不滿的對象。據說，七月一日，北京中山公園的幾十缸名貴金魚，不知被誰下了毒，有十幾缸魚翻了白，一位遊客稱：這叫「共產黨造孽，殃及池魚」。

挽回民心，本錢無多空悲悽

鑒於上述種種情況，中共中央十分惱火，又無計可施。因為人們在天安門廣場公開反抗，中共可以派坦克鎮壓，但十二億人民如果暗着跟你鬧，那是十分可怕的。

於是，最近鄧小平向中共書記處下指示，要盡快想出法子來，「幹幾件讓人民高興的事」。並且把「七一」黨的生日到「十一」國慶節這三個月，定為「革命宣傳月」。在新任總書記江澤民的親自督導下，按鄧小平指示，從國務院到解放軍總政治部全部動員起來，大做「好事」。那麼，中共做了那些好事呢？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這裡也一概介紹一下：

(一) 解放軍展開「微笑」攻勢

解放軍自稱「人民子弟兵」，但自「六四」以後，却成了全國人民最為深惡痛絕的對象。因此，鄧小平首先指示，「解放軍必須扭轉形象，否則，無產階級專政的江山很危險。」在北京剛剛擦淨坦克上血跡的駐京部隊，突然改頭換面，成群結隊地上街「做好事」來了。他們到公園、車站清潔衛生，到胡同弄裡給市民免費理髮，還派出機械師，幫助北京的個體戶修車，帶着氣筒在街上給市民的自行車打氣。派出宣傳隊，星期日在公園給遊園的人們免費演「革命節目」。

儘管老百姓一見軍人眼睛就會冒火，面肌就會跳動，但解放軍却不在乎，因為他們是軍人，軍令如山，他們見人就作出極不自然的笑容。這雖然無傷大雅，却讓北京的姑娘們煩得要命。

微笑攻勢的努力，無論如何，收到了一些效果。北京市火車站自從七九年以來，一直有一個老大難問題：就是各地上訪告狀子的人太

多，沒錢住旅館便睡火車站。北京站前的廣場很大，足有紐約時報廣場三倍，但還是被遊民睡得滿滿的。北京市政府會做過多次大掃蕩的努力，想清除車站廣場，但一直無果。

不料，解放軍到底是軍威赫赫。只見解放軍一到車站去「做好事」——清掃廣場，在那兒佔地盤的遊民立刻一轟而散，被服、行李扔了一片。如果說他們怕當兵的，解放軍並沒有帶槍，只是肩膀上面扛了把掃把，而且是來「做好事」的，不是來鎮壓的，有什麼可怕呢？不過，這些遊民進局子都不怕，就怕解放軍來打掃衛生。因此，現在的北京站廣場，確實是文革以後十年來最乾淨的。

解放軍做好事的另一成就，是北京市理髮店清閑了不少。因為解放軍上街理髮，不是做生意，願者上鈎，而是到街道委員會去找老太太，挨家挨戶拉小孩子去讓當兵的剃頭，反正是免費的，剃得好不好是另一碼子事兒。於是，北京的婦女現在有了一個哄孩子的新招。小孩子一哭，媽媽便說：「別哭，別哭，再哭解放軍叔叔來剃頭了。」小孩子一聽準不哭了。

(一) 出口轉內銷，老百姓吃上等蝦

「六四」之後，世界各國紛紛制裁中共，不向大陸賣高科技產品，也不買大陸的東西。結果不僅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生活的困難，反而有所改善，這是西方商人所無法想像的。

過去大陸的農副產品經濟有個特徵，就是「幹什麼吃不到什麼」。對蝦產地的大連人吃不到對蝦，大閘蟹產地的鎮江人吃不到大閘蟹，這是怎麼回事兒呢？原來這些名貴佳肴，過去都被國家統購，拿去換外匯了。

「六四」以後，由於出口被抵制，許多東西過去買不到。現在竟然市場飽和，只要你肯花錢，在大陸現在什麼都能買到。餐廳裡面也

推出了許多新菜，過去是花錢沒處買的，連「青島啤酒」也多了起來。

過去，大陸老百姓常說，開放以後什麼都好，就是吃得不好，好吃的都賣給外國人了。今年夏天倒是破天荒的現象。

(二) 國家補貼，物價下降，票券滿天飛。
鄧小平、李鵬作的第三件「好事」，就是用國庫的錢來買人民的情緒。據國內的人寫信

出來說，最近許多民生必需品，諸如糧食、雞蛋、布匹等，價錢都有所下降。當然這未必是件好事。

在八四年，八八年物價飛漲時，人們罵改革越改越糟時，趙紫陽的幕僚也會勸過老趙，要他實惠點，寧可改革失敗，不可喪失民心。

他們勸趙紫陽多撥些財政補貼，以免人民對改革不滿。但趙紫陽是個變法者，他深知只有經濟搞好了，人民生活才會提高，用補貼來維持改革的假像，最終意味着徹底失敗。所以趙紫陽情願讓李鵬、姚依林背後拆台，也不願用空國庫的方式製造繁榮。

但鄧小平等人不是這樣，他們在「六四」大屠殺中民心盡失，為了確保極權，不惜花錢製造假像，並一箭雙雕地讓人民感到，趙紫陽下台，生活反而好。

可是，人們都明白的是，財政補貼的方式是一項斧底抽薪的歪招，緊跟而來的，必然是經濟危機、物質短缺。經濟學家更預測，未來一兩年內，中國的經濟將會大崩潰。

這話不錯，現在在上海、東北、河南等工業省市，憑票供應的物品日見增多。例如，瀋陽的工人周末騎車下鄉買蔬菜的現象又出現了。因為很多蔬菜果類不僅貴，而且買不到，只好到農民的地裡去買。

一位三八年的「老八路」就說，當年在晉

察、冀邊區，沒有東西，沒有薪水，上面就開空頭支票給老百姓，就說解放了省城時，可以用這張支票分東西，不過當時共產黨畢竟兌現了諾言，從國民黨手裡奪來了江山，老革命都獲得了特權。但是今天，人民有什麼指望呢？江山就在共產黨手裡，空頭支票再也不會兌現了。

四十年來，中共著實作過一些好事，但它對民族所犯下的過失遠遠超過其德政。它的統治結構已經不敷使用。中共盡管真心實意地想為人民作點好事，但它已經沒有這個本錢了。以致建國四十大慶如此悲慘。

知識份子：胡蘿蔔今加大棒

在這次學潮中，知識份子顯然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災區，是中共領導人重點整肅對象。

「六四」之後，中央主管宣傳的常委胡啓立、書記處書記芮杏文均受到處分。文化部長王蒙、北大校長丁石孫等最近亦被免職。鮑遵信、金觀濤、蘇曉康等一批知識份子的書籍被禁止出版。現在大陸所有的新華書店都在清理書架上的書原來都是側放，現正面擺仍占不滿書架。一大批出版社、圖書發行公司、雜誌社被取締，私人發行書攤幾乎被掃光。

在中共對知識份子的一片大棒中，也夾雜着幾根胡蘿蔔。如最近身在海外的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長劉再復投石問路，寫信回社科院問院黨委關於清除自由化的政策。此信轉到江澤民處。江批了三條指示：第一問題談清楚；第二不作組織處理；第三在海外不要參加反動組織和活動。表面雖然寬容，但弦外之音，令人不寒而慄。

官園深處

— 中南海秘聞之二 —

末名

在中國人心中，毛澤東的後半生應該是在中南海渡過的，所以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崇拜的聖地是中南海，海外中國問題專家也認為中南海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居所。正因為如此，老毛從一九六四年底就搬出了中南海，今天我們所知道的豐澤園只是毛老頭以前的居所，也就是說，從文化大革命前，那裡就已經成為「故居」了。雖然老毛惜命，但他深知盤居皇城的重要意義，故沒有住到當初打進北京時的青山別墅，而搬到了一處專為他興建的別宮——官園。

官園原來是一個街名，地處北京西二環路車公莊地域，老北京人都知道那裡從前是一個大的集市，尤其賣鳥的最多，不過那種時代早過去了，只有六、七十歲的人還記得。一九六三年，突然大批民房被拆遷，雞犬不寧地折騰了大半年，在一片破舊民房區中，一圍極高（約十二米）的灰色磚牆，擋住了周圍居民的視線，從此，人們只能聽到裡面的聲音，看到持槍的大兵穿梭巡邏，沒有人知道裡面是幹什麼的，為什麼要建在這裡。

從此，在中國執政階層中，官園這個名字比中南海動政殿出現的次數還要多。

官園的歷史雖然短暫，從老毛六四年住進去到七六年老毛死去，八〇年部份地域對外開放，（宋慶齡少年兒童基金會兒童樂園），只有不到二十年時間，但整個文化大革命的策劃和發動，均發生在這裡，老毛的晚年生活和張玉鳳的艷聞也多發生在這裡，但當時高層社會中，能進出這裡的，也只有林彪、周恩來、汪東興等人，官園實際上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住在周圍的老百姓，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他們曾有過這樣一位鄰居，衆多人仍相信毛澤東一直到死都呆在中南海。

官園大園佔地約四十餘畝，十幾米高的硬質磚牆擋住了所有的視線，一九八〇年前周圍三千米處不准蓋二層以上的樓，二十四小時全戒備警衛，裡面有十幾幢三層小樓，以前專供中央辦公廳和汪東興等使用，老毛住在後園，一幢帶游泳池的兩層小灰樓裡，從園外的標準看是樸實的，從園內老百姓的眼光看，是豪華的，地毯、空調、衛生設備，二十餘間房間，分別佈置成辦公室、保健室、休息室和寢室。我想年輕一代領導人，那怕是鄧小平，也不願這麼孤家寡人地生活，但老毛畢竟是老毛，他生活的習慣中，始終不能克服農民習性的影子。

毛澤東時代的官園，由於資料有限，無從考證，但今天的官園，雖然前面部份由於恨汪東興的人爲了趕走走住裡面的主人汪東興而促使其變成兒童樂園，但後半部至今仍然戒備森嚴，一般人無法知悉。

上文曾介紹了文津街俱樂部，中共爲了安撫大批退休老幹部，使文津街俱樂部對已退休部級以上幹部開放，但更多的廳局級幹部怎麼辦，特別是那些中直機關（中央直屬機關，如秘書局、保密局、中央黨校、組織部等等）的局長們，其資歷遠大於後提小部省長們。還有一大堆中顧委員們，如何平衡他們，成了當時身爲中顧委秘書長、文津俱樂部主任榮高棠的一大難題，這時官園就成爲他手中的一根救命草。原來爲趕走汪東興時，是以把整個官園都辦成兒童樂園爲理由，但因兼任籌辦主任的榮某爲了替老鄧收買人心，擅自砍了一半園子，辦起了第二個俱樂部——官園老幹部活動中心。這裡雖然比不上文津俱樂部豪華，但也應有盡有，特別也建了一個買賣緊俏商品的小賣部，大受那些失寵的老頭們歡迎，於是乎，官

圍成了一批給共產黨買了一輩子命，只混到司局級老頭們發洩私憤的地方。每到周末，車水馬龍，豪華汽車夾着三、二個騎車老頭（退休後沒車坐的）一起湧進官園後門，同天津俱樂部一樣，一律憑紅卡進入，概不認人。從此也鬧出不少風風雨雨來。

八五年，中國社會掀起公司風時，這批老不老，不少的局長及太太們，按捺不住財欲和權欲，有一天蠢蠢欲動，聚集麻將室，外面北風呼嘯，但老頭老太太們一個個紅光滿面，一場偉大的戰役就要開始了。一個原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後來投誠的副部長張某，侃侃而談：「想當年我從黃埔軍校畢業，從軍前幹過一年買賣，賺錢非常容易，因為我哥哥是財政部駐河南專員，平價從國庫購進糧食，然後高價賣給小販，利潤一般在八成以上。這多年為黨工作，該讓我賺點錢啦。四九年參加共產黨，我連老婆的手飾都交公了，湊了一輩子罵。」

「對，我家原來是開鹽店的，紅軍一到江西全沒收了，我也只好當了紅軍，幹了幾十年，才混到十二級，我兒子倒彩電，一天比我一年掙得還多，我們有那麼多關係，不信就倒不過兒子們。」一個物資部的局長說。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最後協議成立一個聲稱為老幹部謀福利，實為利用手中餘權賺錢的，中國蒼松老年人服務公司，成為眾多官倒中的一個。

也就是這個由老幹部組成的公司，八七年被北京稅務局和工商局聯合查封，新聞界也呼籲制裁這個偷漏稅幾百萬、非法倒賣緊俏物資的官倒公司，不但大量倒賣彩電、冰箱等生活用品，還倒賣鋼材、水泥和地皮，利用手中的權力和關係，獲取高利利潤，在社會中引起極大反響。然而，就是這樣一宗轟動社會的大案

，像所有有背景的案件一樣，悄然消失了，但沒有得到制裁，北京工商、稅務兩個局長相繼換人，成為官場上的佚事，而該公司兩位董事中顧委常委王首道、陸定一每當遇人談起此事，則往往肅然道：我們一生流血犧牲，到老了還繼續革命，有人膽敢動我們，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官園第二件佚事，就是中紀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與中辦（中央辦公廳）爭地皮。

當初為安置陳雲，中紀委成立之初設在南海西院，老陳明知是個擺設，但整天在人家眼皮底下過日子，終歸難受，於是搬到了位於西直門的國務院招待所，時間一久，部下總有不安定感。陳老這才開始考慮地方問題，回中南海吧，面子上過不去，去府右街又爭不過國務院。想來想去，想到官園，心想只有這塊老毛曾住過的地方，名份上才能和中海平起平坐。於是中常會上提出搬進官園的要求，當時主管辦公廳的是剛從天津上來的胡啓立，明知那是中顧委的地盤，一邊老鄧，一邊老陳，心裡明知籌碼應該放在老鄧那邊，又不能明着，所以，一邊笑臉答應，一邊暗示榮高棠拖着，於是一場拉鋸戰開始了。官園老幹部活動中心，只讓出前面二幢樓給中紀委，陳雲聽後大怒，責令韓天石立即找胡啓立，胡、韓二人不是同代人（韓高胡一代），胡又是高官，為了平衡又讓出二幢，但安排警衛故意刁難。原來官園只有兩個門，前門屬於前院，是兒童樂園，後園只有一個東側門，對面是北京軍區司令×××住房，而中紀委既然進駐官園，只好用中辦的警衛，凡有找紀委上訴辦事的人，均被警衛厲聲喝住，站等良久。久而久之，辦事單位均知中紀委與中辦有矛盾，去那兒辦事，要受氣於警衛，所以凡與商討之事，均靠紀委人

員帶勞前來，萬不輕易到那塊寶地。紀委老人深知官園歷史，也知道中顧委的厲害，只好忍氣吞聲，相安無事，正好事少偷閑，落了舒服。那想韓天石八七年從北大把親信劉昆調到手下，任命辦公室主任，升官上任，第一天就被大兵擋架，非要出示證件，劉昆兜裡只有北大工作證，聲稱自己是中紀委辦公室主任，警衛任憑他說，就是不讓進，劉昆又只認識韓天石，偏巧韓天石又不在，結果第二天報到時，當着其他幾個副書記面大發牢騷，不知那位腳快，暗暗去陳雲處學說一番，陳雲氣得一口氣沒吸上來，差點過去，一陣忙亂搶救後，老陳大



罵道：給我另開一個門，而且給我在那裏蓋樓，我住定了。

於是，官園後園的神秘之處，又開了一個門，與第一個門相距不足五米，換上自己的門衛，周圍的居民百思不得其解，好好的院子為什麼開兩個門，當兵的是不是太多了。

這件事發生不到一年，二幢綠色辦公大樓赫然在原老毛的領地上豎起，於是割據時代開始了。

後來呢？筆者出國了，不知新上任的中紀委書記喬石該如何處理這一怪現象。

「中國之春現象」討論

本刊記者 錄音整理



八月下旬，本刊編輯部分別在紐約和華盛頓組織了「中國之春現象」討論會。參加討論會的共有四十餘人，發言者二十餘人。中國之春主編丁楚、中國民聯盟委員余叢代表中國之春和民聯參加了會議。本刊現將討論紀錄整理發表。由於紐約討論會部份參加者不願透露姓名，故本刊一律用字母代表發言者。紀錄未經發言者審閱，並有多處刪節，發言者次序也有所調整，若有出入概由本刊負責。

丁楚：

首先我解釋一下，「中國之春現象」並不是指中國之春這本雜誌，而是指民聯這個組織，所以準確地說，這個討論會的主題應該叫「中國民聯現象」。

我們在中國之春雜誌上也登了我們的組織計劃，其中有一條就是分析「中國之春恐懼症」。最近我們已收到很多稿子，都是批評那些害怕與中國之春接觸的心理的。但後來我們發現這樣討論問題比較片面，效果也不全面。害怕我們的人當然是有的，但還有些人不願和我們接觸並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另有其他原因，

其中也有我們中國之春本身的責任，「恐懼症」這個說法只分析了別人的原因，沒有分析自己的原因，就比較片面。

討論中國之春現象的意義並不全是要打破別人的恐懼和排斥心理，同時還可以總結一下這個組織發展的經驗教訓。最近民運高潮以來，冒出許多山頭，組織林立，中國民聯的經驗教訓對他們都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當然，我知道在座各位會有替我們講話鳴不平的，不過我還是希望多一些罵我們的人。我們希望對我們有意見的人當面罵，別背後嘀咕。另外有什麼誤會，我也可以解釋，我可以回答問題。討論會也可增進瞭解嘛。

A：

其實反對中國之春的人自己也未必說得出道理。我自己就是一例，過去我不看中國之春，但老是聽人說中國之春很激烈，要推翻共產黨，我也就有了這個概念，也在背後批評中國之春。最近一年多我常看中國之春，我很喜歡你和胡平的文章，最後發現中國之春根本就不激烈，也沒有說打倒共產黨。

我覺得很多批評中國之春的人實際上根本就沒有明白你們在說什麼，有的人甚至連雜誌也沒有看過，也不想搞懂你們的綱領，就是跟着別人瞎起哄。

B：

其實打倒共產黨又怎麼樣？這次「六四」之後，大部份留學生都參加過遊行，哪一個沒喊過打倒共產黨？至少也跟着領頭的喊過。你要說從前中國之春比一般群眾激烈還說得過去，可是「六四」之後，所有的人都變得比中國之春激烈了。再說害怕人家也說不過去。

不過一般人的印象是王炳章比胡平激烈。所以，過去王炳章執政，給人比較激烈的印象，而胡平給人的印象則過於溫和，「六四」之後，甚至有人都覺得你們中國之春過於溫和了。

丁楚：

其實人家王炳章也沒公開說要打倒共產黨，不信你翻一下從前的中國之春。說激烈還是溫和都是模糊印象，沒個衡量標準。中國民聯一千多號人，其實什麼人都有。有的人就很激烈，打倒共產黨整天掛在嘴上。例如我們洛杉磯支部一些人就很激烈，個個不是有殺父之仇，就是被共產黨關過十幾年牢，苦大仇深，能不恨嗎？再說洛杉磯地區僑團中右派勢力很強，開會、遊行氣氛就很激烈，在那裡你不激烈點也站不住腳。當然也有人很溫和，例如這次開「四大」就有一個代表上台講話說他的父母都是共產黨員，喊打倒共產黨他感情上轉不過來。還有的盟員寫信給總部，說爲什麼不能給中共提點建設性的意見？不要老批評人家。

所以一個組織是激烈還是溫和不能根據其個別成員而定，而要看它公佈的綱領。在這次民聯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有很多人提出把打倒共產黨口號寫進章程，尤其是洛杉磯支部，他們是東道主，在會場上很有勢力。但這個提案最後被否決了。道理很簡單，我們的綱領應當寫上我們「要什麼」，而沒有必要寫上「不要什麼」，把打倒別人寫進綱領，不是等於圍着別人轉嘛！況且，從民主理念出發，共產黨也有它存在的權利，幹嘛要消滅人家，我們不是強調權利重於是非嗎？因此，從通過的綱領來看，這個組織的大多數人還是十分理性的。

B：

綱領當然很重要，但主要領導人給人的印象也很重要。例如，胡平和王炳章就是兩種不同的風格，也給人不同印象。

丁楚：

其實說胡平溫和王炳章激烈毫無道理。剛才我說過我們洛杉磯的部分人比較激烈，中共領事館在洛杉磯建立時，他們跑去示威，扔墨水、西紅柿，和三民主義大同盟在一塊兒搞活動。有人向總部反映，王炳章大怒，說他們敗壞民聯形象，要開除他們，可是胡平不以爲然，輕鬆地說：人家被共產黨殺了父親，折磨得死去活來，扔兩個墨水瓶也不算過份。王炳章當主席時，老躲着「三民主義大同盟」，而胡平上台後就去人家那兒講演。王炳章一個勁表白他不會拿國民黨的錢，而胡平一上台就宣稱誰的錢都要。我在電視台上也說過：希特勒給錢我也要，他給錢說明他認同我們，不是我們認同他。

所以胡軟王硬的說法沒有任何根據，其實兩人的目標是一樣，只不過手段不同。根據我們宣傳的形式重於內容的觀點，不看你幹什麼，就看你怎麼幹。

C：

我覺得我們的討論圍繞着綱領問題實在是個錯誤。美國人可能會爲不同的綱領吵得不可開交，分成不同派別。可是中國人的分歧從來不是爲綱領。慈禧太后殺了戊戌變法的六君子，可是三年後，她全盤接受了后者的綱領：立憲、開放、辦學、辦實業，當時中國差點趕上日本；鄧小平抓了魏京生、徐文立，鎮壓了民主牆，但民主牆提出的主張他後來都實行了，

而且做得有過之而無不及；國民黨在台灣鎮壓了二·二八，但他們也不知怎麼治理台灣，結果也採納了很多二·二八黨人的綱領。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執政黨和反對黨並沒有什麼原則上的綱領分歧，雙方常常互偷綱領。反對派最慘莫過於被執政黨偷了綱領去，這等於被人挖了祖墳以後連立腳的地方都沒有了。我很贊成丁楚在「哭黨」一文中寫的：所謂路線鬭爭都是表面作戲，它的實際意義不在於「幹什麼」而在於「由誰來幹」。

這個道理在民主運動中同樣適用。一些人排斥中春，其分歧並不在於幹什麼，而在於由誰來幹。中國民聯是海外資格最老的反動組織，又最有實力，要是和你們聯合，那些「新反革」還怎麼冒頭？在你們面前他們暗淡無光了。「六四」之後，根本就不再有什麼綱領的區別了，這半年冒出這麼多組織，那一個綱領也少不了你們民聯的那八個字：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有的我看連章程、組織架構都照抄民聯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仍舊排斥民聯。

D：

這下子是民聯被挖了祖墳了。綱領被偷了，還不准進場！（哄笑）

B：

不能說完全沒有綱領分歧，有些人是既要當反對派，又不願和共產黨搞僵了；這樣可以留條後路回國。「六四」之前，這類人還挺吃香。搞「知識份子」的梁恆就是一個很成功的代表，他又是海外公認的反對派，美國人肯給錢，但又沒和中共搞僵，還可以回國辦刊。這種角色既能批評政府，又沒風險，大家都願意當。

不過這種角色也不好當，主要是沒有立足之地，要真幫共產黨改革，體改所一班人幹得比你好，不如投奔陳一咨、嚴家其；要死心塌地當反對派的，有中國之春，不如去找胡平、丁楚；站在中間不倫不類，非驢非馬，長不大。原來林希翎就想搞這麼一個組織，結果一事無成，其原因就在於綱領不徹底，沒立足的地方。

「六四」之後，情況大不一樣，體制內的改革派都垮掉了，陳一咨、嚴家其都逃亡海外，形勢對民聯更有利了。但仍有一些人要和中國之春劃清界線，其內心的潛在動機是留條退路回國，重溫體改所鼎盛時期的舊夢。這裡我並不是指陳、嚴等人，他們畢竟還當過「高參」，有過叱咤風雲的日子，有些事兒他們大概也看透了。這種心理最強的大多是那些想當高參選當不上的人，他們想「六四」血案平反後，還可以重續體制內改革的夢。

E:

我看「中國之春恐懼症」的根子還在中共的態度。其實共產黨才不去研究你的綱領不綱領呢？它也知道你們這幫小子肚子裡有什麼壞水。共產黨怕的是「組織」而不是「綱領」，就像丁楚說的，他們也重「形式」不重「內容」。共產黨不怕「獨立知識份子」。你不就是罵我兩句嗎？罵也罵不倒我，所以共產黨能容下梁恒但容不下民聯。因為後者有組織力量。

在國內，你在街上罵街，大罵共產黨，也未必有生命危險，可只要你搞組織，那怕你那個組織叫共產黨（馬列），照樣要殺了你。過去國內鎮壓了多少「反動組織」，個個都有一個很好聽的頭銜，什麼「青年馬克思主義學會」、「愛國同盟」，你說你是「馬克思主義」

的「愛國」的，沒用，照殺不誤，一律「反動」，原因不在你的組織幹什麼，而在你們組織起來了。哪怕你組織個養狗協會，也是反動組織。除共產黨之外的一切組織，除了它欽定養的，都是反動組織。道理就是這麼簡單，你不服不行。

咱們海外有些知識份子和共產黨要小聰明，成立個組織，在綱領上玩點小花招，以為能騙得過老鄧，說什麼「本組織只管人權，不問政治」、「本組織不以推翻共產黨為目的」，沒用，照樣反動組織，格殺勿論。糊弄老鄧沒那麼容易，他吃的鹽比你吃的飯多。哪怕你拍馬屁，說「本組織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老鄧照樣要取締你，然後告訴你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別搞組織。

民陣、學聯成立，都自認為和民聯不同，可共產黨不這麼看，它在人民日報上不照樣把它們統統劃視「民聯之流的反動組織」。所以我說民聯在海外民主運動中的主導地位不是民陣或其他什麼組織能夠替代的，這位置不是群眾捧的，而是共產黨欽定的，你說你有更多的群眾，可共產黨不認你，那還是不行，只能劃歸「民聯之流」。（哄笑）

丁楚：

（笑）你別光替我們說話，我還是希望這個討論會能多一些批評我們的意見……

E:

你別打斷我，我還沒講完。

共產黨很刁，它在你想劃清界線時，偏不給你劃清，一律歸入「民聯之流」；可是在你還沒想劃清界線時，它就給你把界線劃得清清楚楚。不知大家注意沒有，現在共產黨給你定

罪，並不注重你幹什麼、說什麼，而是看你有什麼「背景」。你要是沒有民聯、國民黨的「背景」，你喊了「打倒共產黨」，也可以原諒你。可如果你有這類背景，哪怕你喊「鄧小平萬歲」也饒不了你。

八七年我曾在中國之春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被領袖的人看見了。他對我說：你寫的東西我很贊賞，可是在中國之春反動刊物上刊登就不好了。可以在「華僑日報」、「中報」上登嘛！我問他：你說我寫的對不對，有沒有道理？他說：對，有道理！我說：我寫的文章本身對不就行了嗎？在哪發表有什麼關係。

同一篇文章，在這發表就是好文章，在那發表就變成壞文章了。這是什麼混帳邏輯？可是共產黨就這麼打橫來。從此我就有了中國之春的「背景」，跳進黃河洗不清。以後我再寫什麼文章都是壞文章了。

F:

老E說得對，其實很多人排斥中國之春，正是不自覺的按照中共的這個邏輯思維的結果。陳軍說他在國內搞三十三人簽名信時，冰心、北島等一些老前輩，名人都簽了名。可是後來一聽說他有中國民聯的背景，又紛紛要求退出。冰心也大叫上當，說不知道這個活動背景這麼複雜。

我聽了這個論調就奇怪，你簽名是為了幹什麼？為了保障人權，釋放魏京生，這個要求本身對不對？對就簽，不對就不簽，跟陳軍的背景有什麼關係？我的美國教授就無法理解這件事，他說你們中國人的想法真奇怪。

八七年第一次留學生千人簽名信，最後定稿時又出來個「六點聲明」，強調沒有任何政

治背景，與中國之春沒有關係，這真是有點滑稽，畫蛇添足。結果此例一開，留學生搞任何活動都要先聲明：沒有任何政治背景，與中國之春無關。中國人都被共產黨整成孫子了。

D：

你們中國之春上面有一篇文章，好像是「路邊」寫的，叫「與劃清界線」劃清界線，寫得真好。共產黨獨裁專制的訣竅就是把人民分而治之。所以叫人們互相劃清界線是很重要的。過去當右派的選分「極右」、「中右」、「右傾」等幾個不同級別，「右傾」的人覺得自己比「中右」的人高一等，所以老揭發人家，「中右」的人又覺得自己比「極右」乾淨一點，所以總躲着人家，劃清界線。中國人到了最底層，當了奴才也不忘相互歧視。難怪他們老被專制政權統治。

劃清界線的做法實際上體現了一種政治歧視，而所有的專制都是建立在對反對派的政治歧視的基礎之上的。共產黨的專制實際上是建立在對國民黨的政治歧視上的。只要反對它的，一律都劃為「國民黨反動派」。專制者只有樹立一個假敵，才有維持這個龐大專政機器的藉口。所以離了政治歧視，專制就沒有基礎存在了。過去假敵是國民黨，現在又多了個中國民聯，可悲的是群眾中也潛移默化地接受了這種歧視，好像與國民黨、民聯劃清界線就能保護自己，其實這是飲鴆止渴。即使你沒有任何關係，共產黨想整人時就生拉硬扯給你套上。劉少奇和國民黨有什麼關係？可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就宣佈這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長期鬭爭的繼續」。簡直是胡咒八扯，指鹿為馬。其實保護自己安全的辦法恰恰相反，不是劃清界線，而是模糊界線。一個團體很可怕，

可是只要大多數人都和它接觸就不可怕了，你共產黨也奈何，你能抓一百一千人，但不能抓一百萬，一千萬人，法不責衆，最後當局反而沒有迫害人的理由了。

B：

(接D)按你的邏輯，專制的基礎是政治歧視，那麼也可以推論，民主的標誌之一也是最後消滅一切政治歧視。權利平等是民主制度的一個重要原則。如果那一天共產黨開恩了，允許「民陣」回去，「高自聯」、「工自聯」都可以成立，但就不讓「中國民聯」回去，那這也不是真民主，就算開恩讓民聯合法回去，但不讓國民黨回去，也不是真民主。所以在大陸實現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看我們能不能打破對民聯，甚至對國民黨的歧視。

有的留學生一提國民黨就搖頭，說人家形象不好，回大陸也沒前途。怎麼形象不好？不就四十年前的爛帳嗎？人家已經改很多了，形象再不好也沒共產黨壞。其實所謂「形象不好」就是千百個人這麼毫無道理地搖頭搖出來的，大陸留學生開會，都知道找台灣要錢，拿了錢又怕腥，要保持自己「好形象」，讓人家台灣別出面別聲張。人家國民黨又沒欠你們什麼，憑什麼要這麼委委屈屈地供着你們？花錢還要買個名聲呢！民聯也是，民運中事沒少幹，但又不許聲張，以便純潔「形象」，憑什麼？我在紐約參加遊行就知道，標語是你們民聯寫的，一舉牌子，全是丁楚的書法展覽。(哄笑)人都是你們通知召來的，又不讓民聯牽頭，這事我見了好幾次了。以後你們民聯別那麼窩囊，憑什麼受這份氣。這是政治歧視。

丁楚你寫的「哭黨」給我印象很深：中國人確實無法跳出那個黨好，哪個黨壞的無謂爭

執，似乎非要非此即彼。他們就從沒想到，管它是好黨壞黨，只要大家共存，相互制衡就可以都變成好黨。就像你說的，重要的不是哪個黨好，哪個黨壞，而是各個黨派勢力的均衡。什麼時候中國人能跳出這個圈子，不是去支持一個好黨代替壞黨，而是自覺地支持一個弱黨去抗衡強黨，中國民主就有望了。

丁楚：

我也反復強調中國民聯希望廣大群眾支持我們不是因為我們好，而是因為我們弱，我希望群眾能把我們扶持大了去制衡共產黨。要是哪一天我們比共產黨強大了，他們就應該支持共產黨來抗衡我們民聯。道理是一樣的，放之四海而皆準。(一笑)

H：

我不贊成老E的看法，其實很多人排斥民聯並不全是怕共產黨，更主要的是怕在群眾中孤立。這種情況可能東西岸好一點，我在中部呆過，中部偏僻學校很保守，一聽你是民聯的就沒人敢理你了。群眾的冷漠比共產黨的迫害更可怕。

E：

爲什麼群眾會有這種不正常的心理呢？歸根到底還是共產黨的影響。我們每個人都是群眾的一份子，不能把責任都推給群眾，說我一沾上中春的邊別人就不理我了，可是作爲群眾一份子，別人沾了中春的邊，你仍舊理他，每個人都這樣想，局面就不一樣了。

當然，大多數人也未必天生對民聯有何成見，而是討厭政治，不願和政治沾邊，誰沾邊誰就不免孤立，這種政治冷感症歸根結底也是

共產黨造成的，中國運動太多，搞得人人自危，所以見了政治就躲，這種環境給反對黨造成很大困難。

H：形象問題也不能全怪群眾，當然共產黨的壓力是重要原因，民聯本身有一定責任。例如不久前民聯內鬪，大大影響了它的形象。另外，你們在中國之春上把內鬪的過程寫出來了，讓人看到了中國人的醜惡。就像一個人本來好好的，一旦你把他開了膛，腸子內臟流出來，看了就噁心，看了這些怎麼能讓人產生好感。如果一個組織裡的人欺騙、訛詐、貪污、搶錢、造謠，什麼手段都用，怎麼還讓人敢於接近他們。

I：我的意見剛好相反。一個組織也好，國家也好，要是沒有醜聞，一片鶯歌燕舞，那才說明裡面黑暗，如果它們敢於暴露醜聞，只能說明它們的進步。美國報紙整天報導官場醜聞，而中國的報紙很少見，你能說中國比美國好嗎？

丁楚寫的文章（註：「民聯罷王風波始末」）我覺得很好，不僅僅讓別人了解了事實，而且也闡述了很深刻的道理。我記得那上面向那些討厭內鬪爭的「好心人」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如何消除內鬪？其實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分歧，有分歧就會有內鬪。內鬪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只不過大家按規則鬪就是了，輸了的就認。民聯搞得那麼慘就是王炳章輸了不認，又搶錢又斷電（註：斷電話），不擇手段就不妙了。其他組織也別罵民聯，他們就沒有內鬪？我就不信；但願他們別碰上個王

炳章那樣的，沒完沒了，死纏硬打。

J：不管怎麼樣，這次內鬪使民聯的戰鬥力受到重創，原來力量就不大，現在又分裂，力量更分散。這次民運高潮，本來大家期望民聯能發揮更大作用，可是大家一看民聯的人打內戰去了，沒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所以人們都很失望。這個教訓已經成了每個組織成立時必引以為鑒的話題。例如，這次芝加哥會議就有人發言說：我們要如何團結，不要墮落到民聯那樣的地步。（哄笑）丁楚你別樂，你們民聯已成為別人眼裡墮落的典型，你也參加了會議，你有什麼感想。

丁楚：我的感想是他們恭維我們。一個東西要墮落，它本身要有一定高度，才能往下掉。那些新成立的組織想墮落還落不了呢！他們才起步，還在水平線上；要墮落還不夠高度。他們要想墮落到民聯這個水平怕還要幾年才行。（哄笑）

其實搞組織並不像有些人想得那麼容易。站在岸上看別人游泳總是覺得別人游得笨，你真跳下去游游看就知道了。叫那些指責民聯的「聰明人」來幹未必幹得比現在這幫人強。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才成立幾天，就鬪得一塌糊塗，一會綁架，一會罷免，這麼多人，誰當頭也不容易。內鬪免不了。

以前有人說王炳章水平低，王炳章反唇相譏說：你們那些水平高的不來幹，可不就剩我們這些水平低的嘛！誰覺得自己能幹，就下水幹吧！

就算民聯犯了錯誤，也為民運立了功。就

像一個探路的，掉到坑裡去了，他的經歷就會成為後人的教訓，別人就會繞着那坑走。吸取民聯教訓的人，別淨想着「避免」內鬪的好事，要是真看懂了民聯的教訓，就會明白內鬪是不可避免的。最好事先準備好一套內鬪的規則，把人最壞的一面都想到；最殘酷的後果都想好，用制度防範。只要按規則鬪，內鬪並不可怕。我在罷王風波一文中寫道：不同的派別，不同的觀點，路線完全可以在一個組織內共存，但是共存的唯一基礎是大家都要遵守同一規則，不能不擇手段。這也是我再強調的觀點，形式重於內容。不看你幹什麼，就看你怎麼幹。這就是我從民聯內鬪中總結的教訓。

K：都說內鬪毀了民聯，我的看法相反，這次內鬪救了民聯。試想一下，即使沒有內鬪，就算王炳章也在，你們民聯在這次民運高潮中又能起多大作用？有能力牽頭搞幾千人的遊行嗎？有能力挽救天安門廣場的敗局嗎？照樣不能！現在內鬪反而給了你們一個藉口，反而讓你們原諒了你們表現不佳，其實你們本來就不能表現得很佳。有了這個藉口，群眾選對你們的潛力抱有希望，把你們的無能為力歸結為內鬪的損耗。如果沒有內鬪，人們反而會對你們徹底失望，你們連現在復興的機會都沒有了。所以我現在要恭喜民聯，我現在對其他組織都不看好，就對民聯看好。

L：每一個組織走向成熟都需要一定的時間。成熟的標誌是形成自己獨特的綱領或理論體系，形成一套相對穩定的領導核心。這需要反復地篩選，「內鬪」實際上就是這個篩選的必要

形式。有一套內閣程序的組織，這種篩選就會平穩一些，如一些民主國家的政黨，沒有這一套程序的，就殘酷一些，說不定人頭落地，像中共，動蕩十幾年才確立了毛澤東的核心，這一步不可避免。

我看民聯已經過了這個階段，現在它已形成比較穩定的領導核心，也有了一套理論體系，像丁楚前面提到的「形式重於內容」，「權利重於是非」等，很精闢，但又通俗。而其他組織剛剛建立，還必須經過這一階段。所以若它們也發生內鬪，我們別奇怪，也別失望。

民聯有了自己穩定的領導核心這固然是好事，但同時也有副作用，核心一旦穩定，就不易發展壯大了，因為領導位置佔滿了，其他精英份子就不會再進來。所以，一個組織能否在草創階段吸收到第一流的人才進入核心是很重要的。最初階段吸收的高水平的精英越多，篩選的過程和時間就越短。換句話說，起點高，成熟就快。民聯的草創階段我認為起點不很高，而最近成立的「民陣」起點就相對高一些，但無論怎樣它也要走一遍民聯走過的路，問題只是時間長短問題。

丁楚：

中國民聯不是封閉的組織，我們主席一職規定了不能超過兩屆任期，這樣實際就對其他精英開放了門戶，只要有能耐，還可以進來競選主席。

N：

所謂形象問題實際上是個「鬼打牆」的問題，道理是講不清的。要說民聯形象壞，再壞也壞不過共產黨，可為什麼很多不願和民聯打交道的留學生不在乎共產黨打交道呢？因為共

產黨有辦法給他們，民聯沒有，這是明擺着欺軟怕硬。

還有一點令人却步的原因是中春拿國民黨錢的傳聞，我不知這個傳聞是真是假，但共產黨肯定會很高興製造和傳播這類消息。人民日報就罵中國民聯是國民黨養的組織。於是最近很多新成立的組織吸取了這一教訓，爲了保持貞潔的好形象，成立之初就宣佈：不拿任何政治組織的錢。我看共產黨最高興看着他們作繭自縛了。

M：

這些純潔的處女，最好的辦法就是餓他們兩天，那他們就不會再計較錢姓什麼了。陳獨秀是個很清高的知識份子，在共產黨建黨之初也不願拿俄國人的錢，生怕被別人罵爲「盧布黨」。可是後來陳獨秀被法國巡捕抓起來了，在牢裡呆了幾天，後來組織上派人把他保出來了。他一出獄就問保金哪來的，答曰，俄國人給的。陳獨秀沉思良久，憤憤地說：「他媽的誰的錢我都要」。從此中共成爲「盧布黨」。

(哄笑)

O：

人們對民聯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民聯是海外第一個反對派組織，任何一個組織成立都要看天時、地利、人和，民聯成立之初期可以說佔地利，因爲美國這塊地方是民主制度，可是不佔天時，當時大多數人對中共的改革還抱很大希望，所以都覺得民聯的綱領過於激烈。後來隨着人們對於改革的失望，理解民聯的人就越來越少，現在對民聯的排斥心理已經比幾年前好多了。至少今天這個討論會這麼多人敢來，就說明這一點，要是以前，我們很多人就不會來。

「人和」問題關係到民聯的形象，形象是由具體的人體現的。這樣一來，民聯基層組織成員的素質就很重要了。我也認識一些民聯的基層的成員，我就覺得這些成員的素質就不怎麼樣，他們的言行就影響了民聯組織的形象。民聯的內鬪對它的形象也有很大影響。別人會覺得你們搞民主的人選用非民主的手段，人們感情上受不了。要扭轉人們的感情不是很容易，要花很大力氣。

P：

我不知道這個素質問題有沒有一個衡量標準，怎樣算好，怎樣算差？有的人把功課好、談吐水平高等作爲素質好的標準。我不否認以上條件好的人容易在群眾中樹立威望，但民聯是個群眾組織，你不能只讓素質好的人參加，不讓差的人參加。可是讓後者參加豈不是又影響了組織形象？所以我認爲這裡說的素質的標準要有不同的含意：這就是看你願不願意爲民主事業奮鬥。當然我承認很多進中春的人是爲了政治避難，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敗壞了中春的形象。但我相信大多數人主要動機還是爲了推動大陸的民主。

Q：

民聯有一千多人，這些人都是頂着中共的壓力在低潮時加入的，所以我相信他們的效忠程度會比民陣的人高，後者都是在高潮中一激動捲進來的。這一千多人的骨幹應是很大的財富，可以搞很大聲勢。但民聯似乎對宣傳媒體利用不夠，光靠中國之春不行，民陣和學聯在這方面就比民聯做得好，組織雖沒有民聯嚴密，但聲勢很大。

R：中國之春過去贈送一大批，那時的影響面就很大，現在好像停止贈送了，這就縮小了其影響面。

O：中國之春光靠送也不行，主要還是要把質量搞好。質量高了，讀的人就多。前幾期中國之春我就覺得很差，老抄報紙，可是最近兩期明顯好轉，趨勢看來是越來越好的。

S：「六四」之後，海外又湧現很多民主組織，我不知民聯和這些組織的關係怎樣。我想大家都搞民主的，不知是否可以跨團體參加？

丁楚：民聯的政策是願意和任何團體聯合，也允許我們的成員加入別的團體。問題在於其他團體願不願加入我們。民聯是個滲透性比較強的團體，盡管常常受排斥，可是哪一個團體，哪一次活動也沒有把我們排掉，海外的大陸人團體個個都有我們的人，哪一次活動也少不了我們參和。別人看着一會兒冒出一個秘密盟員，一會兒又冒出一個，老是嚇一大跳。所以我們不怕聯合，都是別人怕。

T：既然你們可以和所有的黨派聯合，歡迎別人參加，爲什麼容不下王炳章？爲什麼單單不允許民主黨的人跨團體參加你們，這不是也是一種政治歧視嗎？

丁楚：

聯合的目的是爲什麼？是爲了增強民主的力量。民主黨和民聯之間的關係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兩者合在一起不僅不能增強我們的力量，反而會因爲內耗和磨擦互相削弱了力量，這一點已經被前幾個月的事實證明了，內耗把雙方都累得夠嗆，誰也不願再忍受這種折磨，所以六月份民聯「四大」上，代表們以絕對多數通過盟黨分家的決議。

大家都在喊聯合、團結，現在變成一種時髦，其實聯合本身並沒有價值，它的價值只不過是爲了壯大力量，如果這個目的達不到而甚至相反，爲什麼一定要把兩個不願結婚的人拉到一起受罪嘛！

當然民聯和民主黨最終未必不能聯合，但現在顯然不是時候。我們開了很多次會討論，但一開會就吵，開會不但事情不會好轉反而惡化，開一次會感情傷一次。所以這個問題需要冷凍，放一下，時間會解決雙方的情緒對立，到時機再談聯合。在此之前可以先搞一些聯合行動，不一定要溶在一起，這樣反而會壯大民主力量。

余叢：

我們並沒有容不下王炳章，開始只不過是處分他，在一個組織內處分人是很正常的。可是王炳章不服，以提走全部經費、卡斷電話的手段來要脅總部，最後只好開除他，但仍舊聲明只要他還錢就恢復盟籍。可是他還不還，成立民主黨分裂民聯，後來是法院把錢判回來了，可「四大」之後他還要告總部，死纏着沒完沒了。在中國之春歷史上，有十五個人被王炳章趕出民聯，但他們所有的人都沒有像王炳章這樣大鬧，他們都爲了維護民聯的形象，不願破

壞團結，最後忍氣吞聲一走了之。只有王炳章例外，爲了維護他一個常委的職位，不惜把整個組織搞得天翻地覆。

所以現在很多人總結出一個教訓，就是搞組織不要「職業革命家」。因爲一旦這個組織成爲一個人的飯碗，成爲他的身家性命，成爲他的一切，很容易把民主事業納入個人野心的軌道，培養出另一個獨裁……。

U：

目前民聯有沒在改變形象方面採取什麼措施？財務制度上有沒有改進？

余叢：

由於過去民聯領導人的個人作風，民聯過去給人的印象總是很神秘，像個黑社會組織，這是影響民聯形象的重要原因。過去你要想入盟，問王炳章民聯有多少人，他就信口開河，一會兒六千，一會兒五千，你要問錢的事，他就抓你的特務。所以在過去，什麼都不問的盟員就是好同志，素質高，你要一打聽點什麼事，就會被懷疑成特務。

胡平上來以後情況大有好轉，我想扭轉民聯形象的最好措施就是增加透明度，搞公開化，讓所有的人瞭解民聯。一個大陸人加入民聯是要冒很大風險的，等於斷了後路，父母見不着，家也回不去了。人買股票還要瞭解一下該公司的經營狀況呢？何況你要把身家性命都要交付給它的這個組織。不摸清底，怎麼能夠上船？現在你要是入盟，除了十分必要保秘的，其他都可以向你交底，有多少人、錢怎麼花。這次民聯「四大」，我們搞了個三權分立的架構，互相監督制衡。

丁楚：
過去民聯的大批捐款是通過個人轉手的。這樣就會出現問題，如有人用錢來控制組織。現在我們公開了帳戶帳號，大部份捐款是直接

匯入銀行，不經任何人的手。我管錢我也不知是誰捐的錢，誰也控制不了錢。用錢開支票，帳目清清楚楚。我們有專業會計師做帳、報稅，人家是 PROFESSIONAL 和民聯沒關係

。誰也搞不了鬼。「六四」之後，很多組織都在捐款。但沒有幾個組織有像民聯這樣完整的財務制度。大多數組織裁都栽在錢上，沒有制度無法取信於民。

談「不願被人利用」的心理

徐大忠

據說，許多不願投入民主運動，特別是「中春」民主運動的人，一個重要的理由是民主運動中的某些人有個人動機和個人政治野心。爲了不使自己被政治投機者利用，他們就遠避民主運動。

在任何政治活動中，如同經濟活動一樣，有一些所謂政治投機者是不可避免的。想等到民主運動絕對純潔了才投入，那你就可能永遠沒有投入的一天。我們可以自問一下，自己做事是否永遠沒一點個人動機呢？自己做不到聖人，爲什麼對別人要求這麼高呢？我們對如此專制無理的中國共產黨都能容忍和厭惡這麼多年，爲什麼對新興的民主運動就如此挑剔，忌惡如仇呢？其實，個人動機也不是絕對壞事。吾人皆知經濟投機者、工業冒險家可以給經濟帶來生氣和推動經濟發展，爲什麼獨獨不能寬容政治上的個人動機？當然，社會必須有健全的經濟立法以制約經濟投機者的過份膨脹的個

人利欲。政治上，我們一方面應爭取建立健全合理的競爭制度。另一方面要靠更多確實不以政治爲終生事業的、完全出於正義而投入的普通群眾的廣泛參與去制約少數職業政治家過份膨脹的個人野心。

此外，如果一方面有嚮往自由、民主的政治訴求，另一方面却因怕自己個人被別人利用而完全不投入民主運動，事實上還是希望讓別人去爭取民主、自由而自己坐享其成，這不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利用別人」的心理嗎？必須指出，中國的專制主義者之所以能長期維持其統治，主要原因就是他們充份利用了，人人不想做出頭鳥，「不願自己被別人利用」只希望利用「別人」的消極心態。人人都不想自己被別人利用，結果大家都被專制者徹底地利用了。換一句話說，不投入民主運動；就自然被專制統治所利用，兩者必居其一，何去何從呢？
要避免在民主運動中被人利用，就應該在

民主運作中學會合作和制約。一般群眾應善於利用和支持民主運動政治家去實現自己的民主願望，而民主運動政治家則也可利用群眾的支持以實現其政治目標。當然，民主鬥士如一旦向專制轉化，群眾就應及時制止他們。不過欲有效地制止，顯然你必須先積極地參與，只能在參與民主運動中實踐民主。

最後，盡量不被人利用，而又可有所投入的辦法也是有的，例如，對民主運動和民主組織的方向公開表示支持，聲明上簽個名等等，如此這般，別人無所利用，自己也無所犧牲（當然需要一點勇氣）。而它所造成的「敢於說真話」的氣氛對民主運動有所促進。如果連這樣的行動也不敢採取，就不能不令人想到所謂「不願被人利用」的背後是否還有什麼更可悲的心理。希望凡是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人拋棄雜念，勇敢地投入自由、民主的運動。

廣泛而有限的參予

陸丙甫

關於「中國民聯」在中國留學生中的形象及其在整個民主運動中的作用、地位問題，真是一個值得專門研究和撰寫博士論文的，有而且重要的大課題。

無可違言，「中國民聯」在留學生中的形象，特別是在此次北京大屠殺之前，是很理想的，獲得的支持和響應很有限。有些人甚至對它惟恐避之而不及，這就是所謂「中國之春」恐懼症。這固然同共產黨的高壓專政有關，也同「民聯」自身的一些缺點錯誤有關，但最主要的恐怕是由于人們對民運團體的認識誤差有關。本文就最後這層原因談點看法。

一、不應期望過高、求全責備

魯迅說過，他獨不理解中國人為何對已成之勢那麼委屈求全而對未成之事又那麼求全責備。同人們對共產黨專制的一再委屈求全的認同來比較，不能不說對弱小「民聯」的指責是偏于求全責備的。對已成之勢的遷就，確有合理的現實主義的一面。但與此同時對未成之新生力量的過于苛刻的指責，却不免有失公允和忠厚。中國人傳統的這種「權力拜物教」政治心理，即使在觀念最現代化的留學生中，仍不免有所下意識的反映和流露。

其實，不論「民聯」幹得多差，多麼沒有水平，僅它作為一個完全獨立于共產黨控制的獨立政治組織這一點，就足以值得我們加以支持了。僅它有勇氣來公開地並且有組織地反

對共產黨的專制這一點來說，已足以值得我們深表贊賞和同情了。

丁楚先生在「中春」六十七期「哭黨」一文中有很好的這方面的見解：對於一個政治之成熟的民族來說，善與惡，好與壞只有倫理上的意義而不具有政治上的意義。具有政治意義的不是各種力量的性質而是各種力量的均衡。一個事物即使是壞的人們也會自覺維護它存在的權利，而一個勢力無論它多好，只要它強大到足以形成壟斷，人們也會支持另一個弱小力量去制衡它。

支持有兩種：原則上的支持和對具體措施、觀點的支持。盡管我不贊同「民聯」中某些人、事，但我可以支持它存在的權利、價值和意義。

許多人往往把兩種支持混起來，似乎一支持就意味着全面支持。這種觀念不但阻礙了他們旗幟鮮明地去支持「民聯」的存在權利，而且也使其他人在欲表示有所支持時顧慮重重，生怕被誤解成對這個「反動組織」的全面支持和認同。

當然，「民聯」如能少犯些錯誤，從而使人們支持它時更少顧慮，豈不更好。這當然是「民聯」所努力追求的，但恐怕一時上再努力也改善不到那裡去。這裡面有許多文化背景，現實基礎以及人類自身局限的原因。要求一個新生的組織一下子完善，正像要求一個獨裁者

永遠廉潔、謙虛一樣地不現實。俗語說，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BETTER（至善是較好之敵）。人民對制衡專制之力量的期望過高和求全責備，正是妨礙他們遲不能擺脫專制的原因之一。中國人有時似乎過于倫理化和理想化，不善制衡和妥協，但對強權的屈從却又顯得太現實主義。不過，中國的統治者却是很善于對其人民和下屬搞「分而治之」的制衡的。什麼時候人民善于對領導者和政治勢力搞制衡，而領導者更多一點倫理化和理想化，事情也許會好得多。

關於對「民聯」不應期望過高，齊光先生在「中春」三十四期上「我們認識的民運價值」從信心和展望的區別談起——文中說得很好：「我不希望我們的民運組織把自己看成是應運而生，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牌子換成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國，而我們只能說我們願意在中國實行民主制度，我們只代表我們這個組織自己的意願。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宣傳我們的願望和主張，讓更多抱有相同願望和主張的人同我們一起工作。」

是的，請不要把「民聯」看成一個民主「先鋒隊」和發誓為民主獻身的民主志士的組織。不是「信仰者」的組織，而只是一個「希望者」的組織。「民聯」盟友都不過是普通人，不過他們比其他人更認真看待自己的願望而已。這就好比對自己的 HOBBY（業餘愛好），有

些人看得很淡，有些人則看得較認真，更進而組織和參加愛好者俱樂部一樣。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就不必對「民聯」要求過高和指責過嚴。這樣，在看到「民聯」的一些缺點，甚至是嚴重缺點時，就不會大失所望了。許多人對共產黨四十年的如此專制獨裁都能容忍，為什麼偏偏就容忍不下「民聯」的缺點呢？中國共產黨即使在早期，也歷經了殘酷的權力之爭和分裂。「民聯」前一階段的內爭，固然令人深為遺憾和不满，但還不至于此判定它已無存在的價值及無壯大的可能。

記得我從前在大陸農村插隊時，常聽到老鄉們背地裡嘀咕「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就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飽」，或者青年農民埋怨道「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不過（窮得）老婆討不到」。這是很發發的：一種生產體制，只要它的後果是連人們最基本的物質需求都滿足不了，就足以基本上加以否定了，那怕它有千條萬條其他的好處。同樣，現在我們不妨說，「中國民聯糟，中國民聯糟，不過就是敢于對着專制搞」。

二、為參加而參加

「中春」七十期上錢述先生「聽聽洋先生的話」一文中的「洋先生」說道，「最重要的是他（指「中春」）是一個獨立的言論陣地，因為在面對一個絕對沒有言論自由的巨大專制體系時，獨立的言論陣地是絕對必要，且應該給予支持的，或者像我在座談會中所說的，即使你們真的很不贊成中春的言論，那你們該出來創辦其他的雜誌。否則像你們這樣私下批評中春，不也一樣起不了任何作用嗎？」

洋先生的話是很有見地的。但要讓很多人出來辦雜誌，似乎也是要求過高。重要的是，每個希望獲得自由、民主的人應該對於民主

運動有所支持的表示。不過，支持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

對已有的民主運動組織不滿而自己另外搞一套，當然是精神可嘉。如果你確實是能比別人搞得更好，當然更是民主事業的大幸。不過，真有能力、時間來另起爐灶的人畢竟只是極少數，對絕大多數人而言，無法全身投入民運，他們所能作的是表行認同和支持。這可稱之為「表態性支持」。



但是顯然，僅僅是口頭上和私下裡表示支持是不夠的，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像公開信上簽名，則是一種較為具體的，更為認真負責的表態。捐款也是一種表態方式。此外，參加某個民運團體、組織，更是一種有意義的支持。許多人對於其他形式的支持都願意幹，但對於加入團體則深感警誠和顧慮。而我却認為參加團體實在是一種人人可去做的最簡單而有效的支持民運的行動。

即使你其他什麼也不做，只是報名、填表在形式上正式參加某個民運團體，這已經具有很大的價值和意義。這可以說「為參加而參加」吧。胡平先生等很強調的一個民運策略是「形式重于內容」，這一條對參加團體也是適用的。我觀看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的電視新聞和錄相時熱淚滾滾，或者在私下裡抨擊專制，鼓吹民主，不論感情如何激烈，言辭如何尖銳有力，次數如何頻繁，其效應都是相當有限的。而你一旦參加某個民運團體，其意義就是另一個層次的了，因為這是個自己必須負責的認真的選擇。從某種角度說，形式和場合比內容和次數更重要。

從共產黨的反應也可以看出這種區別。共產黨可以在某些時期容忍各種各樣自發的、激烈的批評，但是它決不能容忍一個有組織的批評團體。它可以容忍官辦報刊上刊登激烈的批評意見，但是無法容忍獨立民刊上較溫和的批評。它可以一時抽象承認天安門學生運動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它始終決不敢承認作為天安門學生運動主要發起者和具體成果的「高校自治聯合會」的合法性。它可以容忍億萬人民長期的消極怠工，但是他決不寬大少數人短期的有組織的明確罷工。因為組織上的獨立性正是對共產黨一元化絕對權力的最大挑戰和打擊。共產黨對待海外留學生的民主活動也是如此。它可以對一切眼開眼閉，可以對以種種理由辦身份留在海外表示「理解」，但就是不能「理解」明確以政治理由表示唾棄專制體制的人，更不能諒解像「民聯」「中春」那樣有組織的民主活動。這難道僅僅是因為共產黨要面子講虛榮的特性使然嗎？

因此我認為，組織上參加民運團體，這種形式本身就是對一元化極權專制的明確唾棄和

強烈抗議。這也正像台灣的民進黨，雖然遭人非議之處頗多，其某些「爲反對而反對」的舉止似也欠穩妥，但它作爲一個真正獨立的反對黨的存在形式，對於台灣政治民主化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

從這個角度講，「爲參加而參加」實在是再簡單不過的爲民主作貢獻的方式。我自己當初也是把參加當作一種最簡單最起碼的對民主的義務而參加民聯的。來到美國之後，收到了一些「中春」，也聽到一些對民聯的非議。在讀些「中春」上的文章之後，覺得其大方向總是正确的，對出自一些強烈嚮往民主和反對專制的朋友之口的對它的過多指責甚感不解和平。至少，他們有勇氣幹，並且已經幹了那麼多事情。而且，共產黨已把它打成了「反動組織」，這還不夠嗎？我們應該連同情都來不及，爲什麼還要投井下石跟着去批評呢？由于這種不平情緒，也由于覺得自己其他什麼都幹不了，捐款嘛，一個自費公派生，盡靠一點助教金、獎學金過活，又是初來美國，手頭拮据得很。寫文章嘛，在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度，自己原來想講的話早被人家講得差不多了，而且比我想講的深刻得多。搞組織活動嘛，自己實在沒那個能力和精力。因此我只能選擇自己認爲最簡單最省力的安撫自己良心的作法——表態、參加。我想，有金錢出金錢，有能力出能力，自己無錢無力，好在良心和勇氣還是有一點點的，那就「有膽出膽」吧。而且我認爲要參加就公開，因爲我不會也不想去幹秘密工作，並且我認爲公開性是民主性的最主要一部分，公開有利子形成和推動民主氣氛。在一次同領館人員的對話中，我就說自己是爲參加而參加：因爲中共把這麼一個以和平方式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團體打成反動組織太無理，爲對這種無理霸

道表示不滿，我就參加了。

三、廣泛而有限的參與

當然，話說回來，「爲參加而參加」固然簡單，但因爲此舉最爲中共當局感冒，所以比起其他方式的參與，也許是需要更多一點的勇氣。不過留學生之不願參加民主團體，多數情況下顯然不是缺乏勇氣，而是另有其他種種原因。像前面談過的對民主團體的訴求過高是其中之一。此外，歷史上長期政治動亂而造成的對政治的不信任和厭惡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參加團體就被捲入政治，而在一般中國知識看來，政治是權力之爭，是骯髒的，政治家大都是野心家。也許這種看法接近真理。但正如幾十年前吳稚暉先生曾說過的，政治雖髒、臭如茅坑，但人不能因爲它髒、臭而不進茅房，而是應該改造它。

有人會說，改造政治，談何容易，咱們沒這個能力。不過我却認爲，不是政治角色的普通大眾對政治的參與，正是改造政治，使政治不再成爲少數政治家的專利和工具的唯一根本途徑。

從政的人難免有擴張權力的本能或職業病，或者說難免有野心或雄心。這是不能苛求于從政者的。但政治總得有人來搞，搞得好的人又常常是野心或雄心大的人。民主問題本身也主要是一個政治問題，我們不可能既希望有人來幫助我們實現我們的政治訴求，又希望此人純潔如天使（吾人捫心自問，何人可稱自己是天使）。這種希冀救世主的消極心態，恐怕正是中國真龍天子、大救星和「總設計師」不能斷絕的原因。

現實的方法就是通過廣大人民的積極參與與來制衡少數政治家過分擴張的個人私慾和野心。

我常常覺得很有趣：有些事情大家迫切希望有人挺身而出幹，但出來幹的人稍有不慎就被指責爲投機分子野心家。「槍打出頭鳥」，又豈是只指來自對方陣地而言。很奇怪，大好的事情往往正人君子不屑幹，那就只好由小人來幹了。小人既然肯幹好事，說明他還有好的一面。就是投機吧，至少他有投機的勇氣，這一點還是應該佩服的。而好人既然不願幹有利子衆人的大好事，表明他也好不到哪裡去。有少數自己什麼都不幹，而只是一味指責別人幹壞了的人，實在是連投機都不敢，都不配的懦夫。

說政治是危險的，可從兩個角度理解。一是從事民主運動的政治活動要受到專制勢力的迫害。二是捲入政治之後會身不由己地捲入權力鬭爭。就後者而言，也確實如此。職業政治家，以政治爲終生事業和飯碗，牽涉個人利益太深太直接，易于失去公正。而這方面，一個僅僅以政治爲 HOBBY，爲義務的捲入有限的普通群衆，就安全得多，更易予保持清醒和公正。只有更多的你、我這樣關心民主事業而又淡泊于政治，根本不想以政治爲職業的普通大眾直接參與民主團體，才是使民主運動更健康發展的根本道路。所以我認爲普通群衆的廣泛而有限的參與，實爲民運事業今後的一個重要方向。

四、民主運動必須多元化 and 增加透明度

當然，要改善群衆對民運團體的認同和參與，民運團體自身也應主動作一些調整。

首先，民運團體應該多元化。確實有很多人，強烈嚮往民主，但僅僅因爲對民運團體中某些人、事有看法而不願投入。這種情況下，如果多幾個民運團體，那麼他們就可以有所選擇。不同民運團體可以有不同策略、口號並側

重代表不同利益集團，這樣可以吸收更多層次的群眾參與進來。並且多元化所帶來的競爭和制衡，還有多方面的其他好處。

其次，民運團體應增加透明度和公開性。當然，這方面能走到什麼地步取決于另外一些條件。但最終目標應向民主國家的政黨的方向發展，成爲表態性的和政治展望相同者的俱樂部。

部。像共產黨那樣的政黨，有着太多的「黨內機密」，加入者要接受多年顯示「忠誠」的考驗等等，這些，都使之易于形成人身依附式的封建性幫會團體。

恐懼感往往同神秘感聯繫在一起。隨着民主團體透明度的增加，人們對它們的警誠心和恐懼感也會逐漸消滅。什麼時候人們完全能以

平常心來看待一個民運團體及其成員，那麼這個團體就可以總是很成功地獲得了群眾心理上的認同。而這一天的到來，同時也有賴于更多你、我這樣的平常人對民運團體的認真而有限的參與。

我對中國民聯的看法

李少民

今月五月四日，許多大陸留學生在紐約市集會遊行，支援國內學生要求民主。一位朋友告訴筆者，要不是中國民聯參加了遊行，來的留學生會更多——許多同學聽說民聯捲入，就不願來了。聽到這話，筆者很被這些聞民聯而去的同學感到遺憾：你們對民聯持這種歧視態度，對中國的改變和進步有好處嗎？要是這些同學能用這份精力來「歧視」一下獨裁中國的共產黨，倒肯定能使中國的改變和進步加快。

兩年來，每有機會，筆者總要替中國民聯做些宣傳，以致許多朋友都以爲我是中國民聯的成員了。其實正因爲筆者尚不是成員，才能從獨立的角度爲民聯說公道話。當然，俗語曰「債多不愁」。筆者之言論，按照中共之標準，早已是「反動透頂」，故多加一條民聯成員之「罪狀」，亦無甚妨礙。

聽到上述遊行一事，使筆者感到，許多大

陸同學，思想仍在框框之中，故實有必要專門談談對民聯的看法。

因爲民聯是一個主張在中國實行民主、反對獨裁的組織，所以要談民聯，便要講幾句目前獨裁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中共從一九四九年在大陸建立政權後，究竟爲中國人民做了些什麼好事？概括地說，少得可憐。用方勵之先生的話說，除了贏了幾場乒乓球外，共產黨無甚可誇耀的。

而中共在大陸造成的破壞，則是十分巨大的，且不說四十年來的歷次運動、整肅，使得幾乎每個家庭都被捲入，或多或少受到迫害；也且不提四十年內人民生活水平持續下降，目前水平低於印度；僅是五八年中共的大躍進所帶來的大饑饉，使得三年間有三千餘萬人餓死，相當於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十四年間日本鬼子在我國屠殺的人數（三千四百萬）

目前，由於中共仍然不肯放棄四項堅持，不肯建立有法律保障的私有制度和市場經濟，致使經濟改革基本停滯。不僅如此，所有改革的痛苦，如市場限配，物價失控，一齊出現；而改革的真正果實——私有制度，自由市場的建立，却毫無踪影。政治改革，則更是一籌莫展。而官僚之腐敗、貪污賄賂之嚴重，則比起一九四九年前的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

人民對政府毫無信心，紛紛設法出國，去那裡都行——那怕是北韓（筆者的一個朋友，在美獲博士回北大，最近爭取到一份去北韓工作的「美差」。）

面對這樣的獨裁，做爲一個獨立思考，有正義感的中國人，則應該支持任何反對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因爲不論這個反對的聲音有多少缺點，多麼不理想，它也不會幫助中共的忙，把中國大陸搞得更糟，中國大陸不可能再糟了

，無論怎樣改也比現在強，用英文講，叫做「IT COULDN'T BE WORSE AND CHANGE IS GOOD CHANGE」，把一個社會搞成這樣，不容易。中共在破壞中國社會的技巧上，無與倫比。

在大陸，由於中共的嚴厲鎮壓，旗幟鮮明地組織起來，反對獨裁，尚無條件。而在國外，由中國人組成的反對派組織，亦寥寥無幾。中國民聯恐怕是目前的唯一的以大陸留學生爲主的，有組織的反對派的聲音。它雖然有許多缺點，但它畢竟是一個反對中共獨裁的聲音，凡是從大陸來的人都深知當全社會只有一個聲音的情形。所以，有識之士更應該支持民聯，使它更加完善，更具水平，以推動中國的變革。中共這次說民聯是大陸學生運動的後台，可見民聯已逐漸在大陸有影響，更多的留學生的支持，將使民聯的質量與數量提高。

在留學生中，恐怕百分之九十的人是贊成民主的。僅僅做爲一個贊成民主的知識份子，也應該支持民聯。因爲民主的要義之一，是保護少數人的權利。而這一點，許多留學生尚未意識到。中國的歷次政治鬭爭，總是少數派（這裡的少數，不一定是人數上的少數，而是政治實力、財力、軍力上的少數）被迫害、鎮壓。在中國，一旦成爲少數派，就無生存的權利。而少數派只有在民主政體下，才能生存，才能受到保護，如同性戀者，AIDS病人的就業、上學之權利，只有在美國這樣的社會中，才能受到保護。

中國民聯與中共相比，誰是少數呢？很顯然，中共有四千多萬的黨員，上百萬的軍隊，控制着全中國大陸的資源，誰反對它，就鎮壓誰。而民聯不過是在美國紐約的一個以留學生爲主的組織，出版一份刊物叫「中國之春」反

對獨裁、批評中共。

在這樣的對比下，我們應該同情和支持誰呢？中共動用全國人民納的稅，來經營宣傳機器爲它說好話，我們若再去「錦上添花」，去支持它，或反對那些反對中共的聲音，就簡直是「助紂爲虐」了。

所以，僅僅做爲擁護民主的獨立的知識份子，我們也不應該歧視民聯。民聯同中共相比，是弱者，若有膽量，應該和民聯一樣，站出來批評中共。

生長在大陸的人們，由於多年的政治運動和中共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喪失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是非的能力。所以當很多人認識到應該反對中共的獨裁時，却仍然不由自主地按照中共所劃的雷池一步。例如，許多同學一聽搞組織、組黨，就十分反對，覺得不妥。細究起來，有什麼「不妥」？就連中共的憲法裡，也沒有禁止公民建立組織。所以，筆者竊以爲這些認爲搞組織「不妥」的人們，腦子裡還有中共的教育；搞組織就是「反革命集團」。

須知，中共是世界上最嚴密的組織之一。要反對這樣一個獨裁的組織，推動民主，那麼我們必須組織起來，這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每一個有志於推動中國變革的人該做的事。

從八四年的反精神污染，到八六年的反自由化，一直到這次的學生運動，越來越多的海外知識份子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制度內尋求改革，指望中共自動開明，是行不通的了，因而放棄了加入中共，從內部改革的念頭，而大部份則由此轉變爲獨立的知識份子，對中共持批評態度。

但多數同學在完成這個轉變的同時，又相

信中共過於強大，無人可以取代中共。故不願加入像民聯這樣的組織，公開反對中共的獨裁。這亦使筆者感到遺憾：如果人人都認爲中共不可能在反對下放棄獨裁，誰都不去反對它，那麼它的獨裁自然會繼續下去。

筆者去年夏天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八十九的留學生反對在憲法中寫入四項堅持，百分之十的未答，而贊成的只有百分之十。若這些反對的人們同時又認爲修改憲法無望，那四項堅持就會繼續留在憲法中；但是，如果這些反對的人們相信自己的力量，組織起來，推動修憲，那結果又會如何呢？

後記

此文撰寫於今年五月上旬，筆者見到許多同學在爭取民主的同時，又對中春進行不理性的歧視，感到痛心疾首。此文完稿後，曾投給「華僑日報」，該報編輯們讀後，曾告訴筆者，「寫得很好，很有說服力，但我們不能登。」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華僑日報」如此謹慎地與「中春」「劃清界線」，甚與中春爲敵，最後亦因其態度不夠「革命」，不得不停刊。這使筆者更感到我們必須保護最「反動」的，才能保護次「反動」的，亦才能保護我們每一個人自由發表言論、做人的權力。千萬不要再人人自保，爭先恐後地同最「反動」的劃清界線了。

「六·四」之後，此文有些地方過時了，但其中基本論理仍然是站得住腳的，對「中春」的歧視仍然存在。現在許多同學反對中共，但他們仍歧視「中春」，這種不許阿Q革命的心態，是到了應該被糾正的時候了。

中國之春恐懼症剖析

楊遠

一、對中春的恐懼，實質上來自對中共的恐懼

對中春的恐懼，我這裡主要指對民聯這個組織的恐懼，似乎有許多不正常的地方。

我給加州某大學一個朋友打電話，得知他因為將自己的名字公布在報紙上，作為某次簽名運動的聯絡人之一，結果他所在學校的中國同學及外州的朋友們或是善意打電話詢問他是否已加入了中春，或在背後議論紛紛，斷定他必定加入了中春，弄得他啼笑皆非。

在今年四月以來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中，中春的命運並不佳。它的代表在許多集會中不得代表組織發言，只能以個人名義發言。甚至中春一位後來公開身份的著名人物在加州的學運遊行前，還佈置什麼「防止中春的人搗亂。」不久，在其身份公開後，令人感到半可笑，半辛酸。

從朋友那兒得知，胡平在七月份被邀請去巴黎與吾爾開希、嚴家其等民運人士開會協商時，也有過一段不愉快的插曲。本來是邀請他去開會，入場似不應有問題，不料有人竟對此質疑，認為胡平不應參加會。後來民主投票了一下，以十八人比三的優勢讓胡平參加會，但只可代表個人，不可代表組織，按理說，這類事情決不應發生。參加會議的人都不是一般的

民運人士，在他們顛沛流離之時，得到不少人的幫助。幫助者中，不乏反共之士，也不乏中春的成員。當這些人伸出援助之手時，有正義感的人是不會舉行什麼投票，看看什麼人有資格去幫助這些民運人士的。但爲什麼到了一切都平安無事了，反而要進行一番資格審查呢？這讓人想起了文革初期「紅衛兵」審查人們是否有資格加入一樣。但此舉係知名民運人士所爲，令人費解。

類似的現象可以舉出許許多多，當某個人以他人所沒有的熱心參加民運時，他除了要付出額外的時間、精力、體力，損失掉打工的時間、娛樂的時間，付大量的長途電話費等等之外，還要準備另一種損失：懷疑。「這小子准參加了中春，否則幹嘛那麼積極。」於是，他得到的不是理解與支持，而是懷疑與非議。一些人可能一賭氣之下真的參加了中春，還有些人可能消沉了，當然不少人一笑了之，雖然心裡不太愉快，但搞民運的熱情仍然不減。

這種對中春的莫名其妙的恐懼與排斥心理，是一種政治上的病態心理。在蘇聯電影「湖畔」的結尾中有一段意味深長的插話：「世界很大，人就是整個世界。你是什麼樣的人，世界對你就是什麼樣子。」

具有這種政治上病態心理的人，往往容易用自己的想像去推測對方，而產生一個扭曲的

形象及結論。而這個病的根源也來自對中共的恐懼。

不少人認爲自己非常勇敢，敢和中共鬪爭，公然號召反對鄧、李、楊政權，似乎是無所畏懼的。

但中共建黨六十八年以來，建國四十年以來，在鎮壓不同意識形態反抗方面做了大量極有成效的工作，這種恐懼的心理已形成了某種自然的條件反射，也造成了一種思維慣性。

大陸上不少人的思維方式中，嚴重地存在着這種條件反射。譬如紅色似乎總是以革命、進步相關，而灰色、黃色、黑色、白色似乎就不地道。太陽與領袖、共產黨常常是同義詞。一見到「膏藥旗」、「青天白日旗」，不少人就會產生反感，盡管不少人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後誕生的，但聽到「國民黨」、「自由民主同盟」、「民主救國會」或一個組織的名稱與「民主」、「自由」、「人權」、「民權」等有關，立刻就產生戒心，認爲這種組織不是反動組織就是與反動組織有關。

有些人認爲中春政治性太強，他們宣稱對政治無興趣。一方面可能反映出一些搞政治的人素養不夠，讓不少人感到失望。但以另一方面講，爲什麼這麼多人躲着政治走，望政治而生畏，主要還是中共殘酷鎮壓的結果。在大陸上，不少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是：「好好學習，

少管閒事，少參與政治。」這種教育的本身就來源於長一輩人吃的不少苦頭。四十多年來中共的暴政吃了不知多少人，真可謂「苛政猛於虎」了。所以，儘管共產黨自稱是「照到哪裡哪裡亮」的人民的政黨，但現在在大陸上它已遭到人民心目中的唾棄。人民可以花錢送他們的子女們去學文化、學藝術、音樂等「有用」的東西，但從未聽說哪個家長送他們的子女去學黨史、學什麼政治課。可見對政治的迴避，正反映了人民對中共的恐懼及厭惡。

中春的不少成員可能對人們對中春的恐懼感到十分委屈和冤枉，在瞭解到產生這種「恐懼症」的根本原因後，這種委屈感應減少些。

二、對中春的「恐懼症」會很快消失嗎？

但是在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後，民聯是否很快就會被人們接受呢？我個人認為還需要一段相當的時間，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主要原因是不少人還是對政治迴避。他們可以短期參加運動，但決不願意長期成爲一個職業革命家，他們不但對民聯要迴避，也要對民主黨、民陣，甚至對全美學自聯採取迴避態度。可以預測的是，一旦參、衆兩院關於中國學生可長期居留及J-1學生免去二年回國要求的提案通過及形成法律後，參加民聯的人可能不會增多，因爲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過去一部份人參加民聯是爲了容易在美取得居留權，但這樣要冒某種政治風險。如果不需要冒此風險的話，不少人就不會去參加一個政治性組織。大多數人不但有親人在大陸，他們也希望他們能較自由地來往於中美兩國之間。可是，一旦這個法案通不過的話，參加民聯的人一定會增多。但只要中共對反對派別鎮壓一天，

這種恐懼症就要存在一天，中春對此要有充份準備。

(二)、人出於慣性，很不情願對自己過去的所言所行做出否定。中春剛成立時，遭到了相當一部份留學人員的反對。七年來，儘管過去反對中春的人或對中春有非議的人，現在在大部份民主運動的觀點上，和中春是一致的，但目前的一致並不等於人們會肯定中春過去的一切，一般來說，人們會說：「中春剛成立時的一些提法、做法就是不對，不符合當時的歷史條件。」或是說「中春的內亂說明這個組織也沒有什麼勁兒。」或是對「中國之春」雜誌上的一些文章認爲水平不高，而影響了對中春的看法。既然一些人們過去對中春有一種否定性的看法和言論，那麼如今讓人們轉變這種看法，一是中春自己要更多的工作；二是要給別人一些時間及理由達到這種轉變。人們對中春的批評，有許多是很有道理的。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對「中國之春」雜誌上提供學生名單然後免費贈送雜誌這個廣告的批評，這個廣告的消極作用很大，但連續登了數年，影響並不好。對爭取更多留學生加入中春或同情中春作用未必很大。當然，也有不少批評是沒有多少道理的，想當然的，或是頭腦中對中春已有了一個看法，然後再根據這個已先入爲主的看法積攢材料以至於對中春形成一些成見性的看法。但一個民主組織應有氣度容忍這些批評。

(三)、對中春的瞭解還不夠，尤其是中春內亂發生後，不少人還要觀望等待。

看來中春的活動中心是在東部，尤其是紐約一帶，但它是一個全世界的組織，因此，這樣一個千把人左右的組織要在世界上爲人瞭解與接受，現在主要的方法是靠「中國之春」這份刊物，但一般來說，人們並不光靠文章來

瞭解一個組織，他們必須接觸活生生的人，顯而易見的是，同一句話被兩個人說出，權威人士或有群衆威信的人說出與非權威人士或無群衆威信的人說出，會達到完全不同的效果。那麼，中春在各地的負責人是不是都很有群衆威信，他們的組織活動力如何，的確要直接影響人們願意接近中春，還是與之保持一定距離這個問題，中春內亂後，人們對中春一些負責人產生了一些看法，尤其讓人失望的是，他們看到一些一直宣揚民主思想的人在內亂中，表現得十分不民主。這對中春的影響產生了很壞的影響，這個影響要在一、二年內才能慢慢消除，而且前提條件是中春的工作有嶄新的面目。

三、消除對中春「恐懼症」的良藥就是中春自己

要消除對中春的「恐懼症」，委屈、埋怨都無濟於事，關鍵在於中春自己的努力。

第一條應該是花錢買批評。首先在組織內徵求批評意見，但要消除對中春的「恐懼症」，關鍵要走出中春，到各地去徵求意見，這需要一筆經費的，但爲了將中春搞好，這筆錢應該花，在美國，中春應首先到參加芝加哥會議的各校去，和各校聯誼會、學生自治會舉行座談，介紹中春的歷史、發展情況。既講過五關斬六將，也講關雲長走麥城。這些去各校去座談的人，應有很好的修養，氣量及口才，誠懇地向各地徵求意見。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讓各地瞭解中春。可以依靠盟員的同學關係與各地聯誼會接觸，應該說，從胡平上台後，中春的形象在留學生中有很大改善，但要做到中春能爲廣大留學生瞭解和理解，中春必須和各校的聯誼會或學生自治會直接打交道，多打交

道，從而達到和廣大同學多打交道的目的。俗話說「一回生，二回熟」。現在中和廣大的留學生在政治觀點與立場上沒有多少差異，關鍵是雙方選缺乏瞭解。可以或經人介紹，或自己去找，不一定非要「談戀愛」、「訂終身」，認識認識交個朋友總還是可以的吧。由於全美學理工科的學生比較多，他們不太習慣也不可能像一批學文的學生一樣幾乎能用全部的時間去搞民運。中春必須考慮到這個特點，鼓勵他們用部份時間參加民運。

第二就是要堅定地辦好「中國之春」這份雜誌，不但要向個人徵稿，也要向集體（如各校聯誼會、學生自治會）徵稿，尤其要重視那些首次向中春投稿的稿件，要和投稿人主動聯繫，編輯再花些功夫，也要將稿件修改好，爭取發出去。「中國之春」的排版、錯別字始終是一個問題。最近幾期有了很大進步，但漏掉作者姓名、錯字的現象還是有。中春的稿件還應多樣化。現在評論較多，報導較少，中春應多有些記者，搞些報導及採訪。因為中春的一些盟員還沒有「曝光」，這些採訪、報導應注意保密，但對於已「曝光」的人物，可進行適當報導。對其他組織的活動，經對方同意的話，可在「中國之春」上發表。這樣，有利於與其他組織間的交流。「中國之春」應向「爭鳴」學習，爭取多方搞到一些國內的第一手材料，消息力爭可靠、準確。發表這些消息時在細節方面也應注意，往往有時在細節方面失真就引起讀者對全篇稿件的懷疑。

爲了使「中國之春」更吸引人，中春在副刊上應加強一些。可以增加一些「讀者指南」的常識，如打工、報稅、簽證、旅行、移民、購物等方面的知識。雜誌有人買，有人看，民主思想就會傳播，對中春的恐懼感就會減少。

中春在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但應再加強一些。第七十六期上請談天行律師談政治庇護的文章就是一例。類似的文章可多組織一些。此外，過於冗長的文章在中國之春雜誌上應減少。七十六期討論法國大革命的文章就有些過長。

總之，「中國之春」這個雜誌辦成功了，中春就會站住腳，發展壯大。

第三是要注意「公關」這項工作。中春一定要找一批人專門從事「公關」工作。回答電話、徵求意見要非常耐心。不但在中春困難的時候要這樣做，將來就是發展了，日子好過了，也要這麼做。有些人慕名而來，有些人好奇而來，有些人試探而來，有些人鼓足了勇氣、膽戰心驚而來，當他們得到友好、和善、熱情、真誠的接待後，下一次再來的可能性就大了，否則，他們若感到有些「冷遇」的話，就不大會再來了。筆者本人會和「新聞自由導報」聯繫過二、三次，但聯繫的結果總是從無下文，那麼再聯繫的可能性就不會有多少了。希望中春在這一方面做得好些。千萬不要總是去走「名人」路線，而民運，正是許多無名人的廣泛的運動。因此，對那些目前似乎無名的人也要平等對待。

當然，對中春的恐懼，或排斥在某種程度上，是與某些人的山頭主義有關，與派系鬭爭也有關，但主要問題還是中春的可不必保密的那些組織活動、財政收入等並不爲留學生瞭解，因此中共製造的謠言或流言蜚語就容易中傷中春。要打破對中春的恐懼，首先要打破對中共的恐懼，那麼非要用中春的「人」去面對那些有恐懼心理的「人」，用「中國之春」作爲宣傳武器，這個「恐懼症」就會逐步得到治療。

全美免費電話

800-826-1577(日)

威州 (715) 675-2325 (日)

(715) 845-7477 (夜)

許氏人參



憑此回條郵購贈送人參食譜

許氏人參企業公司

HSU'S GINSENG ENTERPRISES INC.

DEPARTMENT A

T6819 COUNTY HIGHWAY W.

P.O. BOX 509 WAUSAU WI 54402-0509

請寄價目表及參考資料來：

顧客姓名(英文) NAME: _____

地址(英文) ADDRESS: _____

電話 HOME PHONE: _____

OFFICE PHONE: _____

健康之根源

移種野蔘
(半野山蔘)

正野蔘
(粉光蔘)

花旗蔘
(白蔘、西洋蔘)



一通免費電話，送貨到府
包裝精美、免稅、免運費
省却一切擠車泊車的煩惱

民聯「自恐症」和「他恐症」

河鳴

中國之春恐懼症，在一些地區相當程度地影響和妨礙了民聯組織的發展，因此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首先，對民聯的最大恐懼者無疑是中共現政權。這次北京大屠殺、全國大逮捕已充分說明他們根本不顧國家利益、人民利益，只顧他們自己的獨裁利益。因此他們最害怕民主，也最恐懼民聯和「中國之春」。此症在他們身上已是無藥可醫的了。

這裡我們想討論的是另外兩類：自恐症和他恐症。顧名思義，自恐症即民聯成員（主要是新成員）自身的莫名其妙的恐懼感；他恐症則指非民聯成員的大陸留學生對民聯的恐懼感。

（一）自恐症

本來，沒做虧心事是不會有什麼自恐症的。但在中共長期的宣傳、專制下長大的青年，其心態與民主國家青年的大不相同，都或多或少地變了形。即使你心懷不滿，即使你生來就有塊兒反骨，可捫心自問，最初都是懼怕中共政權的。每個剛出來的大陸人的心靈深處都有一個中共專制的幽靈似的陰影。不經有意識的心理自我校正，這層陰影是不會輕易淡去的。我的一個朋友在北京大屠殺的第二天，氣憤至極，在抗議大會上領頭高呼「打倒共產黨！」，可會後坐在台階上兩腿發軟，很有點反悔和後怕。而認識他的同學都知道他是個很好的人。因此，大陸留學生剛剛加入民聯、戴上中共

扣上的「反革命」帽子後而有一種隱隱的恐懼感是很自然的。事實上，這恐懼本身就是對中共獨裁專制的控訴。然而不排除此症，很難有效地開展工作。如何排除，我以為組織上至少可以在如下兩個方面着手：

（1）加強聯絡站內部的聯繫和活動。都知道單人夜行易生畏。故一個地區或學校內的盟員們應該相互知道並充分來往。大家不定期地聚一聚，除工作計劃外，生活上也多互相關照，使民聯的較抽象的組織關係具體友誼化，大家在一起就像是 HIKING CLUB 的成員一樣輕鬆愉快。這應該是各聯絡站長的職責之一。

（2）減弱組織保密性與個人保密感。自古有密便生懼。民聯最初的保密制在當時條件下是必要的。但隨形勢發展至今，其必要性已在大範圍內失去了意義。所以在組織上減弱保密義務的同時，應鼓勵盟員以各種方式公開身份。很難相信一個始終神神秘密的組織會有很大的發展和作為。為了邁出有效的第一步，我覺得「中國之春」應分期公佈自願公開身份的盟員名單，並盡量要求站長以上職務的盟員，除非特需，公開身份以便開展工作。

我相信在這一加強和一個減弱的有效實施後，中國民聯將會在世界範圍的各大學裡產生新的契機，並有無限量的發展。

（二）他恐症

本來，你沒意損害別人，別人也就不該對你恐懼、不敢接近。然而由於中共一貫的親友

誅連的卑劣作法，加上拼命醜化自己的對手為「武裝到牙齒的兇殘」或「毒蛇般的奸詐」，很容易使人們受蒙騙上當。因此，有不少人不敢或不願與民聯接觸是十分正常的。這些人可分為兩類：一般地說來，前一類應該是我們努力發展的對象；後一類則多半是我們合作的夥伴。解決「他恐症」，眼下可謂大好時機。北京大屠殺已使海外學生學者開始敵視甚至仇視中共現政權。這無疑大大減弱了前一類人對中共的畏懼，也粉碎了他們對中共的信賴或幻想（假如有過的話）。如果在這個時候，我們不僅公開大招盟員，並且每一個成員也都公開或半公開地積極活動，尤其在熟人和親友中，則可以期望我們的組織近期會有大發展。我有一個好友來美才半年多，有次在電話裡聊天，他無意地對民聯指東道西。我問他從哪裡聽來的，他說是出國前教委洗腦時說的。於是，我坦然告訴他我就是民聯成員，並對他作了些解釋和介紹，他聽後就決定也要加入民聯了。可見，朋友間的信任對我們組織的發展是很有效的。對於第二類人，我們則要努力、誠懇地合作。他們的心理很複雜，對我們自然有所「介意」。因此我們更該克己，更該珍惜合作的形勢，而不過於拘泥於內容（關於「形式重於內容」，丁楚曾有過精闢的討論）。我們的目標是促成中國民主化。因此任何這個方向的合作都無疑是加強了我們的力量。只要眼光放遠些，不爭功名不爭地位，多花時間做具體的事情，別人是會看到我們合作的誠意的。了却了後顧之憂，相互之間就會信任起來，從而進一步地合作，以至逐漸地志同道合。當然，在我們的成員公開化初期，過去的那種含糊的合作就不大可能了。如何在各地闢開這第一步是

個策略。在各地的活躍份子中，不乏一些較有影響力且素質較高、心胸也較寬的人，他們是促成合作的最有效力量。另外，有些活動由於條件限制不宜一下就打出民聯旗號。但我們身份公開的成員仍可積極參與甚至起一定的主導

。不過對這些活動的報導要謹慎如實，不一定非要歸在誰的名下。「中國之春」影響大，傾向性也大，稍有出入則會使合作者不滿，甚至合作破裂。

總之，辦好一家刊物，也許是為數不多的

我加入了中國民聯

石劍鵬

「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這是天安門絕食者的宣言。

每當面對這一幅悲壯的畫卷，我的內心總是激蕩着震撼與衝動。我想，北京大屠殺之後，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不能不重新選擇自己的路，因為中國上空迴響的罪惡槍聲和天安門廣場流瀉的烈士們的熱血已經粉碎了人們對這「法西斯獨裁政權尚存的最後一絲幻想」。

我的選擇是什麼？大屠殺後，我加入了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今年四月學潮、五月民運，激發了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熱情。

為了衝破新聞封鎖，我同一位朋友一道，幾乎沒合眼地奮戰了幾個晝夜，從我們能到手的報刊材料中整理了一份學運大事記，取名為「歷史，悲愴的一頁」，並大批寄往國內，想讓人們瞭解事件真相，瞭解學生們究竟在想什麼、做什麼、要求些什麼。當我覺得能為民主事業盡一點力的時候，心裡感到了充實。

六月初，我接到一封大屠殺前一天來自北京的家書。信是由我們大家庭中一名共產黨員、優秀教師代表全家寫的。自四月來，我收到

的寥寥幾封家信從未提及北京學運。當我向家中反饋發生在他們身邊的事情時，他們這樣對我說：「看來你聽了不少謠言，北京的情況不像國外宣傳的那樣，只是大學生對當前有些人腐敗影響黨的聲譽有些意見。我們黨是偉大的，使中國巨人般屹立在世界東方是不容易的。我不是跟你唱高調，相信我們國家可以妥善解決問題。你在國外不要參與任何活動，不要再寄這些沒有根據的宣傳品。咱們家都是老老實實幹工作的人，安定團結是我們的願望，所以三個弟弟都沒有參加遊行、絕食。目前，事態已平息，北京交通秩序均已恢復正常，生活平靜。」

雖然，我愛我的親人，但我更追求真理。此信給我很大的震驚。我感到氣憤，也深知像我家中這樣的人在中國並不是少數。

近些年來接連不斷的思想解放運動，大學生和知識份子爭民主、自由、人權的運動，包括這次幾乎捲進了一切社會階層的學潮，為什麼還沒能打破一些人對專制政權的盲從？既然承認大學生是在反腐敗，為什麼又將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說成是搞動亂？為什麼不誠懇地

一些人的事情，但建立好一個組織，的確是每一個成員的義務和責任。過去的幾年裡，「中國之春」雜誌的編輯出版工作方面的成就已有目共睹的了。誠願在今後的幾年裡，民聯的組織工作方面能在大家的齊心努力下更有突破。

聽取他們的意見，盡快解決問題？而置天安門三千人絕食七日於不顧？難道陳兵數十萬於北京城下是為「妥善」解決腐敗問題嗎？我們從小就被灌輸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但當我們看到繁榮發達的美國、西歐、日本、亞洲四小龍時，不得不承認社會主義中國的人民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如何能證明共產黨是偉大的？我們民族一貫期待好皇帝，逆來順受，我想該是徹底摒棄這些東西的時候了。

我家離天安門廣場不過一、二里，「六四」那夜，可以看到火光、嗅到火藥味，甚至可以聽到成千上萬人悲愴的哭聲。此刻，不知我的家人在想什麼？每當我想起紀念碑下靜坐的學生，想起廣場上流瀉的鮮血，心中就有無比的悲痛。無論是世界上哪個地區的戰爭與流血，無論是西藏所謂的暴亂與軍管，都不能這些強烈地撕裂着我的心。因為這畢竟發生在我非常熟悉的地方，是我非常熟悉的人們，是我的校友，他們才二十歲呀！更可怕的是那個法西斯獨裁政府一面在大搜捕民運人士，一面又在掩蓋事實、欺騙人民。

在局勢嚴重惡化的情況下，我給家中回了這樣一封信：「家中父老好。祝賀兄弟姐妹們槍下餘生！接到家中的信使我很震驚，不知×

×看到學生們的血做何感想，如果後悔，現在還來得及，退黨就是了。其實家中大可不必對我不放心，你們知道，我沒有參與政治活動的能力，我只想不斷給國內親友寄材料，讓你們多瞭解情況，多想一想，爲什麼共產黨的宣傳就有根據，而國外的報導（注意不是「宣傳」）就都是謠言？很遺憾，我是咱們家的叛逆，不能僅僅爲了「安定團結」、「生活平靜」就「老老實實」。我將這樣做下去，直到你們用自己的頭腦思考爲止。」

信雖寄出，心情並未平靜，反而有些茫然。我還能再做點什麼？我又一次深感個人力量的微弱。要想有力量，就得組織起來。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以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爲宗旨，在海外積蓄了比較雄厚的力量，再爲中國的民主事業奮鬥了六、七年。於是，我做出決定，加入了這個組織，成爲它的一員。

我邁出這一步，並非偶然，並非一時衝動。一九七九年秋我入北京大學讀書。具有悠久民主傳統的北大及當時的神州大地，又一次處於思想活躍的峰巒。在北京，有西單民主牆，在上海，有政治沙龍；在校園裡，有薩特存在主義的討論，在社會上，有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出版界有「走向未來」叢書，理論界，有對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探究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十年浩劫後深沉的失落感籠罩着我們的民族，越來越多的人們在尋找一條把中國從苦難中徹底拯救出來的道路。當時「北京之春」編輯部就在我們系，我讀過他們很多文章。轟轟烈烈的「北京之春」民主運動就在這種情況下朦朧醜陋薰陶着我。

八〇年秋我做爲北大學生會的常務代表參與決策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校黨委同意學生自己選出兩名北京市海峽區人民代表。當常務代

表會議討論選舉方式時，與會代表異口同聲地喊出「競選！」由此開了差額選舉的先河，拉開了北大民主競選的帷幕。當時對競選的贊同只是想真正表達個人意願，選一個自己信得過的人。但在競選中，競選人雄辯的口才、深入淺出的政見闡述和人人都可以平等表達意見的民主形式，深深地感染着我，使我大開眼界。然而，民主的春天並未真正來臨。民主牆被查封了，魏京生等思想犯鋸鐐入獄，胡平、王軍濤、房志遠等競選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心中剛剛萌發的民主思想行將枯萎。

我開始幻想中國內部經濟改革之風和來自外部新技術革命的浪潮會把中國推向新生。隨着經濟改革的深入，暴露出很多現有體制根本無法跨越的障礙，像開放市場經濟引起的物價問題，生產資料公有引起的「官倒」，特別是束縛人們的「四個堅持」，等等。這些都從根本上阻礙着中國的進步。八六年底一個寒冷的冬夜，我從中關村返回城裡，同清華、北大爭民主的學生遊行隊伍不期而遇。我不由地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彷彿在溫習着我似曾相識的東西，也在思考着學生們顯得蒼白單調的口號：「我們要民主！我們要自由！」是的，當時並沒有廣大的社會階層響應，但當年學生無疑是我們這個民族軀體中最敏感的神經，他們又一次觸及了經濟改革的徵候，展示了我們這個民族真正的希望。然而，學潮的結果却是胡耀邦的下台和衆多知識份子的被整肅。希望何在？我幾乎失去了對中國改革前途的信心。

八七年初我來到美國，第一次見到「中國之春」雜誌，感到「北京之春」的民主大旗並沒有倒，在海外已發展成「中國之春」。我很欽佩「中春」那些爲中國民主事業奮鬥的勇士們。一直很有興趣地讀着它們的文章，同時和

當地的民聯成員保持着良好的關係，經常交換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今年上半年，民聯一下捅出很多問題，似乎發生了危機。我感到一個爭民主的組織運作的艱難性和複雜性。這才真正開始對這個組織和它所從事運動的認真思考。由於對民主自由的嚮往和對民聯的尊崇與期望，我感到民聯在從事民主運動的同時也該學習民主、實踐民主，而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也不足爲怪。出於這種考慮，民聯的問題並沒有妨礙我在大屠殺後加入。經過「八九」學運的洗禮，我深愛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我感到自己有能力爲這一事業做點事，而民聯正是我得以發揮的天地。

我認爲，中國民聯應該是一個戰鬥性的組織，倡導民主、喚起民衆，爲在中國推翻獨裁統治，建立民主政體進行不懈的努力；同時，中國民聯也應該是一個民主性的組織，以民聯自身爲實驗室，作民主運行的實驗，大家在一起學習民主，運用民主，提高自身的民主素質，爲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民主運作做準備。這應是當前中國民聯的兩大任務。

我相信，我的同齡中很多與我有類似的經歷，我也相信，很多人對中國民聯與我有類似的看法；我希望，與我有類似經歷和類似想法的朋友們加入中國民聯，我也希望，凡認同民主事業，願爲此做些事情的朋友們也加入我們的行列，讓我們並肩作戰。

專制的基礎是人們的恐懼心理。中共法西斯獨裁者們正是利用這種心理，把民聯打成反動組織，製造出「中春」恐懼症。天安門烈士們的鮮血已摧生出千萬萬勇敢的人，這將從根本上動搖專制的基礎，現在是徹底醫治這種恐懼症的時候了。

中國民聯總章程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

一九八九年六月廿五日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本組織定名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主辦「中國之春」雜誌。

第二條：本盟以獨立自主為原則，聯合一切民主力量，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現行的專制制度，實行「民主、法治、自由、人權」。

第三條：本盟主張：廢除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憲政，保障私有財產，提倡多元經濟。

第四條：本盟致力於中國大陸民主事業。近期目標為：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四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釋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見者；爭取新聞、出版、言論、集會自由，保障人民基本權利。

第二章 盟員

第五條：凡認同本盟章程，進行登記，並由原盟員一名介紹，經基層組織（特殊情況可經總部）批准，交納盟費，報總部備案，即成為本盟盟員。其盟齡由批准之日算起。

第六條：盟員有遵守本盟章程，保守本盟機密，執行本盟決議，宣傳本盟宗旨的責

任，以及交納盟費，參加本盟活動，介紹申請者入盟等義務。

第七條：盟員入盟一個月後有選舉權，三個月後有被選舉權。盟員在組織內有發表意見、對各級組織負責人提出批評、參加表決和對處分提出上訴的權利。

第八條：盟員如違背章程，本盟將依情節輕重按懲法處理。

第九條：凡要求退盟者，須向所在基層組織書面提出，報總部備案除名。凡一年不參加組織活動或無故不交納盟費者，按自動退出論。

第十條：本盟有責任營救因參與本盟工作而發生事故的盟員及盟外人士，並照顧其有瞻養責任之親屬。

第三章 組織

第十一條：本盟組織原則為：服從多數人裁決，尊重少數人權利。反對派在盟內合法存在，但不能在盟內成立體制外的組織。

第十二條：本盟設總部、分部、支部和聯絡站。基層組織的設立，須經總部批准及備案。特殊情況下，某些盟員可與任何一級協調機構負責組織工作的盟員直接聯繫。

第十三條：本盟設總部為最高行政機構，由主席、副主席及若干幹事組成。本盟設聯盟委員會，在聯盟代表大會

閉會期間為最高立法機構，由主任委員及若干委員組成。

本盟設監察委員會為最高監察機構，由主任委員及若干委員組成。以上三機構成員不得互兼。

第十四條：聯盟主席一職，連任不得超過兩屆。

第十五條：聯盟代表大會為本盟最高權力機構，每兩年舉行一次。其代表由各基層組織選舉產生，其他具體事項，由聯盟委員會決定。特殊情況下，須經聯盟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前或延期召開，但延期不得超過半年。

第十六條：下屆聯盟代表大會籌備成員，由聯盟委員會提名產生，籌備組成員不得參加下屆主席、副主席的競選。

第十七條：本盟各級負責人的罷免，應按罷免法處理。

第十八條：各級委員會作出決議時，至少要有三分之二委員參加投票，決議必須獲得全體委員過半數通過生效。經證實收到通知未參與投票者，作棄權論處。同意與否定票數相等時，主任委員有最後裁決權。

第十九條：對任何提案或提議，任何代表如認為有重大影響，可要求聯盟代表大會對其重要性表決。經二分之一以上代表通過後，該提案或提議即為重大提案。凡重大提案及重大提議，必須經三分之二以上代表通過方能生效。

第二十條：對聯盟總章程的任何改動，應按重大議案處理。

第二十一條：本盟總章程之修改權歸聯盟代表大會，解釋權歸監察委員會。

每一代人，都要接受歷史的審判。而這一審判的執行者，是他們的子孫。
終有一天，我們這一代人也要面臨子孫的審判。那時候，我們何言以對他們憤然的質問

同時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本錢。

也許，我們這一代人中間有人會反駁：罪惡在於那個制度，而這個制度是上一代人替我們選擇的。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去審判上一代人？如果我們不去審判他們，那麼我們就要被下一代人審判！兩者必居其一。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國人口的數字突破了十一億，那麼維持他們生存的這片國土是一個什麼狀況呢？

是不容置疑的，人類文明的起源幾乎都在水邊。四河—海（尼羅河、恒河、幼發拉底河、黃河和愛琴海）是人類發祥地。人和水，自古就結下了不解之緣。
可是，在中國，有兩億人生活在乾渴中。

面對子孫的審判

壯麗的河山何以變得這般殘破？
富饒的土地何以變得如此貧瘠？
我們祖先留下的遺產何在？

我們腳下賴以生存的國土何在？
我們將愧對子孫。這個國家在我們的手中

敗掉了！以無以倫比的速度：四十年。

既然我們沒有能力讓這個民族在我們手中起飛，那就不妨把這份遺產留給子孫，讓他們去完成這個使命。然而，我們不但沒有能力創業，也沒有能力守業，國土在我們手中淪喪，使我們的子孫不但失去了振興這個民族的憑據，

乾渴的土地

自古以來，人們就在不停地辯論，到底是火還是水哺育了人類的文明。禮平的著名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把這個辯論的主題表現得淋漓盡至。

然而，無論辯論的結局如何。有一個事實

楊天樹

在他們生存的土地上，文明正在萎縮和凋零。
一九八三年，國務院做出了一個決定，將隴中地區七十萬無水生存的居民遷移到西邊的河西走廊。這個移民計劃將耗資二十億，費時十年。

去過隴中的人都會為那裡情形所震慄，那裡的人能夠活下來簡直就是奇蹟。甘肅會寧縣、定西縣、寧夏西吉縣、海源縣，有將近一百五十萬人靠汽車運水生存。每年單是運水維生的費用就達上千萬元。

每隔三天，就有一輛輛拉水罐車從黃河邊

出發，駛向各自的責任村。進村的拉水車黃土飛揚的屁股後面，擁擠地跟着一群牛羊，搶着車後面洒出的零星水滴，車頂，一群群像轟炸機一樣的鳥在盤旋，不時地俯衝下來與牲畜搶水。

村裡，乾渴之極的人們早就排着長隊等候了，他們每個人的配額是每天五斤水。每天不知要發生多少次為幾兩水而戰的械鬥，生存空間如此殘酷，驕陽把人們的心烤得暴燥不羈。離黃河較近的靖遠縣比上述地區要幸運一些。這裡有着一個個大凹坑組成的飲水工程。幾十里長的水管伸入黃河，每三日開動一次發動機。每噸水的成本是一元五角，而賣出去是五角，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居民來挑水拉水。國家財政每年要為這些飲水工程補貼百萬元。

幾十年前，這一帶還是馬場，有半人深的草，溝裡的水泊泊作響。可是今天，舉目一片黃土，草被連根鏟光了，沒有了草也就存不住水。這裡每年平均降雨三百毫米，而蒸發量近二千毫米。大自然嚴重收支失衡。照此速度幾十年後，這裡將成爲一片乾枯的荒野。

生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從小就在爲水而操勞。每逢喜慶，一家人要存幾十天的水，結婚要到各家去勻水、借水。在這裡，一碗水可以換一個壯勞力半天工。一個小伙子從早幹到晚只能得到兩碗黃泥水的報酬。有的家庭欠的水債，連上子孫三代都還不清。

老年人都懷念過去。他們的爺爺告訴他們的情景與今天不一樣，就是他們年輕時，也不像今天這樣窘困。他們說的是實話，否則你很難解釋，那會兒沒有汽車、沒有四十公里長的水管和突突叫的水泵，人們怎麼活下來。

水，人類生存的最基本資源，都上哪去了。

消失的綠色

水和綠色是形影相隨的。常識告訴人們，所有植物的生長都離不開水。然而，在中國的這片土地上，很多人還不知道另一個常識：水的蓄節同樣也離不開植物。

你要尋找水，首先要尋找綠色。你要問水上哪裡去了，首先要問：綠色上哪裡去了。我們國土的植被上哪裡去了。

五十年代的小學課本告訴我們，我國的森林面積佔全國面積的百分之十。草原佔百分之七。可是這些課本每年都要改寫。到今天，我們森林和草原的面積已不足百分之四。一年前的那場森林大火，幾乎葬送了我們民族最後一片有價值的原始林區。

災難是從五八年開始的，一場大煉鋼鐵的運動，毀掉了全國森林覆蓋面積的百分之十五。從此砍伐屠殺的「人民戰爭」就開始了。僅七十年代十年，我們就失去森林覆蓋面積的百分之三十。

詩中鬱鬱葱葱的嶺南五岳和五夷山已變得草木凋零。那裡，人類正以每年六十萬畝的速度吞食着土地的植被。五夷山每年耗於生產香菇木耳的闊葉林木材就達一百四十萬立方米，這一代人爲了眼前的小錢，把子孫的基業毀於一旦。一九八九年三月，福州市一戶居民爲了蓋房子砍掉了一棵生長幾百年的大樹，在省政府眼皮底下人們都敢如此猖狂，可想深山老林裡的刀斧手多麼肆無忌憚。

祖國的大西南，川黔滇湘，被稱爲我國後備的經濟林區。如今，這裡的後備隊已被拉上殺戮的第一線。森林，正以每年兩百萬畝的速度消失。湘資沅澧四水上游，木材生意方興未

艾，每年有數百萬方木材被偷運出境。湘西慈利縣熊家莊圪岩村黨支書朱中清帶頭做木材生意，五年間把全村二千二百多畝山林砍伐一淨，連幼樹也沒留給子孫。

五十年前，我們的祖先軒轅黃帝帶領他的子民在喬山山脈子午嶺親手種下一片喬山柏的。幾千年來，這片喬山柏鬱鬱蔥蔥，忠實地阻擋着南下的風沙。可是就在這最近的二十年中，喬山林區綫由北向南後退了四十公里，子午嶺上，被砍伐得滿目蒼夷。我們這一代人，不光愧對子孫，同時也愧對祖先。

新疆和青海的老人，還常常會懷念兩個在共產黨課本中臭名昭著的人物：左宗棠，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軍的劊子手；馬步芳，雙手沾滿紅軍西征軍將士鮮血的軍閥。左宗棠當年抬着棺材進疆，屯軍興修水利，種樹植草。人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門。至今人們仍把左宗棠栽的柳樹稱爲「左公柳」。馬步芳統治青海時期，下令老百姓種樹。四十年前，西寧到蘭州、大通、湟源、湟中等地的沿途都有夾道的綠蔭。西寧市的麒麟公園、東郊公園，楊柳婀娜，均是馬步芳的德政。馬步芳當年派兵護林，不准亂伐，其遠見卓識，在今日統治者之上。

今天，新疆的森林覆蓋面比四十年前減少了三分之一。數以百萬畝的河谷林、灌木林、胡楊林葬身刀斧。准葛爾西部山區和昆崑山已無木可伐。天山南麓木已伐光，屠場正向東部轉移。阿爾泰山原來山高林密，現在已山高林疏。在一片砍伐聲中，天山的雪綫在上升，大漠的熱浪在逼近。

青海，是我國植被覆蓋面最少的省份，同樣也躲不過這四十年的浩劫。如今的柴達木盆地像被飛機轟炸過一樣，佈滿被連根挖走的紅

柳坑。這裡的植被以每年四十萬畝的速率在毀滅，沙漠以每年一百萬畝的速率在擴張。馬步芳留下的防風固沙林早已被一道道突破，西部的風沙綫正以每年五公里的速度噬食東部的草原。以此繼往，六十年後青海將枉戴「青」字。

一九七五年，馬步芳客死埃及，臨終前他面叩東北青海方向，老淚縱橫，難道他真的預感到了家鄉的末日？

在我國植被毀滅的重災區——黃土高原，場面更是慘不忍睹。那裡，樹木早已成爲奢侈品，連草根都在面臨「斬草除根」的最後割宰，那裡，人類在進行最後的屠殺，下一個屠殺的目標將是他們的同類。

黃土高原上，佈滿了祖宗供的龍王廟，廟裡的柱子常有一兩抱粗。這都是當時山上的木材，這說明幾代之前這裡並非滿目荒土。可是人們要吃飯，煮飯要燒柴，柴從哪裡來？開始人們砍樹，樹砍完了伐灌木，灌木也砍完了，到了這一代人，山上只剩下草了。

黃土高原的孩子從小就要帶着一把小鏟子上學，放學後鏟一筐草皮回家燒飯。從前在村邊鏟，村邊鏟完了到村外鏟，現在他們不得不到十幾里地以外的荒山上去鏟了。爲了圈地鏟草，村落之間，甚至同村之間的孩子常常發生毆鬥，爲了爭奪生存空間的戰爭，在孩子們幼小的意識中就預演了。

甘肅定西縣，一九八二年每個農戶平均鏟草皮二十五點三畝，全縣鏟過的山坡地數以百萬畝。年復一年的草皮戰，直鏟得全縣寸草不生，市場上四分錢能買一斤山芋，但却買不來一斤燒火用的草。

草皮挖盡了，人們現在又在挖草根。六平方公尺的草皮下可挖出四斤鮮草根，曬乾後塞進

鍋底，只夠一家四口人燒一鍋開水。人們在擔憂，當草根也燒盡的時候，下一代人燒什麼？難怪一位專家斷言：不解決八億農民的燃料問題，恢復我國的綠化覆蓋永遠是紙上談兵。能源其實就在眼前。中國的西北是世界上陽光最充足的地區之一。在這裡，如果能突破太陽能的利用技術，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燃料問題。



被風沙埋掉的村莊

火和水同樣也有着不解之緣，兩者共同哺育着人類的文明。兩者的能量會相互轉化，只不過其中要經過一系列的中間環節。通過這生態平衡圈，火，能轉化爲水。

現在這一生態圈危在旦夕。它一旦斷裂，水，不但不是人類文明之母，而將成爲人類文明之敵。

暴虐的江河

一九七七年夏，被人們謳歌的清澈的延河水忽然兇像畢露，以每秒鐘七千八百立方公尺的速度撲向「革命的聖地」延安。洪峰所到之處勢不可擋，王家坪水泥大橋被截爲兩段，六層樓的賓館被連根拔起，延安革命紀念館被衝得七零八落，許多「革命文物」付之東流。整個延河兩岸，山崖紛紛倒塌，百分之八十的崖壁發生滑坡，吳起縣和志丹縣數百個村子被淹，一百萬立方的水庫，五千八百多座蓄水池，十一條千畝以上的灌溉渠頃刻間化爲烏有。

鳳凰山，清涼山上，擠滿了死裡逃生的延安人。他們只能向上蒼祈禱。這半個世紀以來，延安人民捧出了一位「人民的大救星」，然而這位救星並沒有扭轉他們的厄運。四十年來，延河水由清變混，由溫順而變得反復無常。歷史像是要嘲弄老區的人民一樣，在「人民救星」撒手人寰一年後，就來了個徹底的報復。隨着綠色植被的減少，中國大地上幾乎所有河流的脾氣都變得日益暴虐。

對於黃河的險況，人們早已麻木了。現在更多的擔心已集中在長江身上。用不着論證，長江已變成第二條黃河，只要沒有色盲的人都不會懷疑這個論斷。

佔長江三分之一的上游金沙江兩岸早已是赤壁千里，穿過雲南的二十二個縣的河谷已到了百里不見樹木的境地。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七六年三十五年間，金沙江每立方公尺的含沙量增加了零點二公斤，從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五年的九年就增加了零點六公斤。目前，長江每年帶入東海的泥沙已達五點三億噸。是黃河的三分之一，但是相當於另三條與它齊名的世界

大河——尼羅河、亞馬遜河和密西西比河——年輸沙量的總和。

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長江幾乎是年年發生洪訊，長江中下游沿岸險象環生。

一九八〇年夏，大水衝進了南京，淹了半座城區，馬鞍山以下沿江兩岸數百處破堤，八千餘個村莊被淹。

國務院為緩解下游險情，確保上海、南京，取北保江漢（平原），南棄荊湖（平原）的戰略，開閘釋洪，將長江洪峰引向洞庭湖，結果使荊湖平原成爲一片澤國。

一九八八年，長江再一次發生特大秋訊，上述驚險鏡頭再現。九月三日，常德西湖農場決堤，淹沒耕地三萬畝，房屋一萬間；次日鼎城區大堤崩決，三萬七千畝耕地成了一片汪洋。當日，大水漫過漢壽縣十三個河堤，三十五萬畝稻田受淹，七千四百棟房屋被沖垮。安鄉縣，外河洪水漫過大堤，三十萬畝，萬餘房屋被淹。在太平村，小河口村數百村民以人牆堵住洪口，二十八人當場喪生。這次四十年來的最大洪訊，湖南受災耕地達七百萬畝，損失慘重的華容縣，幾遭滅頂。

長江中下游平原，是中國目前最大的糧倉。哺育這個糧倉的，是長江母親，現在要毀滅這個糧倉的，同樣是這個母親的手。

大約一千年前，黃河被遺棄了：中華民族的黃河文明被長江文明所取代。可是今天，長江流域的文明又將面臨南移的命運。那麼，下一代文明的駐留地將是哪呢？

是珠江流域嗎？可是珠江也在告急。

一九八八年，西江發生特大洪峰，上游的柳江，紅水河出現本世紀最高水位，五百萬畝農田被淹，經濟損失達九億人民幣。

西江讓人捏着一把汗，東江北江更觸目驚

心。溯東江而上，上游一帶的水已變成鐵紅色，梅江、寧江兩岸光禿一片，草木寥落。一九八三年北江發生特大洪峰，沖垮了「固若金湯」的北江大堤。這座大堤是一九七〇年十萬人會戰所築，據說能抵百年不遇的洪水，可是它在十三年之後便土崩瓦解了。顯然，人們需要重新修訂洪水的數量級了。

八十年代，在中國的大地上不知還有幾條河稱得上清澈，溫順？

贛江被染紅了，漢江被染紅，湘江被染紅了，混濁，像瘟疫一樣在祖國的江河巨川中蔓延……

一九八〇年，岷江發生百年不遇的洪峰；一九八三年，韓江發生百年不遇的洪峰；一九八六年，遼河出現百年不遇的洪峰；一九八八年，嫩江發生百年不遇的洪峰……加上紅水河、柳江、北江，洪峰此起彼伏。人們在問，在短短的八十年代，所有的河流都變得焦躁不安，本世紀最大的洪訊相繼出現，這是偶然，還是必然？

流失的國土

隨着江河的暴虐而來的，是國土的流失。

黃河千年的沖刷，早已把黃土高原的肥田沃土帶進了大海。現在，厄運又降臨在中國的紅土地帶。只要看一下長江以南的河流所呈的鐵紅色，就不難想像這一帶水土流失的程度了。

五十年代，長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積爲三十六萬平方公里，而八十年代已擴張到五十六萬平方公里，佔全流域面積的三分之一。五十年代，長江四川段水土流失面積爲九萬五千平方公里，今天已增至二十五萬平方公里，湖南段

五十年代水土流失面積爲一萬八千平方公里，今天已增到四萬。

一九八八年，長江流域的土壤侵蝕總量已和黃河流域並駕齊驅了。「紅土地」正在變第二個「黃土地」。中國人，一手砍掉了故土的植被，另一手把國土送進大海。

綿延一千公里，北起黑龍江克山、拜泉；南至遼寧昌平、鐵嶺的東北黑土帶，是中國大陸唯一值得驕傲的本錢了，在這個地球上，能與之媲美的也只有蘇聯的烏克蘭平原和美國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黑土層帶。然而，這一億五千畝黑土帶也面臨着危機。

隨着墾荒和植被的喪失，三江平原的鹽鹼地面積迅速擴大。松花江右岸古河道地帶，白花的鹽鹼地已達二百二十萬畝。目前，三江平原的水土流失面積已達一千二百四十萬畝，佔已開發耕地的四分之一。拜泉縣每年流失的黑色有機質表土一厘米，而地球上形成這一厘米表土需要四百年時間。整個東北的黑土帶，正以每年每平方公里一千噸的速率流失。

中國人仍舊在重溫着「地大物博」的故夢。照上述速度，我們的國土最多只能維持二百年，到那時，中華民族將真正地一無所有，一窮二白。

萎縮的湖泊

水土流失禍及的另一個目標是湖泊。中國的湖泊今天同樣也處在憂患的陰影下。

洞庭湖，曾經是我國的第一大湖。

一八二六年，它的面積約六千平方公里。而到一九八六年，它已縮小到二千七百平方公里，一百六十年間，洞庭湖縮小了一大半，只剩下原來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五。一九四九年，

整個湖水的容積為二百九十三億立方米，可是今天已減少至一百七十五億立方米。二十年前，當洞庭湖把第一大湖的桂冠讓給鄱陽湖時，專家還在擔心它的萎縮，可是今天，所有的人都在擔心它的存亡了。洞庭湖正在走向消亡。有關專家推算，照今天的加速率收縮，六十一年之後，號稱八百里的洞庭將不復存在！

洞庭湖納湘資沅澧四水，吞吐長江，為華中腹地調節旱澇的蓄水池。然而，近二十年來，由於四水和長江上游的植被破壞，每年約有一億四千萬立方的泥沙被帶入湖中。近四十年來，共有四十億立方米淤積總量，按現有面積平攤，全湖區平均淤高一米。常德地區的七里湖，平均淤高五至七米。無窮無盡的泥沙，不斷抬高湖底，壓縮湖區，迫使湖面上升，吞吐能力下降，整個湖區防洪大堤總長三千四百七十餘公里，隨着水位不斷上升而加高。每逢洪水，中央政府就採取北保漢江，南棄荊湖的戰



日趨萎縮的湖泊令人心碎。

略，久而久之，洞庭湖淤積程度大大加快，湖面已高於江漢平原。八百里洞庭已成爲「懸湖」。一旦湖北荆江大堤發生不測，洞庭湖將會北移，由湖南傾向湖北，那時給江漢平原帶來的將是滅頂之災。

自鄱陽湖取洞庭代之，成爲中國第一大湖後，同樣也染上了「洞庭病」。在近三十年中，鄱陽湖在自然淤積和人類的圍墾中縮小了四分之一。而號稱千湖之省的湖北省，在此期間，有近千個湖泊被從地圖上抹掉了。

向西北望去，湖泊的命運更是朝不保夕。那裡的威脅不是來自淤積，而是來自乾涸。

新疆塔里木，每年降雨量不到四十毫米，而蒸發量却達二千五百毫米。在這日曠一日的蒸發中，羅布泊乾涸了。這是一個迷一樣的湖，數百年間，它隨着孔雀河的改道不斷地移位，在塔里木盆地的東緣漂泊不定。可是隨着軍壘建設兵團的墾荒，孔雀河變得更加捉摸不定，羅布泊最終消失在湛藍的晴空中。

博斯騰湖曾是西北最大的淡水內陸湖，可是隨着近年的植被破壞，水源枯竭。從八〇年代起，它已變成鹹水湖。這一危機的信號表明，終有一天，它也會像羅布泊一樣消失在穹空中。

不祥的陰雲同樣籠罩着青海湖，這個曾經納百川的鹹水湖現在只剩下三十幾條源流了。柴達木盆地的沙漠化使這裡的降雨和蒸發之間的反差日益增大，以致湖面水位每年以十一厘米的速率下降。一九八八年青海湖中的鳥島已成爲半島。據專家推算，二百年後，青海湖也將走向羅布泊的歸宿。

氣吞山河的風沙



最後一道綠色防線。

一九七五年春，青海省共和縣，十級以上的大風沙刮了四天四夜。整個方圓數百里天昏地暗，飛砂走石，房屋被埋掉了，莊稼被連根拔起，牛羊被一群群地捲到百里以外的黃河中去。一個五千多人口的沙珠玉鄉，幾乎被夷爲平地，從地圖上抹掉。

四十年前，沙珠玉還是一個方圓五十里的大草原。那裡也曾有過水草豐盛，牛羊成群的盛世。災難始於五十年代的大生產運動，大批居民湧入，種糧挖地，放牧割草，剩下的灌木簇被鏟掉燒飯取暖。年復一年，人們親手揭掉了鎖住地下黃龍的植被，釋放了埋在地下下的惡魔，其結果他們自己被埋到了地下。蒼天有眼，誰說這世界上沒有報應？

中國有一條萬里長城，也有一條萬里風沙綫。這條風沙綫橫貫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陝西、山西、內蒙、河北、遼寧，長五千公

里，寬五百公里。猶如一條黃龍，虎視眈眈地威逼着新疆的綠洲、青海高原、河西走廊、河套灌區、華北平原、內蒙牧場，以及東北糧倉。

自有人類以來，在這條風沙綫上，黃龍和青龍的絞殺就開始了，這場博鬥持續了幾千年。黃退青進，顯示了人類的勝利，黃進青退，說明了人類的潰敗。大漠深處的殘牆斷垣，忠實地記錄了人類得而復失的悲歡。

在安西縣城西南的大漠深處，有一座被黃沙埋滅的歷史名城——鎮陽關。薛仁貴西征時，曾在鎮陽關下與哈密國元帥蘇寶同對峙十二年。當時疏勒河從城下流過，灌溉着五十萬畝良田。這裡曾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途。人口稠密的重鎮，也是兵家必爭之地。幾十萬大軍在此對壘十二年，可見糧草充沛。然而隨着疏勒上游的水土流失，河道移位，風沙最終吞滅了這邊關重鎮。今天，古城的殘壁僵臥在乾涸的疏勒河邊，像一座無聲的墳墓，向遊人訴說西部衰落的歷史和現實；在屯墾戍邊之後，在持久地毀林毀草之後，河水乾涸，沙漠湧來，最後人類倉皇而逃。

三十年前，當「向大自然進軍」的號角吹響之後，人退沙進的敗局就大勢已定了。那條萬里黃龍在近年來突然顯得咄咄逼人，氣吞山河，以每年一千五百平方公里的速度南下東進，吞食農田和草場。

一九四九年，我國的沙漠化土地為十億畝，而今天已達二十億畝，整個翻了一番。在這擴大的十億畝中，原來的草場為七點七億畝，耕地為二億畝。現在，沙漠的熱浪仍在逼近，又有一億畝耕地，和全國三分之一的草場在黃龍的巨爪下呻吟了。

八〇年代以來，中國沙化土地已達一百萬

平方公里以上，佔整個國土的九分之一。同時，還在以每年一千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張，其速率為世界之冠。

西北，在這片大漠邊緣的二百個縣，在風沙的肆虐中掙扎。八級以上的大風，每年都要刮一兩個月。大風吹走了耕地的土層，黃土高原每年這樣土層流失的面積達二十八萬平方公里，以致三千萬人無地可耕，食不果腹，每年靠政府的救濟糧過活。

風沙不僅吞噬着耕地、牧場，同時也威脅着城市。

首都北京，早已有「沙都」之稱。你見過「首都奇觀」嗎？每年春季，六級大風帶着張家口壩上的黃沙撲向北京，天變成黃的，太陽變成綠的，十步以外不見人影。每當風沙襲來，全城交通癱瘓，學校停課，工廠停工。這座八百萬人口的城市在風沙中嗚咽。據統計，每年飛進北京城的黃沙有一百萬噸！專家們驚呼，隨着永定河的乾涸，地下水的枯竭，五十年後，北京將重蹈鎮陽關的覆轍。

沙臨城下的不僅僅是北京，承德、張家口、大同、包頭、銀川、西寧、西安、蘭州……都面臨着風沙的威脅。巍峨長城，高樓大廈，解放軍的坦克，都無力挽滅頂之災。除了綠色，什麼也擋不住大漠的南下。

萬里風沙綫，劃去了中國百分之四十五的領土。這是不折不扣的「半壁河山」。

垂死的海

大陸已經千瘡百孔，那麼大海呢？

中國有一萬八千公里的海岸綫，曾有着豐富的水產資源。東海的舟山群島是世界聞名的漁場，在世界市場上，同樣規格的對蝦和黃魚

，日本和朝鮮產的就沒有舟山產的價格高。然而，自五十年代末以來，中國沿海的漁業資源慘遭滅頂，舟山漁場的三大魚類：大黃魚、小黃魚、帶魚幾乎全軍覆沒。

大黃魚是舟山群島的家魚，每年農曆四月，從外海游回老家產卵，過了端午便覓食回游。每年四月中的漁汛，是整個舟山最輝煌的日子。

然而，今天，這一輝煌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大黃魚已面臨滅絕，四月的漁汛，已成爲歷史。

大躍進時代，不堪回首。那時各行業都要放衛星，漁業也不例外。山東、江蘇、福建、廣東，各路諸侯會戰舟山。福建漁民發明了「先進」的捕大黃魚的辦法，船頭擺鼓，萬鼓齊擂。黃魚兩耳有石，聽聲就炸。大鼓敲得海面白花花一片，大魚小魚全部攤屍。大魚撈出，小魚喂了鯊魚。幾經會戰，衛星放了不少，的確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可大黃魚幾乎斷子絕孫。從此四月魚汛，不見大黃魚踪影。

可是人們仍不罷休。以往漁汛被嘲爲守株待兔，七十年代又把漁汛提前到冬天，主動出擊。憑着先進的科學儀器，在長江口外的大沙、沙灣漁場找到大黃魚越冬的老巢，又是一場慘不忍睹的圍剿，大黃魚終於被一網打盡，在它的家鄉休想復興。

小黃魚的命運同樣悲慘。五八年會戰，反復掃蕩，小黃魚已所剩無幾。五九年又組織兩千多條船越省北上，直搗小黃魚產卵育幼的老家江蘇呂泗漁場，於是捷報頻傳。六十年又繼續北上，乘勝追擊，直到小黃魚被斬草除根。到了七十年代，小黃魚在呂泗漁場絕迹。八十年代，政府強令呂泗漁場休漁三年，不見效果，再休三年，還是不見轉機，於是從一九八七

年起，再休五年。當地老漁民提起當年追殺小黃魚的場面，痛不欲聲。

大黃魚亡了，小黃魚亡了，現在只剩下帶魚。帶魚之所以倖存，是因為舟山的漁民過去沒有捕帶魚的習慣。現在，當帶魚成爲唯一的產值來源時，厄運又降臨了。

帶魚是中國沿海最大魚種，四季產卵，儲量每年六十萬噸。可是只要你見過捕撈帶魚的陣容，就會不寒而慄。每年十月，舟山沈家門港，萬檣雲集，十里船隊，船燈映得大海如同白晝。前方是五省二市的船隊會戰追殺，後方是六萬個樁頭張網收捕，前後夾擊，捕撈能力爲儲量的五倍。帶魚的末日，指日可待！

一九八八年五月，蝦峙區漁業公司船隊在舟山外島海區撈上一網銀光閃閃，長二十公分，重十公克左右的小帶魚。所有的人都覺奇怪，外海那來的小帶魚？而帶魚苗又不對體形，其中相當多體胖，腹中有孕。後經專家分析，這是帶魚爲求生存，避免絕種的早婚者。這批「小孕婦」無力游到近海產卵，只能就地分娩。在水溫、潮汐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卵化成活率極低。

貪婪的人類，聽見帶魚的哭訴了嗎？中國的漁業資源在萎縮。可是魚類的價格在上升，現在的漁民都紅了眼了。有得撈趕緊撈，過幾年政策一變，還不定怎樣呢！

一九七九年，魚類專家費鴻年聯名十四人上書政府，提出保護漁業資源的緊急建議。可是十年過去了，渤海完了，黃海敗了，東海垂危，現只剩下南海，這份家業，還能敗多少年？

×
×
×
×

望着那乾渴的土地，褪去的綠色，暴虐的江河，流失的國土，萎縮的湖泊，垂死的大海和那氣吞山河的風沙，所有的人都曾爲我們這一個民族，「球籍」而捏一把汗。這麼多年，中國人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國來國去，鬥爭不息，可是最後他們發現，最大的敵人竟是



遠方，一片混黃的荒野。

他們自己。敗掉這份家業的不是帝國主義，不是修正主義，也不是地富反壞右，而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

最後的審判正在逼近。

恐怕還來不及等到子孫的審判，大自然的審判就要降臨了。

敬 啓 讀 者

改地址的讀者訂戶請注意：

更改地址，請務必將新舊地址一併寄至中國之春雜誌社，才能將舊地址取消而列上新地址。如只有新地址，沒有舊地址，本刊發行組無法作業，敬請合作。

中國之春的訂戶請注意：

中國之春雜誌社已和中國民聯總部分開，前者電話為(718)429-6777，FAX為(718)476-1602；後者電話為(718)507-4739。望聯繫者注意。

加拿大及全部海外訂戶請注意：

除了美國本土之訂戶，不需另付郵資外，其餘各國、各地區均需付寄郵資。敬請合作。

中國之春雜誌社

半邊天仍然暗淡

大陸的婦女拐賣

莫利人

八月下旬到達北京的「台灣教授大陸訪問團」除了向中共接待單位表示對學運領袖王丹和最近「安返」居所的候德健的關懷外，據報導，他們也表示台灣方面對因販賣人口而被中共逮捕的高雄籍男子顏清柱、莊龍治的真情實況和下落十分關切。

顏莊兩位同胞莫非吃了豹子膽，居然將販賣人口的生意做到「社會主義天堂」上去了？瞭解大陸買賣婦女行情的觀察家會說，販賣女人雖然是包括中國在內，世界上古已有的行當，但在大陸却是於今為烈的。這可以算作鄧小平在解決「先富起來」然而仍找不到老婆，只好去買的餓夫的性慾問題的德政？！至於毛澤東所謂的「半邊天」的狀況為何在鄧小平當政的這些年仍然如此黯淡？大概女人這碼事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優越的堅持範圍內吧！

猖獗活動與年俱增

一九八五年，中共婦聯曾發出「救救婦女」的呼號，然而這四年來，整個大陸買賣女人的活動是越加猖獗，請看如下零星的、可是十分有代表性的東西南北中統計：

山東省：近幾年聊城縣內買來的媳婦有三千多名；

江蘇省：八六年以來，被人販子拐賣到徐州所屬六個縣的婦女共有四千八百零十名；

四川省：中江縣一九八五年被拐賣的婦女一百三十一名，一九八六年增加到三百廿三名；

貴州省：安順市從八六年四月至八七年二月，市檢察院收到拐賣婦女控告信八十七件；

廣西壯族自治區：僅羅城、三江等六縣不完全统计，近幾年有一百八十多名婦女被拐賣；

湖北省：鄂西自治州的利川謀道區，八五年冬至八六年春有卅四名婦女被拐賣。據已破獲的以襄樊市火車站為作案地點的拐賣婦女團夥交待，從八六年至八七年四月他們拐賣婦女一百卅二名。鄖陽地區共有五百五十名婦女被拐賣；

湖南省：洞口縣近幾年有三百五十五名婦女被拐賣；萊陽市先後有八百九十九名婦女被拐賣。

賣良為妻價格不菲

中國舊小說中，港台現實生活中，多有一「迫良為娼」的罪惡活動，但「買良為妻」則要數大陸一枝獨秀，其間的分別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吧！且看買賣婦女的行價和各地買媳婦

的花樣：

湖南省：婦女價格從八百至二千元上升到三千元至四千元。

山東省：八〇年莘縣農民買媳婦花款五十二萬元。八六年，由於女人的賣價普遍上漲二至三倍，全縣農民花買媳婦款高達一百零三萬元。塞北農村一個十萬人口的縣，八二年以來，農民買進七百多名外地婦女。臨清市人販子王明健，一年內拐賣婦女廿八人，得贓款三萬多元。莘縣人販子戴學濂一年內拐賣婦女十六人；

四川省：樂山市的李安福七個月就做好了三十筆拐賣婦女的生意，他賺了多少錢至今未能查清；

江蘇省：徐州市由四十三名犯罪份子組成的拐賣婦女的團伙，在火車站廣場拐騙，劫持了來自雲南、四川、貴州等地的一百零一名婦女，以一千八百元至三千六百元的價格賣與附近縣屬下的鄉鎮，從八七年八月至八八年一月，獲取了十三萬六千七百餘元。

據報導，當前大陸北方農村青年平均消費為六千至八千元以上，而買一個女人只需二千至四千元。牛滿江，這個年近卅歲的漢子，在責任田裡辛辛苦苦幹了好幾年，好不容易攢下六千元，該娶媳婦了，可媒人介紹的姑娘彩禮



太高，要六千多元，他從人販子哪裡以二千五百元買了一個四川妹子，還省下一筆婚禮的費用。牛滿江高興得連聲說：「合算！合算！」

暴力折磨，女人變貨

中共堅持專政在大陸實施多年的所謂社會主義，由於近年的開放，出現了「商品經濟」，於是，「人口販子」中，把婦女和兒童也視為商品。在這裡政治加經濟的雙重作用下，女人要麼生活在苦難之中，要麼活在罪惡之下。在大陸現今的文明裡，雖說沒有奴隸制度，但在中共的道德和習俗等文化「軟體」裡，奴隸制度依然存在。這些被買賣的女人，她們正蒙受整個人類，整個社會，整個時代的苦難。在八十年代的今天，誰勇敢反抗，同樣將遭到活活吊打、割斷腳筋。抗拒強姦的被活活輪姦，有的長期被監禁，有的三番五次被轉賣。在那地獄的黑暗之中只能睜着絕望的雙眼、號泣，那些屈辱和憤恨。以下是大陸婦女在中共的社會主義制度下被拐賣的案例。

四川某縣一個十四歲的女孩上街為生病的父親買肉，被三個男人用匕首威脅着到了內蒙，以二千七百元將她賣給一個農民。湖北襄樊火車站，在派出所門前，三個人販子公然把兩個女青年綁架到千里之外，以三千元的價格賣給山東濟寧的二道販子。四川三台縣禾加鄉一女青年，在看完電影回家的路上，被兩名罪犯攔截，用手帕堵住嘴，劫持到山東陽谷縣賣掉。一個帶着孩子的婦女在旅館裡被五個人販子用匕首威脅着，將她賣給了幾百里外一個剛死了老婆的農民。兩位湖北少女被人販子麻醉後裝在麻袋裡，販賣到千里之外的安徽省。一個十六歲的少女，被一個拿電警棍的人販子從雲

南脅迫到江蘇，賣了三千元……

逃脫包辦，慘遇人販

「藍花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竟然落到這樣的下場：被捆得結結實實，嘴裡塞了一只臭襪子。她被幾個男人抬着扔進這黑屋子。當初，她是出來逃婚的，後來加入了修鞋的行列，在遊蕩中結識了一個人販子。人販子喝得醉薰薰之時，下流話下流動作一起用上了，她被糟蹋了。次日，人販子將她以三千二百元倒賣給一個農民。」

「川妹子從小被捆在家鄉的土地上，當父母要用她來換彩禮時，她逃到了勞務市場，企圖借助商品經濟力量得到人身的自由。沒想到輕信了一名人販子的話，她被賣給了山東的一個農民。他們怕她逃跑，把她鎖在屋子裡，窗戶釘上鐵欄杆，從門縫裡遞食物給她，晚上忍受那男人的蹂躪，直到她生了孩子……。」

屈從命運，麻醉幸福

「淑芳才二十歲，已經顯得過於蒼老了，她說：「什麼叫幸福，幸福不過是一種欺騙而已。」她原本是一個城市郊區的學生，因為迫切想成爲一個電影明星，而被冒充導演的人販子賣給了一個農民。那男人脅迫她上床時說：「你別做夢了，哪有那麼多明星讓你當？今晚你要是不從，明天我就將你賣給村裡那個五十歲瞎眼、腐腿的老光棍。」淑芳害怕地答應了他全部的要求，她腦子裡一片空白。她想到，村裡有多少被拐賣來的婦女，不會運用這「痛苦式的麻木」而被打得死去活來，有的甚至「減價處理」——第二次被賣。逐漸地淑芳感受到

了屈從於命運的「幸福」。

以上僅是在大陸報刊零星報導的案例，有沒有轟動海內外的拐賣婦女的案例呢？有，事情發生在一九八八年。

愚昧橫行，文明遭殃

一個沒有文化，自稱叫李敏的鄉下小姑娘，在一間旅館裡偶然相識了一名上海某大學的研究生，李敏的招數是：「跟我跑一趟，提點貨，只半響時間，就能分你二百元。」女研究生顧不得知識份子的清高，笑着答應了。

李敏將她賣給了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女研究生與外界隔絕了整整三個月，過的是最原始的「吃」加「上床」的日子。「愚昧拐賣了文明」是這個案子轟動海內外的主因。

生意通海，登陸台灣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晚，福建省安溪縣本門鄉山美村的十八歲少女施錦芬，竟然出現在台北，她奔進警寧夏分局民族路派出所，以清晰的口氣說：「我是大陸來的，被人強迫在華西街接客，快快救救我吧！」當時，在台北民族路派出所值班的主管嚇了一跳。

據施錦芬交代，她是在廈門汽車上碰到一個在建築公司做事的林福利。林告訴她，可以到台灣受訓，一個月後可以回到大陸，在一家中外合資的電子公司當領班。施錦芬爲了一個「錢」字，和另外十三個大陸妹，分別從福建的晉江、廈門、浦城、建陽等地，於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晚上在泉州集合，二十七日她們在臺灣上了岸。

上岸後，第三次換船時，覺得情況不妙，

但已容不得她們抗議了，那個在船上接待她們的台胞「阿富」，惡狠狠地告訴她們，「我花了七萬美金買你們，你們一個也別想跑。」自七月一日起，施錦芬和其中九名大陸妹在台北華西街接客，每天從下午二點上班，到清晨四五點，每天需接客十次以上。

海峽兩岸的賣春集團，究竟讓多少愚昧的大陸妹為找天堂而落入皮肉地獄？難道僅僅只有施錦芬和她同時上船的那幾位福建小妹嗎？有人願買，捨得出大價，就有人願從事這罪惡的勾當。

婦女成貨，原因種種

中國的西部尚未開發，而沿海經濟仍處於「手工作坊」式的前工業革命的狀態。一個偏遠的小山村，一共不到三十戶人家，却有四十六個老光棍。長夜漫漫，他們為了得到一個傳統接代的生育工具，為了滿足最基本的性慾，慣於節儉的他們，是捨得花錢從人販子手中買一個活生生的屬於他們自己的女人。「還有什麼生意能比買賣女人更賺錢呢？彩電、冰箱、鋼材、汽車，任何緊俏商品都不如女人價值高」，一個罪大惡極的人販子自鳴得意地說。

據統計，大陸上的人販子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曾經有過商業經營或手工業生產的經歷。一個精明的中年人，當商品經濟浪潮湧來之後，他率先搞起家庭食品加工，帶動全村人富起來，但長期靠小本經營積累資本，緩慢、艱難，他發現販賣女人錢賺得多，賺得快，他就把女人也納入了商品經濟的範疇。他把婦女從雲、貴、川販到冀、魯、豫。有人控告他拐賣婦女時，全村人為他作證，說他是長線紅娘，因為他賣給那些光棍的女人比彩禮要便宜

得多。那些被拐賣的女人因為這個地方比她們的故鄉生活好，也都一口咬定是自願嫁過來的，使法院根本無法斷定他是人口販子還是長線紅娘。

權力支持，罪惡橫行

在「權力支持罪惡」下，大陸的人口市場上五花八門的「合同書」、「保證書」如雪花般到處亂飄。農民楊懷義願把閻麗麗賣給韓長干，現金三百二十元，閻本人也同意跟着韓長干。在當事人按手印的紙上，赫然蓋着一枚大紅印章：「村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為何參與這種古老的罪惡？這個叫閻麗麗的女人本是被別人賣給楊懷義的，因她死活不與楊同房，楊將她賣了。

八十年代的大陸人販子，當明白權力能支持罪惡後，就向權力滲透，搞「販人官倒」。江蘇徐州一個劫持、拐賣了一百零一名婦女的犯罪團伙的頭子韓瑞榮，從一開始就在基層幹部中找他們的代理人。一個李姓村長，四十多歲沒媳婦，韓格外關心他的婚事，送給他一個四川姑娘，收他兩千元，李村長嫌貴退回。半月後，韓又以四百元的低價給他一個女人，村長和她同居了一個月以後，原價賣給了一個農民。過了半年，韓第三次給村長送了一個年輕漂亮的二十四歲的姑娘，村長滿意的笑了，付了二千元，留下那姑娘做了自己的老婆。

以做小買賣出身的韓瑞榮十分清楚，在大陸，無論經營什麼，都必需依靠「土皇帝」的支持。由於有了靠山，韓瑞榮和他的同伙，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將從桐仁縣拐騙來的女青年李小蘭捆綁着穿街走巷公開標價出售，所謂國法黨紀，在人販子和基層共幹勾結下，不值一文，更無所謂尊嚴可言。

官印明擺，選美販賣

大陸人販子們的騙術，比江湖郎中高明得多和「現代化」得多。一個叫楊育華的帶着他的同伙流竄到四川中江縣中興鄉，找到婦聯主任，亮出的是「中央軍事情報局」、「四川省公安局」、「四川省人事局」三張蓋有鮮紅大印的介紹信，讓婦聯主任驚得說不出話來。「我們要在全國偵破一起大的詐騙案，需要一名女青年協助工作，幹得好立功受獎，安排工作。」婦聯主任把全村女青年逐一篩選，最後讓他們選中一個二十一歲的姑娘。姑娘被楊育華賣到內蒙清水縣，楊賺了四千五百元。

從善不易，繼續為惡

當年的西門慶要與縣太爺結合，才能橫行發財。倘若勾搭不上，土財主們會另闢財路。一個入販子辦起了一個小飯店，結果不夠從那些大大小小「衙門」裡出來的食客吃的。「媽的，我弄了半天還是做女人生意保險，賺得也高。」他關上飯店，重新踏上古老的生財之路。三個人販子積蓄了一大筆錢後，想「金盆洗手」，他們計劃合辦一個企業，但遇到第一個難題是申請執照。一個一個「衙門」的叩拜、找關係、送禮，花了三千元，僅僅只填到一張表格。「什麼時候才能批下來？」「別着急，早晚能批。」「唉！算了！算了！他們打消了辦企業的念頭。這說明「改邪歸正」還真難，而幹罪惡的勾當却比幹正當業務容易得多。

古今中外的許多事例表明，法律的制裁是永遠不能從根本上消滅罪惡的。成千上萬的大陸婦女還難以擺脫商品人貨的命運。

被遺忘的軍功

顧曉林

(一)軍功章貶值

一九八九年的深圳，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員辦好了自費留學的手續，赴澳大利亞讀書去了。朋友們在替他收拾屋子時，從一大堆丟棄的雜物中，發現了一枚裝在紅絲絨盒子裡的二等軍功章。

這個軍功章是用鮮血換來的，它的主人在越南戰場上身中三顆子彈不撤離戰場，直戰鬪到失血過多昏迷為止。

何曾幾時，十年前的那場戰爭扣住過多少人的心弦。那時，最大的「明星」是戰鬪英雄，最受歡迎的人是「英雄講用團」。在姑娘們眼裡，最可愛的人是胸前掛着軍功章的軍人。那時的一枚軍功章千金難買，可是今天竟變得一錢不值。傳統價值觀念的貶值，遠遠走在通貨膨脹前面。

當年布滿花圈的烈士陵園，今天墳頭野草叢生。誰知道二十年後人們怎樣評價這場戰爭？

(二)榮軍院的困境

廣州河南榮軍院一間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間裡，默默地住着一位被人們遺忘的對越反擊戰英雄——吳建新。

十年前，吳建新在突擊排衝鋒時被砲彈炸昏。半夜當他醒來時發現周圍一片寂靜，戰友們以為他死了。用一塊布蓋住他就衝向前去了。憑着對生命的渴望，吳建新拖着嵌了十幾塊彈片的身體向北整整爬了三天，最終回到了祖國。

他得到了一枚一等軍功章，但代價是大腦坎進一塊永遠取不出來的彈片，腦神經無法復原。於是住進了榮軍院。

輝煌的榮耀像曇花一現馬上就成爲歷史，十年後的今天，吳建新仍住在那個簡陋不堪的小屋裡，伴隨他的還是一張床，一張桌子和幾個木箱。

一九八五年院方爲他介紹了一個鄉下姑娘，結婚後他們生了個女兒。從此，吳建新就只能不停地寫申請要求一次三十元的補助，理由是千篇一律的：妻子臨時工，工作辛苦，無法照顧孩子……。他的妻子顯然並沒從「英雄的稱號」中得到任何好處。她對所有的人都不隱瞞自己嫁給吳建新的動機：爲了一份城市戶口。

(三)無人接受的「英雄」

另一位不願住進榮軍院的英雄賈雲飛的命運也好不了多少，十年前他是某團警衛員，在一

次戰鬪中被手榴彈炸飛了雙腿。他得了一級軍功章，但從此再也離不開輪椅。

打完仗後，他被升爲排級幹部，退伍到了深圳。他不甘心靠撫恤金活着，況且這點錢早已趕不上飛漲的物價。十年來，他不知找過多少次工作，可是沒有一個單位肯收留他。一家公司的幹部看了他的履歷和軍功章後，對介紹人冷冷地說：「我們很尊敬他，但我們這不是慈善機構」。

直到現在賈雲飛還在靠他的排長工資生活，仍舊沒有找到一家願意接受他的單位，而深圳的物價早已比十年前漲了十倍以上。

(四)敵我待遇的反差

從「解放戰爭」數起，「抗美援朝」、「中印戰爭」、「中蘇邊境戰爭」、「抗美援朝」，直至最近的這次「中越反擊戰」，政府總共發出一百三十七萬枚軍功章。這些軍功章的主人很多散落在北大荒、新疆、海南島，他們的命運並不比吳建新、賈雲飛好多少。

在山東省沂蒙山區一個叫桃莊的山村裡，五保戶孫金水老人在一個四面漏風的土屋裡默默死去。幾乎一個禮拜後他的死訊才被村裡人發現。這是一九八六年的冬天，生產責任制實行的第六個年頭。勞力充足的家庭都發家了，金水老人屬於那「百分之五」的困難戶之一。

孫金水一九四七年參加解放軍時，是全村最引姑娘們注目的小伙子。他在攻打孟良崮的戰鬪中失去了一條腿和一隻眼，全身嵌進了七塊彈片。這一切換來的是二級戰鬪英雄的稱號。沂蒙山區的幾乎每一所小學都聽過他的「戰鬪故事」。如今，受他「英雄主義」教育的新一代成長起來了。他們對於四十年前的那場戰

爭不以爲然，英雄的故事已成爲教科書上的說教，他們更欣賞的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氣量。一九八八年三月，孫金水的死對頭，當地還鄉團的頭子孫臨安從台灣前來探親，被縣委捧爲上賓，盛情難却，他爲桃村捐了一個磨坊。

四十年前那場戰爭埋下了這齣喜劇的伏筆，英雄死在被遺忘的角落，而昔日的敵人衣錦還鄉，受到尊重和歡迎。幸好孫金水老人死在孫臨安還鄉之前，否則他會有什麼感想？他的青春、他的婚姻、他的幸福都被那個二等功葬送了。可是如今，他當年爲之奮鬥的土地何在？他的光榮和驕傲又何在？

(五)英雄末路

八十年代以來，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的師生們已經在心平氣和地討論朝鮮戰爭的得失了。一旦光環消失，戰爭背後一切就暴露無遺了。當年的敵人、美帝國主義，今天成爲中國政府急於結好的國家。人們在嘆息，那是一場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對手，打的一場錯誤的戰爭。而這場戰爭，造成了多少中國家庭的悲劇。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北大荒柳河屯農場的一個土炕上，已經癱瘓八年的三級戰鬥英雄趙忠祥自殺了。當年朝鮮戰爭時，他在雪地裡潛伏了三十多個小時，凍壞了腰和膝。當時憑着年輕，硬是挺過來，恢復了健康。然而，那個病根在潛伏了三十年後突然迸發，從此趙忠祥再也站不起來了。

趙忠祥的女兒，十年前嫁到長春去了，身邊只剩下老伴，形影相依。她不但要侍候他的吃喝拉撒睡，而且還要作爲一個勞力養家糊口。

農場每個月給趙忠祥補助二十五元。隨着時間越拖越長，已沒有人再去回憶他當年的功績，所有的人，包括他的老伴都毫不掩飾把他當作負擔的厭倦。

趙忠祥自殺過兩次，但都被救活了，可是這一次他成功了。這個當年能在雪地裡挺三十多個小時的堅強漢子，今天再也沒有這樣的意志了。

(六)英雄為何而戰

六月四日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裡又多了一批「英雄」。在一百三十七萬多枚軍功章中又多了幾百枚「鎮壓反革命暴亂」的軍功章。鄧小平、楊尚昆等親自出席「烈士」追悼會，

參加「慶功嘉獎大會」。那些「鎮暴英雄」榮耀一時。

吳建新、賈雲飛、孫金水、趙忠祥等也曾有過那樣的榮耀。可是今天榮耀在哪？誰也不知道二十年後人們會怎樣評價那些戰爭，可是誰都可以肯定二十年後人們怎樣評價這場「鎮暴」。

如果說前者的命運僅僅是被歷史所遺忘的話，那麼後者面臨的命運則很可能是被歷史所唾棄了。

人民有時會遺忘一些「軍功」。可是對於「六四」凌晨的「軍功」，他們是不會忘記的。在「反思」成爲時髦的今天，叩心自問吧，「英雄們」，爲誰而戰？

副司令和百萬英鎊

劉子如

您看過著名的匈牙利喜劇電影「百萬英鎊」嗎？現在，我來告訴您一個真實的「百萬英鎊」的故事。這個故事發生在中國。

雲南省某軍分區副司令員參加革命已四十四年。歷經上黨、隴海、淮海等著名戰役。解放戰爭時期他是英雄連的連長，立過三次功，被授予戰鬥英雄的稱號。

一九八五年，全國興起大辦公司之風，軍隊也捲入了「向錢看」的隊伍，雲南省軍區建立了「企業辦」，副司令員被委以重任。他做過幾筆生意，辦了兩個企業。但是不懂經濟的副司令在商場永遠不如在戰場上得心應手。到了一九八八年，他的生意賠了錢，吃了官司，企業也關了門，留下三十萬元的虧損。

正當走頭無路時，一個老朋友向處長登門拜訪，他拿出一張印有英女王頭像的巨額英鎊，向尹副司令道：「請首長幫幫忙，合夥幹個大買賣。賺他個幾十萬，幾百萬。」
真乃峰迴路轉，絕處逢生，尹副司令一口應承。

第二天，他找了一個外貿單位的熟人來驗鈔。那人用放大鏡把那張英鎊票子仔細地研究了一遍後，告訴他：「從文字上看，這是一張英格蘭銀行一九三六年發行的英鎊本票，面額是五十萬元。其餘兩張是附件，說明二十四個月的利息是2%，超過二十四個月後每年獎25%。」

尹副司令聽罷心中暗喜，他回家拿計算器一算，五十萬本金，五十二年時間，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連本帶息共六百二十五萬英鎊，按現市價折人民幣四千多萬元，尹副司令員嚇了一大跳。

幾天後，尹副司令找到了香港某公司駐國內的業務員小任。小任原來是尹副司令一個部下的親戚，後從雲南遷到香港定居，現因業務關係常在港澳之間飛來飛去。小任看了尹副司令手中的百萬英鎊後，覺得大有利可圖，希望帶回香港處理。

可是向處長不同意，他要小任先交一筆押金，才能帶走英鎊鈔票。於是雙方以尹副司令作為中間斡旋人談判。一個月之後，小任從香港飛到昆明，找到尹副司令，拿出了一個方案：可以通過香港滙豐銀行辦理，兌換這張票子，並要請專門律師，飛往英國兌換。這樣就必須帶原件去香港。小任說，在香港他的公司老板和當地金融業專家研究過這個項目，還在飯店請了客，花了不少錢。為了早日成交，他的公司可以先交一萬元港幣為押金，把原幣帶走

。事成之後，港方分成百分之五十五，中方分成百分之四十五。

尹副司令一聽倒是滿口答應，心想，看港方這個勢頭，反應如此之快，而且又花了本錢，又請客吃飯，又比例分成，看來這票子果是真貨。不過他沒有把握向處長是否同意按該比例分成。於是他答應小任和向處長商議後再回覆。

向處長聽到這個分成比例後斷然拒絕。他憤憤地說：「到官方銀行兌我們還能得一半呢，這些香港人真夠貪，給我們我們連一半都得不到，干脆在內地處理算了。」

於是，尹副司令開始四處活動，這張巨額英鎊吸引了開遠、師宋、羅平、文山、興義等地的富豪。一時間，尹副司令家車馬流水，賓客盈門，人們乘汽車、飛機來，電話電報應接不暇。最後，興義市一個巨富願將這「百萬英鎊」買下，作為保值儲蓄。他連發兩封加急電報，尹副司令立即驅車前往興義與買主會面。可是不幸的是他鑽進了公安局的口袋。好在尹副司令戰功卓著，頗有資歷，公安局審查之後，不予刑事追究。若是一般百姓，則難逃法網；如果這張百萬英鎊是真的，那麼可以定罪為逃匯、炒賣外匯、投機倒把；如果是假的，那則是地地道道的詐騙勾當。

公安局對這張英鎊鈔票進行了技術鑑定。從票面規格、線條、圖案、文字、紙質等不同指標與英格蘭銀行發行的真票進行了對比，最後確定這是一張假票。

尹副司令承認自己辦了一件非常窩囊的事，名聲掃地不說，光是四處活動的成本費他就花了上千元。

「百萬英鎊」的喜劇落幕了。如果它拍成電影，絕不比匈牙利的那齣喜劇遜色。

自由的訣竅在於勇敢

—「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啓事」

準備尋求、正在尋求或已經得到美國政府政治庇護的中國人，組織起來！
我們若能發揮更大的力量；我們要幫助自己和一切苦難中的同胞獲得自由；
我們要爭取世界民主人士的關注和支持，就只有組織起來！

在這個協會中，我們將：

- 交流有關政治庇護的經驗；
- 提供政治庇護必要的資料和知識；
- 爭取各界同情人士的聲援；
- 加強與專業律師的接觸和聯繫；
- 動員新聞界的支持和輿論的力量。 翻譯中英文文件。

一年來，本會曾幫助某些人士獲得了政治庇護，我們具有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打算尋求政治庇護的人士，請與我們聯絡，我們將為你提供諮詢服務。
追求自由的大陸人士，請加入我們的組織，團結就是力量，未來將屬於勇敢而自由的靈魂！

通訊處 76-11 Roosevelt Ave. Box 162 聯繫人：王恩國(會長) 葉常華(理事)
Jackson Heights NY 11372 朱永祥(理事) 李連維(理事)
TEL: (718)507-4739 劉翔(理事) 閻仙儀 理事





南韓學生、民衆與軍警發生衝突。

南韓民主運動的經驗教訓

越人 譚夏

南朝鮮的社會發展模式一直對中國人有極大的吸引力。首先，作為號稱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南朝鮮，其經濟勢頭發展之猛、持續時間之長直令其左鄰右舍瞠目結舌，作為其經濟支柱的外貿真正進入了「國際大循環」、「大進大出」，而且產品也在急劇地更新換代，由傳統的輕工產品發展到迅速崛起的電子電訊產品和汽車出口業。其次，如何在亞洲的傳統政治模式中實現經濟的現代化，更是中國的執政者夢寐以求，「摸着石頭過河」想尋找的途徑。第三，南朝鮮近年來風起雲湧的在野黨的興起，以及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頻頻成爲世界新聞關注的焦點，也引起中國民運對其原因、作用及前景的關注。

李承晚與南朝鮮的立國

(一九四八—六〇)

像傳統的亞洲型政治領袖一樣，李承晚也是一個極權型的政治領袖。他在青年時代因抗日而受到迫害，流亡美國達三十年之久，曾獲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在二戰期間與美國政界頗爲熟識，曾遊說美國制定對朝政策。二次大戰後，金日成從蘇聯回到北朝鮮，而李承

晚則以美國爲後盾回到南朝鮮。在美國佔領的局勢下，作為流亡政治領袖的李承晚很快就在一九四八年第一次大選中攫取了權力。當時在南朝鮮政壇上還有從中國重慶回去的流亡政治領袖金九，此人是個極右派，在政治立場上與李並無原則分歧，而在抗日之功上還略勝李承晚一籌，是構成李政壇霸主地位的嚴重障礙。作爲總統候選人，他在一九五〇年第二次大選前被神秘地暗殺了，一般認爲此件陰謀是在李的策劃和默許下進行的。這雖然使李承晚在一九五〇年五月順利地連任總統，但也使其在國會中的信任度一落千丈，只是因爲六月爆發的朝鮮戰爭，才使其政治生涯得以繼續。容忍政敵和公平競爭本來是民主的基本原則。李承晚對這一原則的踐踏爲此後南朝鮮的政權更迭中一再出現的陰謀和政變開創了先例。

盡管如此，南朝鮮在開國之初還是制訂了一部西方式的憲法，要點是實行普選制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包括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而李承晚的政治實踐却依然承襲着權大於法的亞洲政治模式。其操縱和架空憲法的手段是在亞洲政治中極爲典型和屢見不鮮的。

首先是以法律的形式羅織一些含意不清難以定義的罪名，以此對付和迫害任何政敵和持

不同政見者。早在一九四八年，李承晚在鎮壓了麗順暴動之後，制訂了「國家安全法」，以「擾亂國家安定」這一無所不包的罪名逮捕了九萬人，並規定憲法中規定的公民權力必須服從具體法規。而具體法規的細目則把憲法捆死釘死。這又與朝鮮南北分裂的局勢有關，像台灣的實行了數十年之久的「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一樣，外在的敵對勢力被國內獨裁作為最好的藉口，甚至當局勢緩和時，南朝鮮當局也要製造些北朝鮮間諜案，來維持這一藉口。這實在與中共當年的「階級鬥爭」和如今的「台灣特務」、「國外反動勢力」有異曲同工之妙。

其次是操縱和控制國會議員，有持不同政見者，則橫加迫害。有時是在槍口下投票，有時將投反對票的議員投入監獄。一九五二年，當國會投票通過取消戒嚴令時，軍事警察包圍了國會大廈，逮捕了數十名議員，隨後又在六月三日把此前缺席抗議的議員綁架到國會大廈，連同被逮捕的議員一起，在憲兵的包圍脅迫下，強制立法機關通過了李承晚的憲法修正案。在這次天安門事件中，立法機關對鄧李楊暴行的無能為力，也與南朝鮮缺少制衡的權力結構極為相似。

最後是肆意修改憲法。李已預感到不能在國會中得到多數支持，則把憲法中由國會選舉總統改為全民選舉，利用不知真相的群眾的錯覺，來改變頹勢。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只不過在大得多的規模上重復了這個權術模式。

儘管這部憲法在李承晚時期沒有任何實踐的可能，但還是規定了其政權的合法性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形式上。換句話說，反對派依然可以用這部憲法來反對他，可以爭取民主運動的合法性。特別是國際大環境趨向於緩和，意識形態衝突和軍事對峙緩解的情況下，民主運動

的高漲便成爲不可遏制的歷史潮流。如果說南朝鮮還是個在形式上民主的憲法掩蓋下的專制的政體的話，那麼中共則在憲法形式上和政治實踐上都是專制的。四項基本原則從根本上取消了憲法所應具有的超乎黨派利益之上的權威性和規則性，成爲一黨專制的理論工具。換句話說，中國的民主運動不可在現有憲法的框架中展開，只能以體制內改革的形式出現。

四月學生革命（一九六〇）

李承晚一九四八年上台，到一九六〇下台，執政十二年，政治經濟上一無建樹。他在政治上極端個人獨裁，以「大眾意願」的名義迫害政敵，其名目有「個人野心」、「人民權力的篡奪者」、「不服從整體利益者」，當然，還有「親共份子」這個名目殿後。由於政治上危機重重，李承晚完全忽視了國家經濟的發展，造成了人民普遍的不滿情緒。

一九六〇年四月，李承晚又在選舉中作弊，南朝鮮大學生率先走向街頭，喊出了「不民主毋寧死」、「李承晚下台」、「懲治貪官污吏」等口號。十九日，所有的漢城大學生在國會大廈前集會，然後向李承晚官邸遊行。在接近景武台總統府時，遭到武裝警察的開槍鎮壓，當場打死一百多名學生。李承晚宣佈實行戒嚴，而學生繼續走向街頭，這時，大學教授們挺身而出，支持學生，市民也加入了街頭遊行的行列。被派來執行戒嚴令的士兵，拒絕執行開槍的命令，在人民的力量面前，軍官也改持中立態度。在某種程度上，這場民運的聲勢、氣氛都和北京在宣佈戒嚴令後市民傾城出動攔截軍車時的情形相類似。

在這種突如其來的民主風景下，執政的自

由黨新當選不久的副總裁帶領全家自殺，李承晚本人則逃往夏威夷。二十六年之後，菲律賓總統馬科斯也是在軍隊陣前倒戈的情況下倉惶逃往夏威夷。這次被稱作「四月學生革命」的民主運動，開創了一個以和平方式和大眾參與推翻獨裁專制的先例。這種並非通過政黨組織的自發的民主革命竟能成功，在世界史上是罕見的。而在此格局下開始的民主實驗將會出現什麼樣的後果也是引人深思的。

短命的第二共和

（一九六〇·五一—一九六一·五）

李承晚倒台之後建立了一個西方式的多元政治的民主政體，稱爲第二共和國。一時間各種政治黨派紛紛湧現，包括極右派和極左派，其政見水火不相容。新聞完全開放，第一次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歧見紛出，沒有任何主導輿論。學生運動則繼續連綿不絕，要求不斷升級，強烈主張立即懲罰李承晚政府的貪官污吏。一九六〇年十月，迫不及待的學生衝進國會，強迫通過了一項有追溯效力的懲罰前李承晚政府成員的法案。學生運動一直持續到當年的十一月。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威信和效率不斷遭到損害，社會秩序的混亂使人們開始懷疑政府維持法律和秩序的能力。輿論開放則使習慣於單一政治模式的大眾無所適從。而新執政的民主黨在上台後內部的爭權奪利也增加了普遍的惶恐和不安。這時，一場軍事政變結束了剛剛起步的民主進程，不但四月革命以來的所有的民主成果頓時喪失殆盡，新的軍事政權的專制程度也更甚於前。包括學生在內的大多數民衆都無可奈何地接受了這個現實。

這裡我們不禁要提出一個關於「早產」民主的生存性問題。我們不禁要設問，如果鄧小平下台，中國民主的前途如何？這一由於橫遭鎮壓而無法用史實回答的問題，也許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南朝鮮第二共和民主失敗的原因，來尋找邏輯上的答案。

第一、南朝鮮四月學生革命的成功，並非真正出於人民大眾對於民主原則的信奉和實踐的追求，而僅僅是對李承晚政權的殘暴腐敗和墮落的消極否定。換句話說，人民大眾雖然不清楚他們要什麼，却知道他們不要什麼。就像中國學生在回答「民主是什麼」的問題時所說：「我們不知道什麼是民主，而我們知道專制是什麼」。這樣，在「破」的階段大家容易取得共識並形成強大的勢能，而一旦對立面倒台後，就喪失了在打倒專制過程中團結民主運動的各種不同政治力量的集結形式。民主陣營的分裂和習慣於專制政治文化的大眾一時間的不知所措就在所難免。

第二、南朝鮮民主黨的新政府未能有效地建立社會的安定和秩序，而這正是傳統上老百姓對政府的基本期望。伴隨民主而來的無序性，特別是民主在其開創時期所帶來的混亂，也對一個衣食不同的社會的承受能力帶來挑戰。而社會上極端對立的意識形態和尖銳衝突的利益集團也使一個奉行多元政治的溫和政府無法駕馭，甚至難以生存。

第三、即使民主政府能在政治上鞏固秩序，也不可能短時間內解決經濟困難，一般來說，在瀕於崩潰的經濟環境下掌權的獨裁政府最容易倒台，而一旦政權易手，相同的經濟狀況又馬上變成新政府的包袱。解脫經濟困境的能力就成為新政府生死攸關的因素。經濟的發展需要時間，一兩年之內很難出現經濟截然改

觀的奇蹟來滿足大眾改善生活的希望。

第四、整個社會對於維護民主政府的合法性和保障公民權力的必要性缺乏共識。政治中的公開競爭也尚未成為公認的價值。也就是說，人民大眾還沒有認識到民主的形式的重要性，在權衡民主與秩序，自由與利益時，由於後者的急迫性，而在不自覺與不得已之下犧牲了民主與自由。我們不禁要問，在歷史發展的規律中，民衆的需求是否必然有一種先經濟發展而後政治民主的次序？而其在不發達國家的民主進程中所造成的障礙，又如何能夠避免和克服呢？

南朝鮮這個短暫的民主實驗期之所以對我們極有教育意義，是因為它揭示了在中國的主進程中無法迴避的困難。所以我們在本節開頭用了「早產」民主一詞來作比喻。這些困難被中外所有的獨裁政權一再重復，作為民主進程不易操之過急的理由，實質上是不許有任何實質性的改革；這些困難也被國外的觀察家所一再強調，作為其維持與獨裁政府的正常關係和對民運只能進行有限支持的論據；這些困難也在有民主意識的知識份子和民運參加者中反復討論，或者作為不能無為妄動，徒勞無功的藉口，或者作為不能對傳統的獨裁政治國家的民主前景抱有太樂觀預期的原因。總而言之，我們可以把這些困難之處概括為一，替代力量的不成熟；二，社會缺乏對民主帶來的短期混亂的承受能力；三，大眾缺乏民主共識，政治勢力間意識形態的尖銳對立使他們難以遵守民主程序。

首先我們談替代力量問題。從取得政權的途徑看，南朝鮮第二共和政府是靠選舉上台的，與李承晚以軍人、警察為後盾的權力結構很不一樣。這樣，民主政府就必須容忍政治上反

對勢力的存在，這是其作為一個主張多元化的民主政府的合法性的前提。在中國人談「替代力量」，總是以中國共產黨替代國民黨為模式的，這在反對勢力的集結形式和反對黨上台後，對前執政黨的關係政策和處理方法上，都與民主力量替代獨裁政府的模式不一樣。共產黨替代國民黨，其奪權過程和掌權後的政策都可以消滅國民黨為基本手段鞏固其統治，而民主力量，不論是南朝鮮在第二共和時期還是從理論上當中國民主力量取代共產黨時，都必須容忍政敵。換句話說，獨裁黨派不必顧及對方的意願，即能鞏固統治，民主黨派則必須以反對黨遵守民主程序為前提，才能維持統治。這一狀況，在民主初創的時期尤為駭峻。此外，民主力量在獨裁統治下很難集結力量，如中國共產黨，把一切反對組織掃蕩殆盡，而反之，民主政權在開創初期則很容易受到獨裁勢力的威脅。南朝鮮的民主實踐很快又被軍人獨裁推翻就是例證，以行之有效的戰略在獨裁統治下集結民主力量，並找到恰當的組織形式，是目前當務之急。以民主的形式，即非暴力的，選舉的形式在獨裁政體下參政並在執政後繼續以民主的形式來防止獨裁勢力顛覆的威脅，更是第三世界民主運動的難題。能否用民主程序來打倒獨裁政體，還是在打倒獨裁政體後再建立民主程序，也是一個只能用具體的歷史實踐才能回答的問題。就中國的具體問題而言，「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學運為避免政府鎮壓而制訂的政策，一方面是為了吸引最廣大人民的參與，一方面是希望政府也遵守這一「遊戲規則」，而在六四大屠殺以後的今天，在人民和軍隊對峙的情況下如何實現這一原則，還有待於我們的探索。

社會的承受能力是與大眾對民主的共識密

切聯繫在一起的。當民主與效率和穩定發生矛盾時，老百姓也就會在民主信念與經濟利益間搖擺不定，而為專制的復辟製造了藉口。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再強調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決定了必須由共產黨領導，雖然他們誰也沒有對此作出說明，然而其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似乎是確信在一個經濟基礎薄弱的大國維持社會秩序的絕對安定是至高無上的原則，而只有中共的專制獨裁才能夠做到這一點。本來，民主是一個過程，像人類個體的發育一樣，有其幼年期和成熟期，不能指望像第二共和時期的南朝鮮和今天的中國，能在民主的實踐方面和西歐北美的民主國家一樣一帆風順，有條不紊。如果指責第三世界國家在民主初創時期的不成熟和混亂，就像要求一個學步的小孩不摔跟頭一樣。民主的新生階段就像一個稚弱的嬰兒一樣，雖然潛藏着巨大的生命力，却需要耐心與照料，需要時間，需要執政者和老百姓都對民主的弱點有所諒解。只有這樣，它才能長大；也只有等民主長大，它才能回報那些照料過它的人。值得自豪的是，八九民運所體現的中國人民的覺悟程度，在示威請願中遵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所表現的高度一致的秩序性，以及民衆的民主要求的強烈程度，已經大大超過了南朝鮮當年的民運水平。

軍政府對民運的鎮壓

(一九六一—六三)

此後的兩年，軍政府一反第二共和時期的統治形式，一方面平息了民運，一方面着手解決經濟困難。其目標與目前中國領導所可望而不可即的要求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一是政治穩定，二是經濟效率，三是道德復興，四是國家

統一。軍政府認為個人自由、人權，和民主競爭都是對這些目標的干擾，而達到這些目標的最有效途徑是建立一個組織嚴密，能進行有效控制的國家。

但是，南朝鮮軍事當局當年所做的事，却遠非中共所能效法，在相同的目標下，中共有着與南朝鮮當年絕不相同的環境。

第一，一九六一年五月，南朝鮮軍事當局以軍事政變結束了第二共和的文官政府，而絕



南韓軍人干政，建立新權威主義。

非像「六四」大屠殺一樣以大規模的血腥鎮壓上台的。此前，早在一九六〇年十月學生衝入國會以後，第二共和政府在維護基本的法律尊嚴和社會秩序方面的能力已經受到普遍的懷疑，學生運動也失去了支持而漸趨沉寂。學生的過激行動實際上是幫了民主政府的倒忙。所以，當軍人發動政變時，除了一些知識份子感到

悲傷外，大部份民衆都默認了這場政變。換句話說，南朝鮮的當年軍事政變，是在人民大眾對民主運動日漸感到失望時發生的，而中國的「六四」屠殺却是在中國民運大有希望的高潮時發生的。所以中共當局不能指望老百姓毫無反抗地接受其暴力統治。

第二，這次政變是由一批少壯派軍官發動的，他們在反對民主派帶來的社會混亂和政府軟弱的同時，也要和前李承晚統治的腐敗劃清界線。為此，他們建立了一個由從政的軍官組成的「民主共和黨」與李承晚的「自由黨」不一樣，不是以效忠個人為基礎，而是強調意識形態的凝聚作用，強調組織紀律性。他們自稱為「現代政黨」，代表着新一代的理想和社會價值，以區別於李承晚的「老黨」。不像中國的政治模式，年輕一代的官僚必須以巴結奉迎「老人幫」為進身之階乃至存身之道，南朝鮮少壯軍人明確地提出了「換代」的問題，並從政治理論上提出了一系列極具鼓動性的口號來贏得民心。其口號有：肅清政壇「老賊」、「再造民魂」、「更新換代」，創造「新的政治氣候」等。他們甚至認為必須從政壇上把老一代政客的「具體存在」徹底鏟除，才能保證「換代」的實現，也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根絕前兩屆政府腐敗和結黨營私的根源。根據這一指導思想，軍政府在一九六二年三月頒佈了「整肅政治活動法」，禁止四、三六九名前兩屆執政黨的政客參與政治的權利。雖然這種一攬子更新的具體措施實際上不可能完全實現，然而少壯派因此在政治上獲得的鎮壓性優勢是無可否認的。靠着仰承鼻息上台的中國第二代政治庸才如李鵬之流，與靠着政變上台的南朝鮮少壯派軍官，在政治朝氣和革除積弊的魄力上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第三，當年南朝鮮軍人政權發生在國際冷戰的環境中，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受到美國的支持。而如今中國對民運的鎮壓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之舉，不僅受到西方民主國家的同聲譴責，而且與蘇聯和東歐各國的改革和緩解潮流背道而馳，所以其在爭取國際經濟援助和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上，都會受到消極的影響。中國在外交與內政上的盾矛，政治與經濟政策之間的內在衝突今後將不可避免並日益激化。

朴正熙時代的經濟起飛

(一九六三—一九七九)

通過兩年的軍事管制期，原來在政壇上默默無聞的朴正熙確立了自己的領袖地位。這似乎暗示着在亞洲政治中多黨制的困難，政治統治似乎自然而地朝着一黨制和個人獨裁轉化。在軍政時期，朴正熙就是「國家建設最高委員會」的主席，在消除了上一代政治勢力對其統治的威脅之後，他決定「選政於民」，一九六三年，通過選舉自己當了總統。

這時，民運形勢通過兩年軍管，基本上穩定了下來。為了防患於未然，他不僅沒有放鬆，甚至還加強了軍管時期對民運的鎮壓。其中最主要的是兩條，消滅學運和控制新聞。在消滅學運方面，朴正熙採用的是在校園裡實行特務統治的辦法。除了安插特務，監視課堂外，還強迫學校行政部門和教職員報告學生動向，絕對不許學生上街遊行，必要時用機槍堵住校門，把學運消滅在校園裡。在控制新聞方面，朴是通過威逼利誘對新聞報社主編人士進行嚴厲控制，使其「自行審查，自行控制」。在此過程中，共有一、一七〇家報紙和出版社被查封。在這種局面下，南朝鮮當局把注意力逐漸

引向經濟方面。

在政變後軍政府實行統治的頭兩年，朴正熙實行了兩條頗有成效的措施，即實行配給制和強迫私人長期儲蓄。這樣立即平穩了物價，緩和了通貨膨脹。

最有趣的是南朝鮮的經濟起飛是在所謂「長期計劃經濟」的理論指導下展開的。為此設立了「經濟計劃部」，存在至今，其權力極大，包括控制外資，即以國家名義向國外貸款，然後分配給私人企業，對出口權的壟斷和控制勞工的工資水平等。南朝鮮政府用憲法的形式規定了國家的經濟生活的干預。但是他這種計劃經濟與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產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的中國經濟還是截然不同的，也不存在大鍋飯的危機。與中國傳統的平均主義不同，南朝鮮的經濟起飛是在分配極不均等的情况下實現的。換句話說，南朝鮮的計劃經濟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而不是極端平均主義的社會主義的。

從六三年到七六年，南朝鮮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為百分之十，其中外貿收入在GNP中所佔的比率從百分之三增長到百分之卅二，失業率從百分之七·八下降到百分之四·五，到六〇年代中期，南朝鮮的工業已經吸收了社會上全部的剩餘勞動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它的擴大再生產的投資始終保持着很高的水平，國內存款額從百分之三·五的年增長率上升到百分之十七·五，每年追加的總投資從百分之十·一，升高到百分之廿五。在此期間，盡管南朝鮮在投資上依賴外資，但外貿收支基本平衡，並在一九七七年第一次開始外貿出超。從此，它在經濟上羽毛已豐，不再依賴美國，而以亞洲小龍的姿態出現在世界經濟舞臺上。

南朝鮮經濟的起飛，在於其成功地保持了一個令外國人放心的安全的投資環境。在發展初期的六〇年代，外資竟佔其年度總投資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直到七〇年代中期，南朝鮮依然被國外投資者認為是第三世界中安全系數最大的儲錢櫃之一。它的政治穩定，固然是其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却是以犧牲民主和犧牲農村發展為代價的。十年之中，聽不到任何知識份子的聲音，農村發展依然停留在小農經濟的水平上。

那麼，人們也許要問，中共能否在戒嚴令下把經濟搞上去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以上那些環境條件遠非中共所能提供。中國的政治穩定不但在經過「六四」鎮壓之後，由於人民與政府的尖銳對立和中共內部的派系之爭而變得非常脆弱，而且經濟的發展也不可避免地造成與僵化意識形態的矛盾，其內在的不穩定因素是不可克服的。公有制下的低效和扯皮也是不可克服的頑症。就目前而言，表面上的平安無事完全取決於那位八十五歲老人的一口遊絲之氣。這些都使得外國投資者望而却步。

十年的生長蕃育，使南朝鮮的經濟面貌一新，一個中產階級也在高壓政治下無聲地崛起。日漸破產的農村使大量農民滲入勞工階級並城市化，他們低廉的勞動力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在這種經濟發展的溫床上，政治自由的要求又一次開始醞釀、復甦。一九七八年以後，勞工運動、學生運動、多黨政治、地方自治、南北統一，風起雲湧，接踵而至，專制腐敗的官僚政治再次受到猛烈的挑戰。南朝鮮的歷史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東歐第一任

非共產黨總理

楊漫克

「團結報」主編出馬做總理

八月十九日，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准將，提名「團結工會」資深顧問，新聞從業者馬佐維奇（MAJOWIECKI），做為波蘭的新總理。他將是戰後四十二年以來，波蘭政府的第一任非共產黨總理，在全球所有共產黨國家中，亦屬首例。

雅魯澤爾斯基在他的聲明中稱：「由馬佐維奇先生組閣的政府，將有助於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繼續改革，並滿足波蘭社會的需要和願望。」



Soft-spoken intellectual: Mazowiecki

波蘭新總理馬佐維斯基

波蘭新總理馬佐維奇現年六十二歲，天主教徒，畢生從事新聞業。自九年前「團結工會」成立以來，他一直是工會領袖瓦里薩的貼身顧問。獲提名後馬佐維奇表示：「我想我會從我們自己身上聚集力量，這不容易。但是當每個人都開始意識到，我們現在正在靠自己時，這表示某種意義和導致某種前景。」

獲得總理提名是「團結工會」一年以來許多政治成功中的最新一役。八一年「團結工會」要求民主選舉時遭波蘭軍隊的鎮壓，轉為非法。爾後直到去年，「團結工會」發動了一次反對經濟惡化的全國大罷工，終於迫使波蘭與工會平等對談，後者始重新獲得合法地位。在今年六月，波蘭國會開放對「團結工會」的限制，工會遂在選舉中擊敗共產黨籍選舉對手，獲得參院一百席中的九九席，成為波蘭議會中最大的黨團，但共產黨與農民黨和民主黨兩個小黨共組的聯盟，仍然控制着半數以上的議席。

七月下旬，波蘭議會選舉總統，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出人意外，發表演說支持雅魯澤爾斯基這位共產黨領袖競選，他的立意在於「形式重於內容」。只要總統選舉的形式確立，由誰當選則屬次要。但瓦氏暗示，工會將爭取政

府總理和部長的位子，而且志在必得。

然而，新當選的雅魯澤爾斯基總統於月底提名波共第二號人物科茲查克將軍為總理。但科茲查克亦是八一年鎮壓團結工會的魁首之一，面對國會一片憤怒的面孔，科氏終於退怯，向總統提出辭呈，表示他無力組閣。一向以果斷著稱的雅魯澤爾斯基已無力應付困局，而波蘭聯盟的兩小黨也開始動搖。

「麻雀」如今成為「非官總統」

八月十六日星期三，對波蘭的歷史無疑已成為最重要的日子之一。瓦文薩，波蘭團結工會創始人，船塢的電工，八三年諾貝爾和平獎



七十年代蘇聯坦克在華沙街頭

得主，信步走上波蘭白色議會大樓，向歡呼的議員宣佈，他將要組織一個廣泛聯合的政府，包括農民黨、民主黨，以及其他一切支持改革的人士。瓦文薩抓住了這一歷史時刻，終於創造了戰後共產黨國度的第一個非共總理。農民黨和民主黨迅速轉向，同團結工會組成新的聯盟，從而確立了組織非共政府的議會多數（四六席中佔二六四席）。

波共政府幾年前曾經嘲弄瓦文薩，稱他是「一隻想和雄鷹試高的麻雀」。然而，今天的瓦文薩確是波蘭的真正領袖。他領導着波蘭，不是以瓦文薩的名義，而是以瓦文薩的精神，人們稱他為「締造國王的人」——「非官職的總統」。

作為政治家，瓦文薩具有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般的品質。在今年四月，瓦文薩與雅魯澤爾斯基談判，確立了工會的合法地位。但是，他自己並沒有參加選舉成為參議員。瓦文薩認為「最好的位置是保持反對派的角色。」

今年六月工會在議員選舉中大勝後，瓦文薩亦未料及權力會如此之快地轉到團結工會手中。他曾預計要用四年時間準備接管政權。但是那個星期三，他突然意識到時機成熟並果斷地抓住了機會。他發誓將組織政府，「如果社會需要，我將不得不出任總理。但是我薦舉其他人來做。」當議會表決提名他做總理時，他却退讓說：「我不要再做總理，因為這裡有比瓦文薩更卓越的人。」

瓦文薩常說：「團結工會是勞工的工會，而我是工會的領袖。」於是，他推薦了三個人出來做總理：馬佐維奇「團結周刊」總編輯；捷雷梅克，工會的眾議院黨團領袖；庫倫，一個長期活動的異見知識份子。

而瓦文薩自己要幹什麼？人們有多種猜測



團結工會的「教皇」瓦文薩

，有人說，他有意到一九九五年競選波蘭總統。但較且實際的看法是，他仍然保持着冷靜的戰略眼光。他把自己當做後備部隊放在一邊。一旦馬佐維奇或其他工會人士無力使波蘭擺脫危機時，瓦文薩將會出山。他永遠是工會最後的王牌。

按照波蘭憲法的規定，議會的多數黨提名總理，無需要由總統去選擇或批准，只需眾院表決通過。但瓦文薩推薦了三名工會的人選，交由政敵雅魯澤爾斯基總統最後定奪。顯然，瓦文薩要給這位共產黨領袖一個面子。當然，另一種動機在使總統在總理人選上有某種責任的關係，以利於今後共產黨與工會間的合作。無論如何，瓦文薩在此事上再次顯示出他的政治智慧。他節節逼進，却總是使敵手輪地盤不輪面子。實際上，他的妥協和讓步的作法，使對手根本無機會出招反擊。

在「勝利星期三」組成他的新聯盟後，瓦文薩當即作出了一個決定性的讓步：他向憤怒的共產黨對手許諾說：控制軍隊的國防部和控制警察的內政部，誰也不許染指，而要留給共產黨。

他接着作出第二個許諾：波蘭將不會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即與蘇俄的聯盟。他向西德電視作的講話中稱：「波蘭絕不能忘記，它處在什麼環境中，誰都知道波蘭是華約國家，那是不能夠改變的」。瓦文薩靠這樣的詞令拒蘇聯紅軍於波蘭政局之外。

不要把馬鞍放在牛背上

波蘭政治的發展，是戰後世界政治格局的一項重大變遷。它是歷史上第一個以和平手段將共產黨逐出政權的成功嘗試。鐵幕出現裂痕

——在東歐最大、人口最多、戰略位置最重要的國家波蘭，終於出現或多或少民主政治。

人們知道，戰後東歐的歷史，是一部從無成功的革命史。一九五三年首先是東德；五六在匈牙利；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波蘭，一九五六、七〇、八一，革命被鎮壓過三次。每一次都是蘇聯坦克解決的問題，並在各東歐國家傳播着一個鐵律般的訊息：憤怒的棄權是對付共產制度唯一可行的反應。否則共產黨爲了政權不惜一切代價。

蘇俄政府對波蘭非共總理的反應是：「那純屬波蘭內政。」這種態度對俄國人而言，是難能可貴的。

一百年前，俄羅斯思想家亞歷山大·赫爾岑曾問：「爲什麼俄國不能放棄波蘭？因爲它認識到：當波蘭自由時，俄國亦將自由。」五十年前，斯大林曾經抱怨：把共產主義強加給波蘭的確是件很累的事情，就好像把馬鞍子放到牛背上一般。」

不喜歡鬪牛的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顯然想作得輕鬆些，一則他正在推行改革，不願看到波蘭出現生硬的政治局面；二則蘇俄相信，波蘭共產黨早已無力扭轉波蘭的乾坤；三則蘇聯目前需要西方的援助，鎮壓波蘭顯然是不智之舉；四則蘇俄波羅地海三小國獨立浪潮日益高漲，蘇俄唯望專力對付國內，外面的亂子大不必認真。最關鍵的一項是，瓦文薩聲明要繼續留在「華約」國內，並保證蘇聯的利益不會受到損害。

八月二十五日，當波蘭議會下院通過了馬佐維奇的總理提名後，蘇聯部長會議迅速發表賀電稱：蘇波兩國傳統的友好關係和全面的合作將會在新政府階段繼續下去。同時波蘭新總理馬佐維奇亦重申，波蘭將繼續留在「華約」

組織中。

但馬佐維奇強調，團結工會的內閣希望波蘇兩國的關係建立在人民與人民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而不是官員與官員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他並指出，蘇聯過去通過波蘭共產黨影響波蘭事務的方法應當停止。



瓦文薩和雅魯澤爾斯基

接替的不是政府而是它的廢墟

波蘭團結工會今天所真正面對的問題，其實不是華約國家的軍事壓力，不是共產黨的統治競爭，而是陷於崩潰邊緣的波蘭經濟。

一位西方評論家稱：團結工會從共產黨手裡接過來的不是政府，而是政府的廢墟。波蘭的重工業幾乎破產，物價漲得如脫韁的野馬，外債高築不可收拾，工人罷工風潮更是風起雲湧，而波蘭人相信，他們不會因爲政府是由自己的工會所控制而停止對物價和工資的要求。

同時，團結工會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個擁有軍隊和警察的強大的反對黨——共產黨，它是否願意與工會的政府合作，尙屬未定之天。

如何走出這一經濟的泥沼？不出人們所料，瓦里薩和馬佐維奇所開出的藥方是擴大市場經濟和私人企業，發展資本主義。

波蘭現在工業部類中的私人企業比重只有百分之三；農業部類的私人經營比重佔百分之七十五，但政府却控制着整個農業產銷的各個環節，從種子的分配到糧食的購銷。而在商品流通領域和金融市場，則私人經濟成份更爲鮮少。

人們已經形成對工會政府十分不利的觀念：即它必須做到共產黨政府做不到的事情，減輕通貨膨脹，讓市場上有麪包、有牛肉和其他食品，讓波蘭的工業出現競爭能力。波蘭目前所欠的外債，已達三九〇億美元。

由於長期的歷史原因，目前波蘭尙無力脫離以蘇聯爲首的「經互會」國家。波蘭的工業原料很大一部分來自蘇聯。當然，波蘭目前最需要的是西方的長期貸款和技術援助。

「平行結構」政治策略告功

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成立的團結工會，到今年整整九年，終以非暴力方式迫使共產黨讓出政府，創造了戰後世界歷史的一項奇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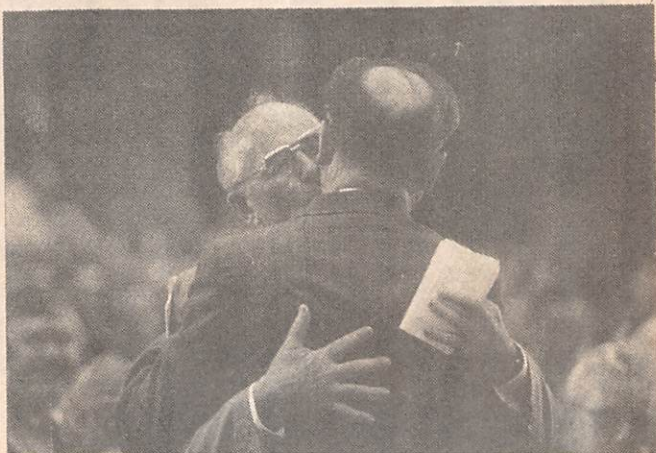
團結工會的成功，除了高超的民主政治藝術的使用外，看不出任何其他特別有利的條件。波蘭絕不是「共產黨國家最薄弱的一環」。相反如果我們對民主政治的妥協原則無所認知的話，我們會感覺，團結工會倒是所有共產黨國家「最軟弱的」反對勢力。



團結工會的街頭運動

經過八一年數百人死亡，數萬人被捕的慘痛教訓後，團結工會開始採取非暴力抵抗方式。在卓越的領袖瓦里薩的領導下，討論制訂了一個「平行結構」(PARALLEL STRUCTURE)的政治策略，即「如果我們不能超越共

改革的難兄難弟：戈爾巴喬夫和雅魯澤爾斯基



產黨，我們最好和他平行存在。」

從八一年十二月到八九年四月，團結工會處於地下非法狀態。它無論形勢有利還是不利，條件成熟還是不成熟，動用一切力量訴求一個目標：即與共產黨平等協商，恢復其合法地位。在「平行結構」的戰略下，工會終於在實際上，而不是官方地，成了與共產黨平起平坐的勢力。工會會員佔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工會一聲令下，波蘭經濟便會進入休眠狀態。但工會組織的罷工從來都是令行禁止的，完全成了一種「政治操練」。

今年四月，一手將工會鎮壓下去的波共總書記雅魯澤爾斯基，終於放下「鷹」的架子，開始同「麻雀」瓦文薩談判，解除了工會的非法狀態。六月，工會在議會選舉時大舉成功，遂為後來的組織政府鋪平了道路。

每進一步投出一個微笑

值得注意的是，七月份波蘭總統的選舉中，瓦文薩大有一舉奪魁的希望，但是他知道，作為國家的象徵，就像英國女皇一樣，總統必須由共產黨來作。他於議會投票時發表演說，以波蘭國家安全的名義，支持雅魯澤爾斯基和任何共黨候選人做國家總統。

瓦文薩的行動，不僅使波蘭確立了總統選舉的民主形式，而且保障了波蘭進一步民主化的安全。他的策略使蘇聯和波共感到，他們的利益是不會受到威脅的，只不過必須同非共黨的政治勢力進行協商而已。

而在這一次總理和政府產生的過程中，瓦文薩的表現更是卓越。他在每進一步時，都要向共產黨投去一個禮貌的微笑。當共產黨的總理也無力阻攔時，工會的新聯盟本可以自己推選總理。但瓦里薩却湊了三人選，交由總統去提名。在組成非共的議會聯盟，瓦文薩首先宣佈的不是勝利，而是保證共產黨繼續控制國防、內政的軍、警二部。在馬佐維奇獲得提名後，他與瓦文薩第一個宣佈又是波蘭會繼續留在華約組織中。

可以說，瓦文薩和工會總是為政治對手的處境和面子作最充分的考慮，以保障民主不至於被武力剷除。任何時候，他們知道什麼是可以獲得的，什麼是必須維持原狀的。什麼時候要進取，什麼時候必須退却。

當然，我們亦應當承認，波蘭領袖雅魯澤爾斯基和蘇共領袖戈巴喬夫的政治風範值得贊許。誠如布希總統在致波蘭新政府的賀信中所言，雅魯澤爾斯基表現出了政治智慧，認可一個反應波蘭人民真正意願的政府。為此，要向他致敬。

我在西郊民巷目睹 六四慘案

魏安娜



爲使六四大屠殺的真相爲外部世界所知，我決定拿起筆來寫出自己在西交民巷目睹的六四慘案的經過。我希望更多目擊者也拿起筆來，從更多角度——人大會堂、前門、歷史博物館、金水橋……將六四慘案的全貌公之於世。

六月三日。當時北京的情況已很不正常。一般單位均提前下班，地鐵、公共汽車時斷時停，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車。前晚木樨地軍車壓死了人，使得氣氛變得比較緊張了，人們估測會有更大規模的遊行，政府方面亦會有所舉動。

六月三日傍晚，我和我丈夫從西交民巷的家裡出來，習以爲常地來到天安門廣場。我們當時沒吃晚飯，就想在前門找個飯館。誰知前門一帶的飯館都關門了，只好找個煎餅攤解決問題。學運期間，許多小攤販聚在廣場附近，生意不錯。正吃着煎餅，廣場喇叭開始播音，說是晚上十點民主大學在廣場成立，王丹、嚴家其、吾爾開希這些人要出席。很多記者、市民就往上湧。我和丈夫決定等着看熱鬧。我丈夫說着笑話：今年春節聯歡晚會上相聲演員姜昆說他做了個夢，天安門廣場改成農貿市場了。你瞧，還真讓姜昆說着了。那年春節晚會上，費翔唱了個「冬天裡的一把火」，果然大興安嶺森林就燒起火來了。這些演員真靈呀……

忽然，又聽到廣播聲，聲音不對了，很緊張，說東大橋等地方來了軍隊，要學生、市民去支援。一共四、五個地方。又說肯塔基炸雞店也有軍隊出現，我一聽就急了，軍隊已經開到廣場啦！

這時候，又有學生、市民跑過來，渾身是血，向廣場上的人訴說軍隊打人暴行。戒嚴十幾天了，北京也沒什麼事。這回軍隊真動手了

，大家都很氣憤。我跟丈夫一商量，決定不回家了，留在廣場上。人大會堂有個政府安的喇叭，這時反來復去廣播一篇稿，要市民們快快回家，可誰肯聽政府的？

六三之夜，廣場上的人比平時少得多。我猜都是去各路口堵軍隊去了。快到十二點了，還沒什麼動靜。我們以爲軍隊不會來了，就回家睡覺。剛進院門，就聽見裝甲車隆隆開進的聲音，還有很多人在跑，在吶喊……我們趕緊又走出院子，裝甲車剛剛開去，留在地下壓出來痕跡。天安門廣場附近，那些市民（包括我們）每隔十幾米設的橫竿，全被壓平了。

我和丈夫趕快向肯塔基炸雞店方向跑去，數不清的街坊居民也往那邊跑。許多不知從何而來的士兵，頭戴鋼盔，列隊跑向正陽樓。市市擋不住他們，就在旁邊高呼「打倒李鵬」的口號。

有一隊學生頭纏白布條手拉手地迎過去，與士兵對峙。市民們都湧到學生方面給他們助威。我和丈夫也擠上去，對士兵們講道理，勸他們撤回營房。這些士兵都不說話。這時市民裡有人朝士兵投玻璃瓶子，我們都很意外，覺得有便衣公安人員混進來，想鬧事。於是好多市民（包括我們）便扭頭向市民喊話，讓他們別動手。混亂很快便平息了。群眾覺悟很高，不給政府提供鎮壓藉口。有些外國記者開始拍照。我和丈夫見這裡沒事了，就往東邊走去。這時，一大群市民潮水般地往後撤，原來是防暴警察進來了，他們列成四路或六路縱隊，手裡拎着大白木棒子，逢人便打。我們也跟着跑，到了毛澤東紀念堂附近才停下來。我親眼看見不少市民被防暴警察追上，打倒。我有些害怕，緊抓住丈夫的手，我們跳到松牆邊上的水泥台階上了。市民們群情激昂，大罵警察是法

西斯。市民們準備還手，就彎腰拾揀東西，廣場上沒啥東西好揀，就把毛堂前面的水泥墩子摔碎了，用小碎塊選擊警察。

學生的廣播響起來了。聲音很危急，呼籲大家向紀念碑二三層靠攏，說只要人在廣播站就在。我們走到紀念碑附近的草坪上，這裡橫七豎八地躺着許多學生。我挺奇怪，這些學生怎不去支援紀念碑？我丈夫說他們折騰了這麼多天，又困又乏，哪裡醒得了？

躺倒在地的學生沉睡不醒，周圍是一堆堆垃圾。我差點踩着一個學生。他用毯子蒙住臉，只露在外面一雙腿。可憐！這麼髒的地方也能睡覺，足見他太乏了。我對丈夫說，萬一軍隊衝進廣場，學生市民一跑，非踩傷這些學生不可。

這時，遠處響起了零星槍聲。我和丈夫有些害怕，商量了一下，覺得還是回家為妙。我們當時以為政府對學生比較寬容，而我們是市民，軍隊會對我們不客氣。我承認我們有私心。

回到西交民巷口上，聽得槍聲大作。肯塔基炸雞店那邊也有人打槍。槍聲是很奇怪的響聲，叭，叭……是爆出的聲音。天空也升起了信號彈，紅的。這時是凌晨一點多鐘。

槍聲越來越密，軍隊大批湧過來。戴着鋼盔，亮着刺刀，很嚇人。有膽大的喊：「鬼子來了！」我看見有個外國記者騎自行車湊近軍隊，躲在樹後面照個相，然後騎車離去。這時市民已四散奔逃。

我和丈夫躲在牆角往外看，又怕又好奇。我說這槍聲就跟爆破似的，跟平常在電影上聽到的不一樣。丈夫安慰我說，這可能是橡皮子彈，打到身上頂多落塊銅錢大的疤，沒危險。我一聽又長了膽子，就朝軍隊喊了一嗓子：「

不許鎮壓學生！」誰想馬上招來了一陣槍。我丈夫氣得大罵：「你不要命啦！」

我這一嗓子提醒了附近的市民，好多人都喊起了反政府口號。連銀行總行、保險公司的宿舍樓上也有人響應。喊得最多的是「打倒李鵬。」

我和丈夫回家拿了望遠鏡，爬上自家房頂，往天安門廣場看。我清楚地看見蒙了苦布的軍用卡車一輛一輛開入廣場，總共約二十幾輛。空氣中能嗅出燒着膠皮的氣味，四下裡都有火光燃起。

不一會兒，東邊槍聲緊了。又聽到有砲聲，跟放禮砲的聲音差不多，氣味難聞，刺激得人要流眼淚。原來是催淚瓦斯，我丈夫下去弄溫毛巾，我還留在房頂觀看，各種車輛（包括押送犯人的囚車）開過來，一邊開一邊扔催淚瓦斯。防暴警察封死了正陽門至毛紀念堂的空地。

正在這時，機關槍響起來了。跟電影上完全一樣，我用望遠鏡看見有人隨着機關槍聲倒下了！我一下子就哭了，明白這回政府真要大開殺戒了！

紀念碑的學生廣播又開始對士兵喊話。很悲憤的聲音，說國家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你們也有父老兄弟，怎忍心下此毒手等等。房上房下，一片悲聲。

台灣歌星侯德健在廣播中說：我是侯德健，我們的人死得夠多了，現在在廣場裡的每一個人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不能再傷亡了。侯得健的話概括成一個字就是「撤」。他要求與戒嚴部隊談判。

這時大約是兩三點鐘，槍聲稀了一些。一些左鄰右舍的人從北京各處跑回來，爭說軍隊在復興門、建國門等地殺人的慘況，涕淚交流

，泣不成聲。這下我們才知道原來天安門廣場的情況還是最文明的呢？

大概是四點，侯德健的聲音又響起來。他說與戒嚴部隊談妥了，從東南角給學生留出一條通道撤退。

這時候，廣場熄燈了，除了天安門城樓下還有幾盞燈，整個廣場黑壓壓的。靜了幾分鐘，一點聲音也沒有。學生廣播開始放國際歌。這些天來，廣場上經常放國際歌，但都沒有這次悲壯，很慘。紀念碑上的學生在唱，我們這



北京街頭荷槍實彈的軍人

些市民也跟着哼，很多人哭泣、落淚。

學生廣播又有個沙啞的聲音說：「讓我們平靜地面對死亡」，而人大會堂的政府喇叭也同時沒完沒了地宣讀市政府的命令。

四點多鐘，廣場上的燈刷地一片雪亮，軍隊從大會堂跑出來，兵分幾路，有從正門，有從側門出來。學生廣播說士兵你們不能這樣對待我們，我們是要建設富強的中國。

這時學生開始撤退了，我用望遠鏡看見校旗在移動。許多軍隊從我家房下經過，呈扇形

被槍殺的學生橫屍街頭



移動。也就是說，不是整個一路開過去，而是先留個道口，然後一隊士兵上去填補一下，又一隊士兵補上去，士兵站定後，最外圍一排槍口對準廣場。

沒過幾分鐘，北面突然槍聲大作。機槍、步槍都有。北面一響槍，廣場四周槍聲大作地

殺人犯！「我心想怎麼喊口號呀，這不是拿雞蛋往石頭上撞嘛。果然，我看見士兵像野獸一樣向學生開槍，當場就倒下了十多個，槍聲壓住了口號聲。我們房後街上的士兵也開始漫無目標地舉槍亂射。

這時候，我們房後一陣騷亂，我丈夫趕緊拉着我連滾帶爬地離開房頂。四鄰聚了好多人。我們房後就是人行道，搭了個臨時廁所。這時人行道上站滿了戴防毒面具的士兵。市民都背對士兵逃散，只有我們街坊的一個傻子（低智人）想上廁所，就朝着士兵走去，士兵們見傻子走近，就用槍托一頓亂揍。傻子跪在地上求饒，三個士兵還不住手，把他打倒在地。房頂上有個小伙子，用照相機拍下了這個鏡頭，差點被子彈打中。

六點多鐘，有個推着光頭的軍官模樣的傢伙率一隊士兵從街上走過。這時天已亮了。許多市民站在自家門口，敢怒不敢言。有個青工小聲說了句什麼，好像是軍隊不應打老百姓。這個軍官就喝起來：「你敢再說一遍？！老子斃了你！……」青工扭頭便跪，這軍官掏出手槍，也不知怎樣一拉槍栓，結果子彈落在地上了。他一彎腰揀起子彈，裝進去「叭」地射了出去。有個娃娃竟不知死活地走了過去拾子彈壳，被這軍官一脚踢得哇哇大哭。

北京的老百姓從未見過真槍真砲的架勢，根本不知道厲害。我們湊在一起，用極小的聲音咒罵解放軍簡直比法西斯還法西斯。待軍隊走遠後，才開始破口大罵。大家都說要罷工罷市罷課，全國大罷工。

以上就是我在西交民巷目睹六四慘案的經過，如果將來有一天，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像當年審判四人幫那樣審判六四慘案的元兇，我願意出庭作證。

開火了。還有士兵向我房頂打冷槍，嚇得我們趴在房頂上，也顧不得餓不餓了。我趴了一會兒，聽到槍聲稍稍歇了，就探個頭用望遠鏡觀看廣場情況。這時，毛紀念堂後面又有學生呼口號，喊的是「殺人犯！」

林口 印刷公司

彩色報紙 各型雜誌 宣傳刊物 大型海報

☎ : 718-937-5141

718-937-5301

🏠 : 50-22 23 ST.

L.I.C., N.Y. 11101

LINCO PRINTING CO.

一個醫生



眼裡的

悲慘之夜

一個醫生

我是一個醫生，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我永生難忘的日子！也是我有生以來最悲痛的日子！

六月三日晚，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了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市中心的道路兩旁和每一個主要路口，並在十字路口處設置了路障。人們紛紛談論着：「今晚軍隊可能要來採取行動了！」「絕不能讓軍車進入天安門！」「北

京的市民要遭殃了……」聽到這些議論，我有些毛骨悚然。深夜十一點多鐘，我聽到街上一片喧嘩聲，緊接着一陣震耳的隆隆聲。我下意識的衝到了街上，清楚地看到一隊裝甲車以飛快的速度朝前開去，憤怒的人群撿起路邊的石塊和瓶子朝裝甲車投去。但無濟於事，裝甲車隊像瘋子一樣撞翻了路邊中間的汽車，衝向了長安街。平整的柏油路留下了兩道長長的凹凸不平的痕迹。過了一會兒，已經是零點以後，我聽到不遠處傳來了可怕的槍響，急救車鳴着叫聲，疾馳着向醫院開去。

此時，一種做醫生的責任感撞擊着我的心靈，我毫不猶豫地跑向醫院投入了緊張的搶救。

我看到有四、五個已經中了槍傷的青年躺在地上，還有幾個被棍棒打傷了頭部的人，都是血淋淋的。他們當中大部份是市民，小部份是學生。在場所有的醫生護士都緊張的忙碌着。縫合、輸液、取彈壳……當時取出的彈壳都是一種薄薄地圓形金屬片，直徑約一·五公分。彈壳大都是射在肌肉層，很少有射入內臟的。

過一會兒，一位哭喊的婦女捂着正在淌着鮮血的頭，在她丈夫的陪同下走進了急診室。她的丈夫非常氣憤的訴說，他看到外面的情況不好，趕到工廠去接上夜班的妻子，在街上被擁擠的人群擋住了去路。防暴警察手持帶釘子的木棍，朝着人群亂打。他趕快向人群高呼：「請幫幫忙，保護一下我的妻子！」當即有四個男青年手拉手圍了一個圈，將他的妻子圍在中間。然而無情的警棒偏偏向這位女性的頭部打來

，就這樣，她的頭上留下了兩條約五—六公分的撕裂傷。緊接着，類似這樣的患者一個接一個地被抬到醫院。在忙碌中，我們仍然可以聽到外面的槍聲，而且越來越激烈。急救車似乎是在咆哮着奔向各個醫院。這時一群人抬着一副擔架跑進了急診室。一個女人緊抓着擔架嚎啕大哭。當我們檢查擔架上的這位傷員時，發現他的呼吸心跳均已停止了，瞳孔完全擴散。心內注射，心臟按摩絲毫沒起作用。在他的身上，胸腹部有三處槍傷，傷口還在往外冒着血。他，死了。而他的妻子似乎還抱着一線希望地哭着，呼喚着他的名字！這時，我看了一下錶，已經是凌晨三點多鐘。受傷的人一個接一個，大部份都是槍傷。他們當中有大學生、大學講師，還有站在各個路口無辜的市民，市民當中有知識份子、工人、孩子和老人。我們不停地縫合、取子彈、堵傷口。兩位大學生幾乎是同時被抬進來的，都是股動脈破裂，股骨頸被打碎，護送他們的大學生們，脫了自己的襯衫或褲子，緊緊地勒在他們大腿的根部以減少出血。儘管這樣，鮮血還不停地從翻着肌肉的傷口湧出。由於出血過多，他們很快表現出口渴，面色蒼白，血壓急劇下降的休克症狀。醫生們大都是聞訊趕到醫院的，因此很快將他們抬進了手術室進行手術。

我們取彈壳的同時，發現子彈的大小在逐漸升級。從開始的金屬圓片，到約二公分、三分公分甚至四公分的銅彈壳。傷口在不斷地擴大，出血量也在隨之增加。又一位女性受傷者被抬進來了，她是在醫院附近的大街上被掃射上的。她的小腿一片血肉模糊，經檢查小腿的左右側有兩個很大的窟窿，子彈已經穿了出去，腓骨已經骨折。像這樣的槍傷越來越多，大批的紗布和綳帶從全院的各科室送到急診室。

更重要的是：由於每個傷者都大量失血，因此都面臨着休克的危險！血庫裡的血已經用完，只好用代血漿來維持他們的生命。平時常為一些小事情發生爭吵的北京市民，在這種危難的時刻，表現出了極高的精神境界！很多市民爭先恐後的要求獻血，但是考慮到獻血之前查體的困難，我們只採用了一小部份身強力壯的小伙子的血。

街道上倒下去的人越來越多。急救車已經供不應求！一輛急救車開進醫院的時候，我們跑過去迎救。沒想到的是，五個血淋淋的肉體幾乎是捆在一起送來的。當把他們抬下來的時候，從他們胸前的校徽上，得知他們都是大學生。有南開大學、北京大學、理工大學的。送他們的同學說，他們是從天安門遭到機槍掃射的。這五個大學生中，當時已有三人死亡，其餘的二名我們在全力搶救。他們全都是胸腹部開放性損傷，而且都不是只挨了一槍。護士和他們的同學哭泣着把死去的學生送到太平間。急診室亂成一團！滿地的鮮血，到處都是叫罵和痛哭，人們幾乎都要發瘋了！

由於診察床和觀察室的床上都躺滿了傷者，後來再送來的只好放在地上搶救。我們所有的醫務工作者都流着淚水為他們工作。

這時，人們又抬進來一位傷者。他是個工人，三十歲，看上去他身軀非常寬大。他的胸前有五個大小不一的傷口，最大的約有五×七公分肋骨斷裂，胸腔開放，大量的鮮血不住的往外淌。護送他的人當中，有一位是他負傷的目擊者，這位目擊者說，他是個英雄！當他挨了一槍之後，他沒有倒下，他以頑強的毅力衝向了正在向其他人射擊的槍口。就這樣，他中了四發子彈，兇狠的劊子手又狠狠地照他的胸前挑了一刺刀！儘管如此，他的精神仍然是那

麼驚人，送來的時候，他神智仍然是清醒的。他說：「醫生，請你們一定要救活我，因為我妻子是殘廢，我還有一個僅僅兩歲的小孩。」聽到他的話，我們全都哭的泣不成聲了。我們以最快的速度為他縫合了傷口，做了胸腔閉式引流、吸氧、輸血等等，然而他傷的太重了，凌晨四點四十五分，他永遠停止了呼吸和心跳。多悲慘的一幕！我默默地為他致哀，為他祈禱。祈求上帝讓他的靈魂升天！

天已經漸漸白，而槍聲還在斷斷續續的迴旋在北京的上空。從長安街和天安門開出的急救車還在奔馳向各個醫院。又一輛急救車，同時送來七個傷者，這一次又有四個死亡，四具血淋淋的屍體，全都是死不瞑目！我們輕輕地幫他們合上眼睛，推着他們去了永遠安靜的歸宿。

天已經接近亮了，一位七十四歲的老人，被抬了進來。他的頭部中了一槍，老人已經完全昏迷，生命危在旦夕。他身邊五歲的小孫孫用力的拉着爺爺的手，大聲哭喊着：「爺爺，你怎麼啦，你怎麼不說話呀？」多可憐的孩子！可惜的是，這糊塗的爺爺為什麼偏偏抱着小孫孫出來？為什麼要在他的幼小的心靈上留下這永遠不可磨滅的創傷？這千秋之罪，應該由誰來承擔？

凌晨五點半鐘以後，槍聲漸漸稀落，在送我們醫院的一百多名傷員中，有十六個死亡，其餘的大部份都身負重傷，住進病房。隨着槍聲的減少，急診室也漸漸地安靜下來，而此時的我們！所有的醫生和護士，精神已經達到了崩潰的邊緣！這究竟是為什麼？這血的代價由誰來償還？殺人的劊子手什麼時候才有良心的發現？全世界的幾代人將如何評價這段發生在北京的悲慘的歷史？

中國大逮捕報告

上
「亞洲觀察」供稿

有罪推論和卽決審判

中國政府對八九民主運動的鎮壓和搜捕，至今仍在繼續着。據官方消息已有三十多人被公開判刑。北京的官方媒體對國際譴責的反應是：有計劃地控制有關逮捕的報導。儘管迄今有關判刑的報導，均局限於工人運份子，但很顯然，學生和知識份子同樣面臨着判刑和重罰。至七月八日始，中國當局公佈五列罪案，罪名包括「宣傳和積極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判決結果從「勞動改造」到「死刑」不等。這意味着，在中國以任何非暴力方式提倡政治改革，都可以被判為嚴重的罪行。

許多被捕人士的罪名屬非暴力的行爲，諸如「散佈謠言」或「散發反革命宣傳品」等；另有一些罪犯的罪行是「破壞公物」「縱火」等其他刑事罪，但從官方媒體的報導中，難於明確判刑所依據的尺度。當官方廣播和電視報導那些因暴力而被判罪的份子時，同時有許多人士，都是因和平抗議而遭到通緝和逮捕的。

目前的判決，均是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九八三年通過的決議，內部安全條例可採取從速判決（SPEEDING UP ADJUDICATION）方式，即所謂的「卽決程序」（SUMMARY PROCEEDING）。根據這個具

有法律效力的決議，被告只有三天上訴時間。所有報導中，沒有提到辯護律師程序。上海的一名被判死刑者抗辯自己「無罪」，僅獲死緩兩年的寬延。

中國於一九七九年頒佈的「刑事訴訟法」中，曾接受了「無罪推論」的刑事原則，但中國社會歷來缺少這類法治傳統。反之，以恐嚇、刑求方式逼迫罪犯「坦白」，却是極爲普遍的作法。而過去數週內一些囚犯被安排在電視新聞中「公開悔過」表明那裡存在着嚴重的體罰現象。除死刑之外，新近被捕的許多囚犯被判「勞改」「勞教」者，不是通過卽決審判定的罪，就是根本不通過任何審判。在這些案例中，囚犯所面臨在「中國式古拉格」中埋沒一生的命運。中國擁有龐大的勞改營系統，據報導裡面的生活狀況極爲苛刻。按照七八至七九年民主牆期間，那些有坐監經歷者的描述，近期內被捕的學聯、工聯領袖們，將面臨長年的禁閉生活和沉重的體力勞動。

爲防止民運份子的進一步逃亡，中國政府已關閉了國家的邊境線，並管制和改變了簽證方式。所有在六月二十日之前簽發的出境許可均告作廢，持有國家護照者需從公安局獲得新的許可。所有已獲外國入境簽證者，須回公安局再次審批。此外，機場、車站等交通設施均

被嚴加管制。例如，許多民運份子是在北京國際機場被抓獲的，還有公安人員將可疑份子拖下飛機的報導。

被判死刑的工人及市民名單

（人名均按拼音同音譯）

七月二十九日武漢中級人民法院將余從庭、郭正華判處死刑，二人罪名是五月份在武漢聲援民運的動亂中，謀殺兩名市民、刺傷一名士兵並偷走其機槍。路透社七月三十一日報導援引「光明日報」報導，但指出報導未具明謀殺情節。據稱余氏曾有勞教前科，郭氏亦曾爲犯人。同謀犯鄧文斌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另有兩人被判無期徒刑，九人被判不等期徒刑。他們的罪名是襲擊警察、破壞鐵路、煽動群眾攻擊黨、政機關。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七月二十六日判處二十歲的李文寶、十八歲的梁宏城死刑，兩人均爲農民，罪名是在「六四」戒嚴後「使用暴力」。李氏來自京郊順義縣、梁氏來自瀋陽郊區，兩人的具體罪行是「偷自行車和現金」。

成都中級人民法院七月一日公審了四川省農民王貴陽和關翔城，七月八日執行死刑。他們的罪名是六月五日在成都街頭焚燒車輛。兩

人的上訴被該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另一罪犯何強被判死刑緩期兩年。

北京市六月二十一日，判處八人死刑，八人上訴均被駁回。他們是林肇榮、陳靜、朱劍軍、王漢武、羅紅軍、張文魁、班慧澤、王蘭曦（女）。

據北京廣播，林肇榮為北京回民醫院工人，曾因流氓犯罪被判三年強迫勞動。他於六月五日焚燒一輛軍車。羅紅軍為北京公共汽車公司售票員，罪名是搶劫軍用物資。班慧澤為河北省新樂縣農民，罪名為毆打士兵，將其中一人打昏至殘。

七月二十日濟南日報報導，濟南法院將四十五人判罪，包括死刑和終身監禁。十七人被遊街示眾和公審，據北京廣播，有一萬人參加了公審大會。

上海市人民中級法院六月二十一日將工人徐國明、待業青年卞漢武、工人白學戎等三人判處死刑並進行公審，罪名是在六月六日焚燒火車，造成六死六傷，他們還阻止列車以抗議北京的屠殺。在此事件中同時被捕者有：彭家明、魏英雄、楊嘯、孫繼紅、艾齊朗、袁子民、趙喜民、朱青。

學生、教師和知識份子被捕名單

（人名均為拼音同音譯）

項大勇，北京大學學生。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因在校園內組織示威而被捕，這次示威有三百餘學生參加為追悼六月四日死難烈士。

馬梁崗，據安徽省廣播電台報導：他是合肥自治聯合會的核心人物。馬梁崗在海南海口被捕，日期不詳。

李翠萍，為北京自治聯合會秘書長來自其他省市。據河北日報報導，李翠萍於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二日在保定被捕。

陶洋怡，北京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傳部部長，在孟崗回族自治縣被捕。這個消息也是在河北日報登出，但日期不詳。

劉京亮、催國興、蔣竹、王雙青等在南辟、黃華、欒平、橫歲等縣（均在河北省境內）的公安局自首。據河北日報報導：以上幾人參與北京或河北省的非法組織。

秦衛東的被捕於七月六日之前，據河北日報報導：他是北京醫學院學生自治聯合會的領導人之一。

據國際特赦報導：幾位四川成都社會科學院的成員被捕。他們是：王知林，三十五歲，職責為研究員和編輯。涂秋生三十八歲、李京三十三歲，均為哲學和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員。其他還有李曉芬和汪成忠，均為研究員。

「國際特赦」報告還透露，三位北京知識份子亦在最近被捕：歐陽平，北大社會研究所講師；孫立，該所研究生；呂立林，體制改革研究所出版的「發展與改革」編輯。

「新華日報」七月二十二日披露，安徽省學生自治會秘書長徐中，在南京的一家旅館被捕。江蘇省在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三天中，共逮捕三，七八二人。

另一名安徽學生領袖陳明夏據同一報導在北京被捕，公安人員稱逮捕理由係由於他藏贓一千美金。

陝西省「法制」週報報導，該省出版社主編李貴仁因試圖組織出版社員工罷工而被捕。六月五日李貴仁召集會議，要求工人簽署抗議和進行罷工，他還被指控在五月間組織過四次遊行，書寫標語要李鵬、鄧小平下台。他的

被捕日期不詳。

香港明報七月二十日報導，著名詩人軍官葉文福，因簽署了北京知識份子聯合會的「五一六聲明」，要求政府接受學生要求，而至被捕。但日期不詳。據未經證實的消息稱，葉因慘遭毒打而試圖自殺。

南華早報五月二十七日報導，掛靠於公安局的群眾出版社社長于浩成，公開呼籲中共承認學生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的十二位知識份子之一。據悉已經被捕，但日期不詳。于浩成還是被中共政治局指為「反黨聯盟」的四十人之一，趙紫陽的支持者。

四十多歲的「五一六聲明」簽署者之一，作家鄭義，已於七月上旬被捕。他是山西省太原市人，他曾計劃寫書學運的報告，收集了大量的材料。鄭義過去是「人民文學」和「小號月報」的經常撰稿人。

作家柯雲路據悉已經被捕，無更進一步消息透露。

「文藝報」編輯，詩人老木於六月十三日便被逮捕，他是今年二月卅三人知識份子公開信的簽署者之一，該信要求鄧小平大赦政治犯。他也簽署了「五一六聲明」，支持學潮。

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張顯揚，新近已被捕，然日期不詳。他是二月二十六日聯署公開信的四十二名知識份子之一。該信要求中共中央釋放政治犯。北京市長陳希同六月卅日講話指控張顯揚鼓動其他知識份子支持趙紫陽反對李鵬。張亦被指為趙紫陽「反黨聯盟」的成員之一。

「紐約時報」七月十二日報導，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張仲禮已經被捕（或失踪）。國家體制改革研究所社會調查組組長楊冠三，與趙紫陽有關的中共政治結構改革研究中

心副主任高山一道被捕。北京市長陳希同在六月三十日講話中，指控他參與了五月十九日的一次會議，並呼籲召開緊急人代會，討論實施戒嚴法問題。「政治體制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武焯，據報導亦已被捕。

電視劇「河殤」作者之一遠志明，已經與該劇另外兩位作者蘇曉康、王魯湘一道被捕。「河殤」表現了中國政治的周期性沉浮，揭示了中國政治文化落伍的一面。

經濟學周刊副主編高瑜，中國青年報的李同，均傳已被捕，但未經證實。

四十二歲的「四通公司」經濟學家周舵，月十日被捕，由「亞洲觀察」來源提供的「四通公司」是中國最大的電腦公司，周舵負責戰略計劃和公關兩個部。在此之前，他曾任北京大學經濟系講師，共青團幹部所講師等職。「四通公司」高級人員均已逃至國外。該公司的「社會發展研究所」曾策動召集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

五月二十一日人大常委五十一人發表信件稱「人民的」應該由法律程序得到體現，該信亦要求有關的總理職務。「六四」鎮壓後第一個被捕的知識份子曹思源，是為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四通公司」總經理萬潤南亦被捕，現已身在國外。

北京鋼鐵學院二十一歲的學生李江峰，北京「學自聯」領袖，六月十五日在河北省境內被捕，送往秦皇島市公安局，李被指控在學潮期間燒毀六部軍車。

北京醫學院基礎部學生劉凡，六月中旬在河北省張家口市被捕。河北日報六月十七日曾報導，劉因坦白被從寬處理，但具體體罰不詳。據說他亦為北京學生領袖之一。

「光明日報」專欄撰稿人，中國最著名女

記者戴晴，於七月十四日被捕。合眾社和路透社報導，戴晴被捕後家裡被搜查抄檢。她被捕的原因之一，是支持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與中共上海市委對抗。在學潮期間（即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到訪之前），戴晴曾前往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撤離，因為她擔心學生被鎮壓。她在「光明日報」發表過大量的文學作品。今年二月布什總統訪北京時，戴曾受邀請出席總統晚宴。

美國亞歷桑那大學生物系研究生，三十三歲的楊巍，於七月十八日在上海被捕。他曾於八六年底從美國返回中國，八七年一月因參與學潮被捕。他被指控參加設在美國的「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在該盟所主辦的「中國之春」雜誌上寫文章，據稱這個團體是由台灣資助的。在獄中服刑兩年後，楊被釋放出獄，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亦不能返美繼續學業。官方新聞社七月十八日報導稱，楊巍被釋放後拒絕悔過，並繼續鼓動學生反對政府。

「亞洲觀察」消息來源稱，「人民日報」記者張述被捕，日期不詳。被捕的理由是在六月二十一日上海槍決三名工人後，他曾寫了一篇有關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社論。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被革除總書記職務。張述的社論被拷貝傳閱，但未得發表的機會。另「人民日報」有六名印刷工人，因阻擋軍車而被捕。

英文中國日報女記者陳紅，二十二歲，被捕日期不詳。亞洲觀察消息來源稱，她被捕的理由是與外國人接觸頻密。

安徽廣播電台稱，合肥某大學工程系學生楊方，在六月上旬便因「反革命活動被捕」。他在當地學校組織罷課、參加地下會議，並設路障阻礙交通。合眾社稱，安徽電台指控楊還建立了一個「人民之聲」電台，並在六月四日

公開在合肥市人民政府門前轉播「美國之音」的廣播，並撒播北京「軍事鎮壓」的謠言和圖片。

「亞洲觀察」消息稱，業餘作家李小華和朱小彤二人在六月中旬被捕。三十五歲的李小華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編輯，一九八八年全國詩歌比賽獎冠軍。他逃離北京後，於六月十二日在廣州市被捕。朱小彤筆名「朱佳軍」，係武漢大學學生，之前在五十五軍一六四團服役，六四之後在武漢被捕。

政府通緝的二十一要犯之一王正雲，據法新社報導在七月十日前後被捕，二十一歲的王正雲是中共民族學院學生，雲南人，少數民族。

從香港逃抵國外的政治學者嚴家其的助手王焱、楊百揆，分別在七月四、五兩日被捕。電視劇「河殤」作者之一王魯湘，據合眾社七月六日報導已經被捕。「河殤」一劇被中共高層認為否定了中國文化傳統。

「世界經濟導報」記者張偉國、徐曉薇，據香港新聞來源稱已被捕。（亞洲觀察尚未證實此訊）。據香港「文匯報」稱，徐的被捕，乃因他與上海「學自聯」一起活動而至。

「天津日報」七月十七日報導，學生領袖李輝在六月裡與其他四十五名「反革命暴亂」份子一道被捕。天津方面已於六月十五日將李輝押解進京，報導稱李為「學自聯」佔領天安門廣場時的「西線總指揮」，並親自參與了阻擋軍車的行動。他還組織宣傳隊前往濟南、武漢進行「反革命煽動」。六月九日，李與其他七名學生到天津後，還散發傳單揭露「六四大屠殺真相」。

著名學生領袖王丹於七月三日與台灣「自

立晚報」記者黃德北一道被捕。黃事後被釋。王丹係中國大陸最著名的學生領袖，吉林人，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黃德北是在北京飯店門前與王丹會面時被發覺。黃對新聞界稱，中共官員承認王丹已被抓獲，但無進一步消息證實。

黃德北與王丹會面時搭乘的汽車的司機王陽，已證實被捕。

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六十三歲的李洪林，七月六日在福州家中被捕。據美國與李洪林家人有關人士描素，六日中午，福建省公安局的十名裝警察闖入李家將其帶走，公安人員拒絕向的家人透露李目前被關在何處。李洪林曾著理論風雲一書，總結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和實踐。另有「四種主義在中國」文章亦有名。他是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

支持者。之前曾任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共黨史所所長、中共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他一九九一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期間去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職務。今年二月他亦簽署了四十二名知識份子的公開信要求釋放政治犯。

杭州日報六月二十三日報導，前浙江大學學生張真於六月十五日被捕。報導稱，張因盜竊被校方開除，但繼續滯留校園內並成爲「學自聯」頭目。他曾前往北京，帶回大批反動宣傳材料，發表演說，指揮襲擊火車站，阻撓火車，在杭州、寧波、溫州、金華四市的十八個非法組織中，公安局逮捕了一五一一人，張真爲其中之一。

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研究室副主任白南生，據合衆社消息已於七月十日被捕。他的兄弟白南風，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經濟學家，亦被捕。

「文匯報」七月三日報導，著名話劇「WM」（我們）的作者，四十五歲的劇作家王培公在貴陽被捕。「WM」一劇描寫的文革時代。王還宣佈退黨以示支持民主運動。

來自中國的消息稱，六月二十三日中共下達秘密逮捕令，逮捕七名著名知識份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雜誌編輯包遵信，北京廣播學院講師，「河殤」作者之一蘇曉康，據悉已經被捕。北京社會經濟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目前仍在逃亡中。前國務院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已逃往國外。前「經濟週刊」主編，北京知識界聯合會領導人王軍濤，目前仍然很安全。

北京首都鋼鐵公司學校的學生，二十一歲的楊益均，六月十五日在秦皇島市被捕，被指控在反革命暴亂中燒毀多輛軍車。二十二歲的孟進前在琅坊市公安局檢查站被捕，被控燒毀兩部軍車，強姦一名婦女，參與反革命暴亂。

鍾瞻國、張家華與其他十四名哈爾濱學生自治聯合會成員，據報導於六月二十三日向哈市公安局自首。報導稱他們交出「非法組織」圖章，承認了自五月十五日來進行非法活動的事實。組織罷課、街頭示威、設路障阻止工人上班等。

周恒錦、距城儀六月二十二日在瀋陽市公安局自首。周爲瀋陽教師學院學生，二十四歲，爲瀋陽「學自聯」成員，瀋陽教師學院「非法組織」愛國社負責人。報導稱他在六月四日指揮一群人設路障。在六月七日，他前往瀋陽飛機機械廠，干擾工人工作。距爲瀋陽「學自聯」的聯絡人員，瀋陽醫學院（中國醫科大學）非法組織的副主席。

據傳爲「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主要負責

人的袁慈和，現年二十三歲，六月二十日向包頭市公安局自首。二十一歲的北京大學學生王潮風、錢嗣同，在同日被捕。他們都是「北高聯」核心成員。三人均被遣送回北京作進一步查審。袁爲包頭「師專」學生，被指控「煽動、組織和指揮學生示威、靜坐和罷課。」「他在天安門廣場多次接受外國記者訪問。回包頭後，繼續散佈謠言，煽動示威和其他不法行爲。」王潮風爲「北大」天安門廣場學生負責人，絕食總指揮和廣場財政部部長。他還涉嫌組織非法學生示威、靜坐及絕食。錢嗣同的情況不詳。

據報導河北省逮捕了四十四人。「北高聯」常委成員劉剛、劉建立，六月十五日被鄉漢縣公安局逮捕。北京市民自治會領袖紀富南、王志剛和三名不知名人士，六月十五日被徐樹縣公安局逮捕。「北高聯」糾察隊指揮之一張佳七月十六日被沙河縣公安局逮捕。

北京醫學院講師趙義強和妻子（該校研究生）在北京城西北一百五十哩的張家口市被捕，罪名是幫助絕食學生。民運聲援活動的主要參與者石金剛，七月十日在山東嶗山縣被捕。民運主要參與者，北京市民劉健強、高榮剛、龔輝七月十五日在德協火車站被捕。

余方前，北京科技工程學院學生，民運主要參與者，六月十七日在其老家邢台被捕。潘祥，北京外地「學自聯」領袖，六月二十日晚在山東大學被捕。他是山東大學外語系研究生，五月十八日率領山東大學聲援組前往北京，並參與了「策劃反革命暴動的陰謀」。

馬少華，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四川人，「北高聯」常委委員，六月十六日在湖南百天縣被捕，時身藏大批反革命宣傳品。

兩名上海科技大學學生，上海市「學自聯」領袖，六月十日在嘉定縣公安局自首。王洪明，該校機械工程系學生，二十四歲；宋迷途，該校無線電系研究生，三十一歲。

北京日報六月二十七日報導九名參與「反革命抗議活動」的份子接受審判的消息。二十六歲的張建丹是其中之一，他被指控殘害解放軍士兵劉國庚的屍體，亦被指控為敢死隊成員。

天安門廣場指揮部聯絡人周赤峰，因經常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而被捕。他於六月十二日在長春被發現，原係長春建築學院學生。吉林工業大學學生（名字不詳），「學自聯」組織部長，最近向公安局自首，並「坦白」了他在北京的「反革命活動」。

六月二十三日，公安局逮捕了十七名北京各大學學生，包括四名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十名北京師範學院學生、一名政法學院學生。尚有一些情況不詳的學生被捕。

二十七歲的劉小曲、二十九歲的魯竹茹，均為女性，六月十九日在北京機場前往巴黎的班機前被捕。據稱她們所使用的護照是從國外郵進中國的，海關人員發現破綻。兩名婦女皆與學潮有關聯（南華早報六月二十三日報導）。三十四歲的吳海珍，雲南教育學院外語系講師，與楊洪、王剛（見後述）一起，六月十三日在昆明被捕，罪名是向學生演說中攻擊「黨和政府領導人」。

昆明金龍飯店助理經理，二十七歲的王剛，被指控向雲南學生進行「反革命宣傳」。他並同香港和其他地區不法份子接觸。

二十二歲的陳陽北京政法學院法律系學生，六月十五日在瀋陽被捕。他被指控為北京市民自治會負責人，他並幫助成立敢死隊，散發

反革命傳單和參與反革命暴亂活動。

六月十五、十六兩日，南京遠法學生、工人組織向公安局自首。他們是黃榮翔，南京「學自聯」常委，南京大學博士生。吳劍林，該團體副總指揮，省立商業管理幹部學院學生。另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兩名「學自聯」學生。王洋，南京「學自聯」常委，南京機電工程學院學生，於六月十四日被捕。王濱，北京「學自聯」成員，被捕時正在建立兩地學生聯絡組，身帶大批反革命宣傳品。

蔣小東，北京科技大學學生，六月十五日在阜城縣被捕，將家住在阜城七四五〇工廠，去年畢業於阜城第一中學，考入北京。晉文卿，北京教師學院研究生、郭路湘，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生，五月十九日被捕，罪名是指揮群眾在海淘區燒毀三十一部軍車。

魏榮賓，西安市敢死隊成員，六月十一日晚與劉小郎、朱林等一道被捕。

張偉平、邱開城，浙江畫院學生，六月十八日在杭州被捕。按杭州電台報導，他曾同美國之音聯絡，報導杭州學生強迫浙江省政府下半旗，以哀悼北京「六四」死難學生。

張林，安徽蚌埠市，學自聯負責人，六月八日在該市被捕。他八五年曾考入清華大學，同年退學，並沒有正當職業。五月十九日，他在蚌埠醫學院建立「學自聯」，五月二十一日發表「極端革命的演說」，五月二十五日他組織絕食，他並寫信給方勵之要求接受方的領導。

劉剛，二十八歲，北大物理系研究生，二十一個通緝要犯之一。六月十九日在保定被捕。當地市民辨認出他後，報告警察將其逮捕。倫敦報紙報導，只身在天安門廣場阻擋坦克的十九歲學生王偉林，工人之子，已經被密

秘警察逮捕（倫敦快報六月十八日訊）。

中國電台六月十三日報導，馬小芳，二十五歲，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的助理，六月十七日在廣東自首。楊陶，十九歲，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六月十七日在蘭州被捕，兩人均是通緝要犯。

六月十八日，中央電視台宣佈，被通緝的要犯李續平（女）、楊志偉，在保定市被捕，兩人均參加過與人的對話。

政治學教授王新錦，六月十八日在上海自首，他是北京市民自治會領袖。包括陳偉東、劉家明在內的四名學生領袖，六月十七、十八兩日在張家口被捕。同日六名「北高聯」學生在北京市內被捕。

二十一要犯之一熊偉，六月十三日在其母親單位自首，他曾組織絕食救護隊，從五月十三日一直在天安門前活動。

二十二歲的要犯周鋒鎖，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生，六月十三日被其姐姐、姐夫報告公安局。地點在西安市郊三橋鎮。

二十五歲的熊炎，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在前往大同的火車上被捕。他是五月十八日與李鵬會見的學生之一。在會見時，正是他說：「不論政府的態度如何，歷史將承認這次運動，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中共報紙並公佈熊被捕的消息。

三十五歲的學生方克，六月十二日在武漢自首，他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北京「學自聯」成員。

「人民日報」六月十三日報導，馬洪梁，陝西省「學自聯」領袖，西安冶金學院學生，於六月七日被捕。劉曉龍、朱林、余雲剛、李陶、潘曉濱、王健雲，均是西安敢死隊隊員，六月十一日半夜被捕。

海內外民主運動大事記

薛偉整理

八月

吾爾開希在華府出席美國國會人權特別小組聽證會，主張對中共實施經濟制裁。

中共新華社猛烈抨擊全美中國學生學者代表大會，聲稱：「敵家其、吾爾開希等叛逃份子，不論在美、台、港等反華勢力的支持下，如何猖狂

二日

蹦跳，不論成立什麼鬧劇班子，只不過是多幾個「中國民聯」和多幾個胡平、王炳章之流的跳樑小丑而已。」中共要求南韓政府立即交還上週跨過南北韓邊界，投向自由世界的中共軍官左修凱少校及其妻子。曾是中共駐聯合國停戰軍事委員會代表團團員的左修凱，要求前往美國尋求庇護。

三日

香港消息，一個定名為「中國民主正義聯盟」的團體，七月四日在北京成立。同日，中國大陸學運領袖之一的張銳，在巴黎宣佈，民主聯的宣言中主張推翻目前的中共政權。

據日本「時事新聞社」報導，鄧小平罹患前列腺癌，病情沉重，目前正在北戴河救治中。

四日

美國國會支援作家及記者委員會關切大陸被捕作家的安全，格林等四參衆

五日

議員聯署致函中共大使朱啓楨要求釋放葉文福、戴晴、鄭義、馬貴仁、蘇曉康、王軍濤、張舒、張偉國、老木、劉曉波等作家及記者。

加拿大出爾反爾，倡議各國暫緩貸款中共，自己却先讓步批准一筆九千五百萬美元的低利貸款。

六日

聯合國人權小組委員會七日在日內瓦開會時，一些人權團體和人士將展開國際運動，譴責中共違反人權。總部設在紐約的「國際人權聯盟」，計劃邀請中國大陸的兩名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和柴玲與會作證。

十天前往南韓的中共陸軍少校左修凱已經離開南韓，前往美國。

中共對應屆高校畢業生進行再教育，北大有兩千學生接受「思想指導」學習，但學生們均抱消極抵抗態度。

七日

嚴家其對報界發表講話，主張海峽兩岸統一，以民主、自由、法治、人權作基礎，預料在鄧小平死後，大陸政治會多元化。

在台北與格瑞納達建交十九天後，中共拒絕了雙重承認，終於宣佈與格瑞納達斷交。

九日

來美公演的南京難技團五名團員脫隊，在維蒙特及紐約尋求庇護。

巴布亞新畿內亞官員八日說，兩名中共外交官已從此間的中共大使館失蹤，而且可能已逃往澳大利亞。

美國國務院認為北京情勢已有改善，宣佈准許六月初撤離的美國政府官員眷屬再返回大陸居住；但仍警告美國人民暫緩到大陸作非必要的旅行。

十日

萬潤南與吾爾開希等日前在舊金山尋求各方支持。萬潤南評估中共經濟，預測年底會崩潰。中共處分嚴家其與包遵信，開除黨籍免除公職。

繼「中國民主正義聯盟」之後，另一個大陸地下民運組織「北京六四民主鬪爭委員會」宣佈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成立，並在巴黎設立海外總代表處。

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國務院一連三日舉行擴大會議，正式通過在十月一日前撤銷北京市戒嚴令及結束清查民運中反革命暴亂份子。中共對十月一日的國慶，決定以節約為名，作一次低調的慶祝。

十一日

在學運期間潑油漆污損天安門毛澤東畫像的三名男子，湖南省的余志堅、喻多岳、魯德成分別被判重刑，戴上反革命帽子，分處無期、二十與十六年徒刑。

中共對大學生進入研究所又增加新限制，英文的中國日報今天說，大學畢業生如要繼續深造，必須先工作一至兩年。

自從中共鎮壓學運以來，中國大陸人民更難獲得美國使領館簽發的留學

十二日

或探親的簽證。
美國參議員魯德曼與萬里、朱啓楨在北京會談，警告中共勿再鎮壓學運，否則美國國會將會有非常強烈的反應。

中共領導人今天在冗長的政治局會議中討論北京何時解嚴的問題，據悉北京市長陳希同主張延長戒嚴的時限，但高級軍事官員和若干政治領導人主張早期解嚴。一般預料，戒嚴令將在今年十月一日前後取消。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總理李鵬等人均參加了會議。

十三日

據香港英文虎報報導，趙紫陽、胡啓立、芮杏文三人罪名已定。主要罪狀是幕後操縱學運。現已送往北京中央黨校。有關審查工作移交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紀律檢查委員會審理，並由「反暴亂中央領導小組」協助辦理。

十四日

第二批訪問台灣的留美大陸留學生十五人今天中午自舊金山啓程。有馬斌、蔣景、李運奇、許曉年、吳少海、黃勁松、馬君芳（女）、殷燕（女）、王來生、王驥、孫思慎、郝雨凡、周歡、徐達浙、孫濂。
一個自稱為北京「血光敢死團」的組織威脅說，八月十五日將開殺戒，每月處死兩名日本人，除非日本人停止「對中國經濟侵略」。北京日商避難，幾乎消聲匿跡。

北京大學入學制度「秋後變革」，新生須赴軍校受訓一年。其他大學雖無軍訓計劃，却「準備好特別教育」，清華、人大先實施政治教育然後再

開課。

十五日
台灣教育部又核准二十四名大陸人士訪台，其中包括胡耀邦的外孫女和冰心、吳祖光、錢偉長等人。
十五名廣州暨南大學的港澳學生，因協助大陸民運人士外逃，被國家安全局人員拘捕。

中共東方航空公司一客機墜落上海灘，虹橋機場起飛，失控栽入河中，三十四乘員喪生。
國際人權聯盟在聯合國於日內瓦舉行的一次會議中，建議全世界譴責中共在北京的大屠殺，促聯合國徹底調查天安門事件公佈實情。

十六日

袁木說北京暫時不會解嚴，又說趙紫陽可能因支持民運而被起訴。李鵬或楊尚昆明年將訪問莫斯科。
中共已決定停止參加美方正辦的傅爾布萊得學者交換計劃。

十七日

美聯社報導楊尚昆為爭奪軍委第一副主席，已將國防部長秦基偉和擁秦的北京、南京、廣州三大軍區司令員帶走，但中共國防部否認此項消息。
北京大學延期開課，幕後牽扯人事整

十八日

風，撤換校長丁石孫和黨委書記王學珍，改由李鵬親信，原人大副校長吳樹清擔任校長。同時整頓教師，清除支持民運份子。

十九日

楊尚昆會見高級軍頭，討論他接任軍委第一副主席之事，彭真、陳雲、王震支持，而秦基偉則獲得廣州、南京北京軍區司令員和張愛萍、楊得志的支持，這幾個人又公開露面。
中共決定十月開五中全會，距六月下

二十日

旬召開的四中全會只有四個月。專家認為這與鄧小平的健康日益惡化有關。其重要議題是處分趙紫陽和應付經濟困境。

廿一日

批准捐助絕食學生十萬元人民幣，朱厚澤被鄧小平集團逮捕，這是繼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被捕之後，中共高幹被捕的第二人。
波蘭團結工聯提名的馬佐維茨基擔任新政府總理，他將提供波蘭團結工聯七個部長職位，波共六個部長席位，農民黨和民主黨各分三個席位，成為共產國家中第一個非共產黨人領導的政府。

廿二日

「民陣」巴黎總部辦事處展開工作，電話是四七六三二四七九。
香港「南華早報」消息，由於楊尚昆、江澤民、秦基偉抓槍杆，鬭爭不斷，鄧小平最近已經廢除了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以避免黨內為爭奪此一職務，造成分裂。

廿三日

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公開批趙，中共組織部長宋平建議整肅支持民運黨員，進行清黨整風。
紐約地區的民運團體倡議將十月一日定名為「國殤日」，並號召全美各地中西人士鳴笛、擊鐘、按汽車喇叭五分鐘，表示追悼犧牲的中國民主人士。鳴笛五分鐘的時間，亦即北京時間十月一日早上九時，紐約地區為九月三十日晚間九時。

廿四日

工自聯副總指揮岳武，自大陸逃亡到法國，發表北京市民呼籲書，號召團結全球華人，打倒共產黨。

據路透社消息，六月逮捕的民運學生領袖王丹，在獄中遭受拷打，但仍然拒絕與中共當局合作。

北京市公安局宣佈，北京市將從九月一日起查驗居民身份證，北京市民和外地來的人員必須隨身攜帶，以備查驗。

每年由丹麥政治報和瑞典一家報紙聯合頒贈的自由獎，今年得主是方勵之，但方無法出席領取這一萬美元的獎金。

陳香梅在中國大陸訪問了一週後，在美國大使館舉行記者會，她表示已將布希總統的口信轉達給中共領導人，內容是美國希望與中共恢復友好關係，陳香梅並說有好些和她談話的中共高級領導人，在私下裡都稱許趙紫陽為中國做了很多事。

中共再度展開抓人清黨，北京九月一日起加強盤查行人及機動車輛。中共中央組織部上週宣佈，許多黨幹部必須重新申請黨籍。

被指散播謠言判九年重刑，大陸民運後，首名學生入獄，浙江藝術學院學生張偉平（譯音）被指控在杭州散播美國之音所報導的「不實」宣傳。

中共政治局集會，決定展開中共黨史上最大規模的整肅。凡對民主運動表示同情支持，或者同情「資產階級自由化」觀念的黨員，以及違法亂紀者，將受清洗和制裁。同時中共宣佈將準備大量關閉大陸私營的合同企業。設在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發表天安門慘案報告，列舉了一系列目擊者對中

共屠殺平民和學生的證詞，報告說至少有一千三百人被軍隊屠殺，要求中共立即釋放一切民運人士和政治犯。中共人大常委會將中共中央反暴亂小組對趙紫陽的九項罪名指控發還重新審查，降低了趙紫陽被起訴的可能性。據報導，李瑞環在會上提交的中共中央反暴亂小組對趙紫陽的審查報告，投票時六成棄權，兩成同意，兩成要求重審。

中共軍委成立核心小組，楊尚昆任組長，秦基偉當上副組長。劉華清、黃城漢、李德生為組員。傳中共影帶首度透露：柴玲、封從德在八月十二日被捕。聯合國人權小組把中共列入嚴重違反人權的國家名單之內。中共外交部宣稱鄧小平健康良好。大陸外交官員留美之路中斷，中共宣佈不再核准公費補助，並要求錄取到外交部工作的大學生先在軍事機關接受十個月的政治思想教育。

中共清算趙紫陽親信，海南省長梁湘丟官，被扣留在北京接受審查，新聞界亦擴大「秋後算賬」，胡績偉被點名。中共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宣佈，將限制派往美國和其它國家留學的研究生人數。在南韓請求政治庇護的大陸留日學生楊波已由台灣政府安排飛往薩爾瓦多暫居。

學運期間絕食團團長，曾經「綁架」柴玲，並發動罷免吾爾開希「高自聯

「領袖之職的北京農工大學學生王文已成功逃抵法國。目前正在巴黎籌組「中華青年民主愛國力量」。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顧問陳一咨在巴黎呼籲發起世界性運動，打倒中共反經改強硬派，指這班人必須為天安門廣場血案負責。

中共文化部長王蒙正式下台，由歌德派詩人賀敬之接替。中共空軍中尉飛行官蔡文浩（廿四歲，四川樂山人）駕米格十九戰機從福建省龍溪起飛，降落金門投奔台灣。

政治笑話

皮帶打孔

個體戶甲：老兄，最近又是限價，又是加稅，各位的生意都不好做，你怎麼還滿面春風？

個體戶乙：老弟，這你不知，我最近新開張了一項生意，顧客盈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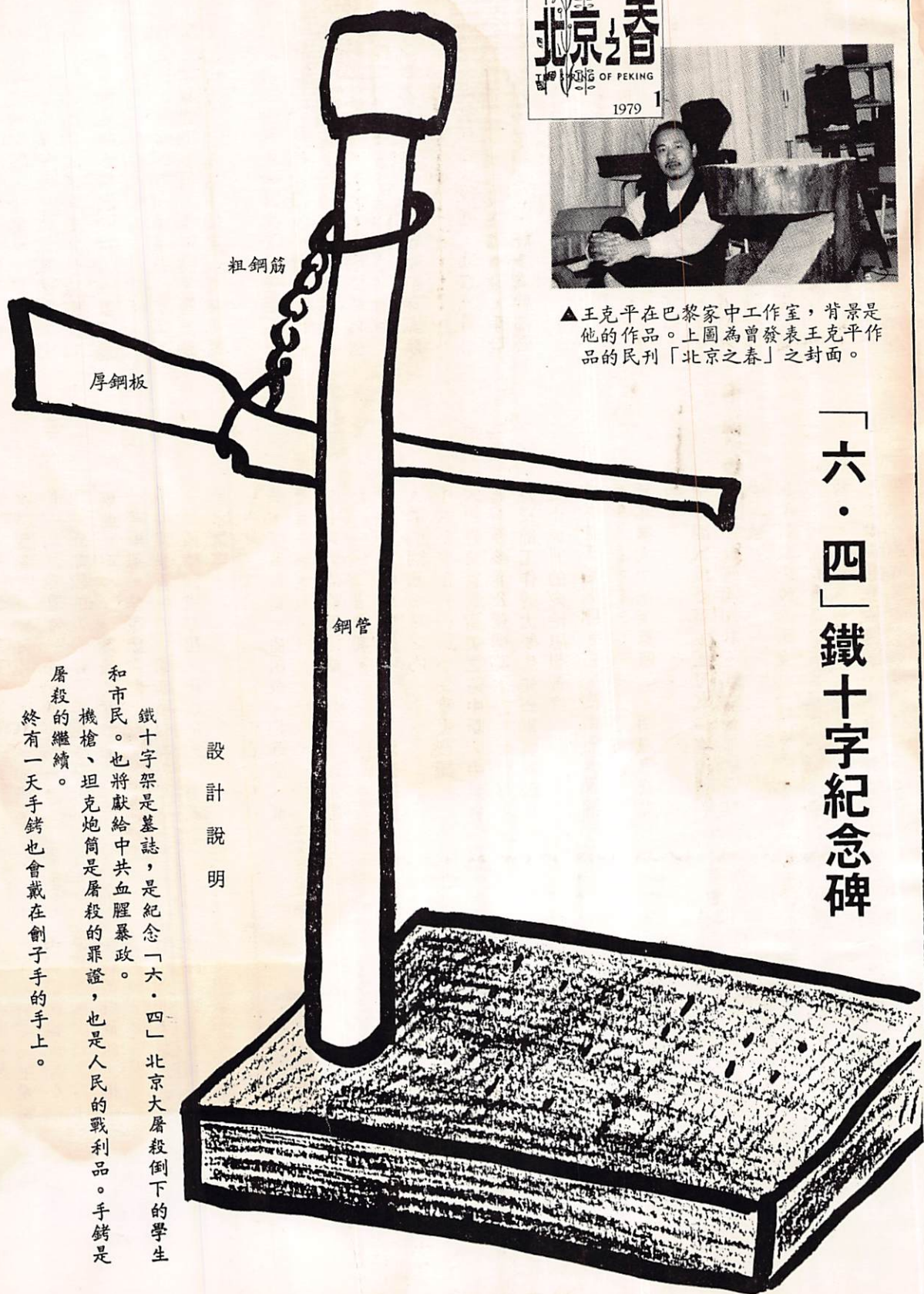
個體戶甲：什麼生意？

個體戶乙：皮帶打孔。你想，幾十年來，政府一直號召大家勒緊腰帶，很多人的腰帶已經勒到最後一個眼了。現在，李總理又號召全國人民勒緊腰帶。這皮帶打孔的生意還有錯嗎？



▲王克平在巴黎家中工作室，背景是他的作品。上圖為曾發表王克平作品的民刊「北京之春」之封面。

「六·四」鐵十字紀念碑



設計說明

鐵十字架是墓誌，是紀念「六·四」北京大屠殺倒下的學生和市民。也將獻給中共血腥暴政。機槍、坦克炮筒是屠殺的罪證，也是人民的戰利品。手銬是屠殺的繼續。終有一天手銬也會戴在劊子手的手上。

王克平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日於巴黎

中國民聯聯絡站遍佈全球

中國之春銀行帳號改為：050043

BANCO DE BOGOTA TRUST COMPANY
87-01 Roosevelt Avenue
Jackson Heights, NY 11372

美國紐約總部：

P.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U.S.A.

港澳聯絡站：

香港 九龍 廣東道
501號 二樓 4室

日本聯絡站：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市郵便局
46 號信箱

法國聯絡站：

3 ALLEE G LEBLANC
93300 AUBERVILLIERS
PARIS, FRANCE

西德聯絡站：

PARISER STR 52
50300 BONN 1
WEST GERMANY

荷蘭聯絡站：

DEVELSTEIN 518
1102 AK BIJLM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英國聯絡站：

X. GAO 9 BROOK ROAD
FALLOWFIELD
MANCHESTER M14 6UE

澳洲墨爾本聯絡站：

G.O.P. BOX 376 F
MELBOURNE, VIC 3001
AUSTRALIA

澳洲悉尼聯絡站：

P.O. BOX K477
HAYMARKET N.S.W. 2000
AUSTRALIA

澳洲堪培拉聯絡站：

GPO BOX 2851
CAMBERRA ACT 2601
AUSTRALIA

南美洲聯絡站：

P.O. BOX 104
ALBORADA GUAYACIL
ECUADOR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站：

P.O. BOX 94052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Y2

美國舊金山聯絡站：

P.O. BOX 146446
SF CA 94114-6446

美國洛杉磯聯絡站：

P.O. BOX 565
MONTEREY PARK,
CA 91754

美國華盛頓聯絡站：

P.O. BOX 4558
ARLINGTON, VA 22204

美國休斯頓聯絡站：

P.O. BOX 710784
HOUSTON, TX 77271

美國芝加哥聯絡站：

2411 CONCORD DR
WOODRIDGE IL 60517

美國西雅圖聯絡站：

P.O. BOX 95802
SEATTLE, WA 98145-2802

美國麻州聯絡站：

47 CENTRAL ST, APT 5
WALTHAM MA 02154

美國路易斯維爾聯絡站：

1249 S. 2ND ST, APT 1
LOUISVILLE, KY 40203

美國肯塔基州聯絡站：

3385 OTTER CREEK DR
LEXINGTON, KY 40502

美國印地安那州聯絡站：

P.O. BOX 2796
W. LAFAYETTE, IN 47906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站：

1404 RASPBERRY CT
EDISON NJ 08817

美國北卡州聯絡站：

3115 WOODBURN RD
RALEIGH NC 27605

美國俄亥俄州聯絡站：

P.O. BOX 10747
COLUMBUS, OH 43201

美國威斯康星州聯絡站：

5152 ANTON DR, #207
MADISON WI 53719

美國愛荷華州聯絡站：

P.O. BOX 3561
MOSCOW ID 83843-0477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聯絡站：

P.O. BOX 19427
BATON ROUGE, LA 70893

美國夏威夷州聯絡站：

P.O. BOX 8718
HONOLULU, HI 96815

美國喬治亞州聯絡站：

P.O. BOX 29712
ATLANTA GA 30359-0781

美國佛羅里達州聯絡站：

P.O. BOX 4572
HOLLYWOOD, FL 33083

美國密西根州聯絡站：

P.O. BOX 6347
EAST LANSING,
MI 48826

美國科羅拉多州聯絡站：

690 CORORADO BLVD
DENVER, CO 80206

美國奧洛岡州聯絡站：

2030 W 16TH WAY
EUGENE, OR 97402

美國阿拉巴馬州聯絡站：

5213 GREENWOOD LANE
MOBILE, AL 36608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聯絡站：

P.O. BOX 80755
LINCOLN, NE 68501

美國猶他州聯絡站：

P.O. BOX 282
SAIT LAKE CITY
UT 84110-0282

美國康州聯絡站：

23 MARSFIELD APTS
STORNS CT 06268

美國新墨西哥州聯絡站：

P.O. BOX 21832
ALBUQUERQUER
NM 87154

- 發行：中國之春雜誌社
- 美國：P.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 香港：香港九龍廣東道501號2樓4室
(5)574057
-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03)849-6348
- 澳洲：GPO BOX 2851
CAMBERRA ACT 2601
(062)472074
- 歐洲：PARISER STR. 52
5300 BONN 1 W. GERMANY
(0228)679902

零售價：(美) 2.50 美元 (加) 3.00 加幣 (港) 12.00 港幣

- * SECOND CLASS *
- * POSTAGE PAID *
- * FLUSHING N.Y. *
- * ISSN 0735-8237 *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E TO CHINA SPRING 74-7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